

CSSCI 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AMI 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

学 子 报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JOURNAL OF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理论的旗帜与思想的力量
努力造就党和人民满意的教师队伍
监测之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合理性及其价值

2021.06

(总第 282 期)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征稿函

◆常设栏目：教育政策与制度研究、学术纵横、教育基本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教师教育与发展、职业教育探索、考察调研报告、国际视野等。根据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求，适当调整增设新栏目。“学员论坛”栏目主要刊发高校管理者的办学治校研究和学术思考。2021年重点建设“专题研究”栏目。

◆选题要点：

- ※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 ※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体系研究
- ※新发展阶段高质量教育体系研究
- ※中共百年教育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新发展格局下的教育治理现代化研究
- ※新时代我国教育评价改革研究
- ※教育发展与乡村振兴研究
- ※新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结构优化研究
- ※“十四五”时期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研究
-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变革研究
- ※“四新”（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研究
- ※“三个一流”（一流专业、一流课程、一流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建设研究
- ※“四史”教育与思政育人研究
- ※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研究
- ※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研究
- ※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研究

◆投稿须知：来稿要论点新颖、论据充分可靠、论证严密、语言精练流畅。篇幅以8000字左右为宜，关于重大理论问题的论文篇幅可在1万字左右。题名限20字以内。摘要需准确提炼论文主要观点（300~400字），关键词3~5个。题目、摘要、关键词均需英文翻译。

投稿请按照学报已发表文章格式编辑，电子邮件投稿请按照：单位+姓名+文章题目方式命名。请勿一稿多投。

本刊所发文章均不代表编辑部的观点，作者文责自负。稿件以电子版为主。自投稿一个月内未接到本刊任何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

对于采用稿件本刊有编辑删改权，不同意删改者请在稿件上特别注明；对于刊发的文章本刊享有网络传播权。如有异议，请投稿时注明。未声明者，本刊视为同意。

投稿方式

编辑部电话：010-69248888转3122

投稿电子邮箱：xuebao@naea.edu.cn

在线投稿：<http://gjxz.cbpt.cnki.net/EditorEN/index.aspx?t=1&mid=gjxz>

可通过学院官网<http://www.naea.edu.cn>首页，点击“学院概况”后，选“主办期刊”进入。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月刊)

2021年第6期(总第282期)

目 录

编辑委员会

主任 侯慧君

副主任 韩旭 于京天

编委 (按音序排列)

陈丽萍 陈晓宇 陈子季

丁月牙 葛道凯 郭垒

韩震 胡敏强 胡锐军

黄晓玫 李曼丽 刘亚荣

刘元春 卢晓中 马怀德

孟繁华 沈壮海 石中英

王炳林 邬大光 邢晖

许杰 许玉乾 杨晓慧

游旭群 于建福 于鲁文

袁振国 张婕 张卫国

周玉 周作宇 朱庆葆

主 编 侯慧君

常务副主编 吕文妙

副 主 编 高 政

编 辑 吴 虑 吴潇剑

刘 红

美术编辑 张进美

录入排版 梁京京

本期执行编辑 吴潇剑

专 题 研 究

理论的旗帜与思想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红色期刊的历史贡献与宝贵启示 靳诺 3

从期刊创刊号看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经纬与蓬勃发展 王洪彬 10

党的百年教育研究

努力造就党和人民满意的教师队伍

——中国共产党教师队伍建设的百年历史与经验

冯建军 苗双双 高展 16

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的百年审思

李松楠 杨兆山 27

教 育 时 论

监测之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合理性及其价值

王战军 杨旭婷 刘静 35

目 录

应用型本科院校共生型产业学院建设与广东实践

黄大乾 饶丽娟 45

社会信任的价值之维及其学校培育

董从勋 余庆 52

教育管理者论坛

关于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全面领导的思考

黄杰 59

“十四五”时期高校网络思政工作的时代内涵和发展逻辑

张江艺 66

新青年论坛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建构论析

史洋 73

中国乐教的美育功能及实践转化

闫若楠 79

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结构的变化与分析
——基于 2009—2019 年教育统计数据

杨振芳 86

征稿函
浙江农林大学

封二
封三、封底

致作者：作者文责自负；来稿如在一个月未接到联系，请另投他刊；本刊不收取版面费、审读费等任何名目费用；本刊对刊登的文章享有网络传播权，如有异议，请在来稿中注明，未声明者，本刊视为同意。感谢您对本刊工作的理解与支持！

编辑部 010-69248888 转 3122

投稿邮箱 xuebao@naea.edu.cn

在线投稿 <http://gjxz.cbpt.cnki.net/EditorEN/index.aspx?t=1&mid=gjxz>

主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出版发行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教育管理杂志社

发行范围 国内外发行

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青源北路 8 号

邮编 102617

网址 www.naea.edu.cn

传真 010-69260513

广告发行 010-69241029

010-69226801

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1 年 6 月 15 日

编者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精神，组织举办了以“建党百年期刊的重要历史贡献及当代价值”为主题的建党百年学术论坛。与会专家深刻领会回信精神的重大意义和深邃内涵，学习交流了期刊的理论旗帜与思想力量、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促进中外学术交流、期刊全媒体融合发展趋势等相关学术成果，站位高，思想深。本期专题研究栏目特别选刊其中两篇以飨读者，旨在更好地贯彻落实回信精神，持续推动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

理论的旗帜与思想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红色期刊的历史贡献与宝贵启示

靳 诺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086)

中图分类号: G23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1) 06-0003-0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伟大业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征程中顺利完成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和伟大使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始终高度重视理论宣传与理论武装，而理论期刊是研究理论、宣传理论的重要载体和阵地。理论期刊因其思想深刻、立场鲜明、载文量大、保存携带方便等特点，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尤其在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一大批理论期刊，更是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并积累了宝贵的办刊经验，对我们今天办好期刊这一思想理论阵地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创办的主要理论期刊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装的党，理论宣传、理论武装、理论创新在党的事业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到新中国成立，创办了一大批理论刊物，在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

收稿日期: 2021-06-15

作者简介: 靳诺, 女,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和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了重要的贡献。

1.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时期的主要理论期刊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中共早期领导人纷纷创办期刊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十月革命这一“庶民的胜利”。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周恩来主编的《每周评论》《觉悟》等期刊，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阵地。其中，最主要的理论刊物有如下几种。

《新青年》月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办，至1926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主编为陈独秀。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9月将《新青年》改为上海党小组的机关刊物。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成为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1923年6月至1925年3月曾改为季刊，主编为瞿秋白，1926年7月停刊。《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宣传倡导民主与科学，初期的《新青年》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广阔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号角，发表了一系列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章，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理论阵地。

《湘江评论》，1919年7月在长沙创刊，为湖南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宗旨”，辟有《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湘江杂评》《世界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以引导民众放眼世界、改造中国为指向，以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思想和歌颂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内容。毛泽东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为创刊号撰写创刊宣言及长短文二十余篇，号召人民大众联合起来，敢于斗争，争取胜利。《湘江评论》是五四时期进步期刊中思想性、进步性非常突出的刊物之一，对当时湖南和全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湘江评论》创刊号寄到北京后，李大钊认为这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

的刊物。

《共产党》月刊，在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1920年11月7日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1921年8月后成为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由李达任主编，1922年7月7日停刊，共出版了6期。该刊的任务是围绕“为什么建党”“建设什么样的党”“党的任务是什么”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发声，用大量篇幅介绍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和马克思主义学说，阐明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刊载第三国际的重要文件，报道共产主义运动在各国的发展，同时批判了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为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对促进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统一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党思想，以及推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指出：“党的出版物，除《新青年》外还有《共产党》，销数很广，宣传亦很有力量。”

《向导》周刊是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创办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第一任主编是蔡和森，后来分别由彭述之、瞿秋白任主编，1927年7月18日停刊。《向导》周刊侧重评论当前政治形势和重大政治事件，坚持以革命政治斗争为“导向”的指导原则，集中力量宣传党的三大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把中国建成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十分重视对革命所面临的政治形势和政治事件的分析评论，指导全党和革命群众认清形势，正确开展革命斗争。《向导》还以记者的名义答读者问，通过问答释疑，阐明党的立场和观点，宣传真理，教育群众，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

《前锋》月刊是1923年7月1日在广州创办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主编是瞿秋白。原定为月刊，实际上出刊时间较短，前后7个月只出刊3期。与《新青年》相比，《前锋》编发的内容不同。当时党中央规定它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三大确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指导和推进国民革命，因而《前锋》的编辑特色主要表现在内容上注重实际，较多地运用调查材料和统计数字剖析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军事、

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共同本质和不同手法，揭露军阀政府的独裁统治，论证中国社会革命问题，介绍苏联的建设经验和亚非殖民地情况，对党的建设和工作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前锋》完成使命，于1924年2月停刊。

2.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理论期刊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称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始于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止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生死存亡的考验，克服了重重困难，政治上理论上逐步成熟起来。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和领导的党报党刊迅猛发展，数量高达近200种，其中影响比较大的理论刊物有《布尔塞维克》《红旗周报》《斗争》周刊等。

《布尔塞维克》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中央理论刊物，从1927年10月在上海创刊到1932年7月1日停刊，共出版52期，先后为周刊、半月刊、月刊，编委会主任先后为瞿秋白、李立三，总编（主编）先后为瞿秋白、郑超麟、张闻天，设有《国内政治》《国际状况》《职工运动》《农民暴动》《中国革命问题》《列宁主义理论问题》《寸铁》《读者之声》等专栏。《布尔塞维克》以大量篇幅宣传党制定的实现土地革命和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方针，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武装反抗国民党的英勇斗争，总结经验和教训等。它及时刊登了党中央的许多决议、指示和其他重要文件，发表探讨、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文章，转载共产国际的有关文献，成为党的最重要的思想机关、政治喉舌和宣传舆论阵地。

《红旗周报》的前身是《红旗》《红旗日报》。《红旗周报》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出版了64期，另有附刊13期。《红旗》创刊于1928年11月20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开始为周刊，第24期起改成三日刊；1930年8月15日，《红旗》与中共江苏省委主办的《上海报》合并，出版《红旗日报》，为中共中央机关报。1931年3月，《红旗日报》改名为《红旗周报》，主编先后为王稼祥、罗绮园、谢觉哉、萧保霖。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后，8月该刊改为半月刊，在上海秘密发行，封面采用《光明之路》《平民》《时时周报》等名称。《红旗周报》从多方面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斗争》于1933年2月创刊。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局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为加强对各地中共党组织的领导，提高其政策水平，中共中央决定合并中央苏区原有的《实话》和《党的建设》两种刊物，改名《斗争》，由张闻天任主编，于1934年9月停刊，共出73期。其主要内容是刊登中共中央的决议、指示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文章，在指导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支援革命战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 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理论期刊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特殊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也是党在理论上真正成熟起来的时期。

《解放》周刊是1937年4月24日在延安创办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设有时评、论著、翻译、通讯、文艺等专栏，张闻天任主编，1941年8月31日停刊，共出版了134期。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等都在该刊上发表过文章。《解放》周刊刊发了毛泽东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章和《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中央文件，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宣传和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过程和规律，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解放》开辟了“党内教育”专栏，由中央领导同志讲授党的基本知识，进行怎样做一个合格党员的教育。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张闻天的《论待人接物问题》等文章，在党员教育和党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对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解放》还组织翻译和刊登了许多马列原著的有关内容,介绍理论学习的方法,成为宣传和普及马列主义的重要阵地,为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作出了可贵的努力。

《共产党人》是1939年10月4日在延安创办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张闻天担任主编,李维汉担任编辑主任,1941年8月20日停刊,共出刊19期。创刊号刊登了毛泽东撰写的《发刊词》,同时刊登了刘少奇《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王稼祥的《为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坚强而斗争》、陈云的《巩固党与我区的群众工作》等文章。《共产党人》杂志在刊发党的文件后,紧接着发表一些与文件相关的理论文章,将党的文件与理论解释、实践应用文章相结合进行宣传,注重政治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注重理论分析和实践工作相结合,注重舆论引导和动员群众相结合,切实发挥出了刊物的指导性、应用性和示范性价值,使其成为为党的建设目标服务的工具,全体党员干部日常学习、提高思想理论水平的主要阅读材料之一,以其鲜明的名称、独特的定位、明确的主旨发挥了重要的理论宣传作用,对保证宣传思想工作的政治方向,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规范党组织、党员的工作和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4. 解放战争时期的主要理论期刊

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期。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即将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即将开始,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党的各项工作都面临着回顾总结与未雨绸缪的双重使命。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加强理论期刊的建设,依托期刊和报纸发表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进程。

为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这一时期我们党更多是利用通讯社、报刊和广播电台等媒体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动员人民群众支持战争,各解放区纷纷创办了《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新华日报》《晋绥日报》等报刊,提出了“全

党办报”“群众办报”等方针,建立了党的宣传工作请示与报告制度。理论宣传、理论建设的工作更多地由党的领袖发表理论文章、出版理论著作来推进。毛泽东相继撰写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并在《群众》等刊物上发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党在这一时期还创办了《新华周刊》,这是一份行销世界各大城市的16开英文刊物,也是我党创办的第一份外文刊物。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竭力将中国拉向内战深渊,并利用国民党报刊在国内外大造反动舆论。为了便于在国际上展开争取和平民主的舆论斗争,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于1946年5月17日创办了《新华周刊》,由乔冠华任总编。《新华周刊》及时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当时所发生的重大政治新闻,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对国共和谈的立场,揭露蒋介石挑动内战的阴谋。《新华周刊》内容丰富,通俗生动,深受读者欢迎。国民党当局对此惶惶不安,犹如芒刺在背,指使上海反动当局于同年6月5日查禁了《新华周刊》。《新华周刊》从创刊至封闭,前后只出版了3期,但它在当时的宣传斗争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锻炼了一批对外宣传人才。

二、理论期刊在革命时期的重要功能与作用

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肩负动员、组织和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武装全党、武装民众。理论期刊围绕党在革命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开展理论研究、理论宣传普及工作,发挥了重要的功能与作用。

第一,理论期刊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阵地。《新青年》《湘江评论》《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共产党人》等期刊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阵地,其中《新青年》是五四新文

化运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阵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始，是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是与《新青年》紧密联系在一起。1919年5月，在李大钊的主持下，《新青年》第6卷5号即“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以下简称“专号”），刊登了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就有李大钊的长篇论文《我之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三个方面的基本观点。“专号”还刊登了杨匏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称科学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马克思学说的各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都做了详尽的介绍，被称为《我之马克思主义观》的姊妹篇，标志着中国最早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理解。这些理论期刊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黑暗中的中国点燃了希望之光，为寻求真理的进步青年探明前进方向，成为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理论思想发源地。同时，这些期刊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理论宣传和探讨，特别是围绕“为什么建党”“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问题，详细介绍了联共（布）的建党原则、政党活动及党的建设情况，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舆论阵地、思想基础、理论准备和干部队伍。

第二，理论期刊是介绍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重要宣传平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党的理论纲领就是革命的号角、战斗的旗帜，而中共创办的期刊就是永远走在时代前列的旗手。1920年11月，李达主编的《共产党》着重宣传列宁的建党学说和关于共产党的基本知识，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建党经验，批驳社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探讨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问题，

坚定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信念。学界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党刊，第一次在中国树起了“共产党”的旗帜，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的口号。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称赞道：“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1922年9月创办的《向导》，宗旨就是宣传传播党的政治纲领、指导工人运动、推动国民革命，蔡和森、瞿秋白曾担任过主编，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经常为其撰稿。国民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创办的《前锋》《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通讯》等期刊，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任务、道路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创办的《布尔塞维克》继续宣传党的革命理论，提出了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等理论主张。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在各解放区创办了《共产党人》《中国文化》《八路军军政杂志》《新长城》等一批杂志，宣传党的思想和理论。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在延安创刊，成为党的理论建设的重要刊物，毛泽东在其发刊词中提出“专门的党报”“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等命题，并提出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个主要法宝。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主张，都是首先通过期刊这个媒体予以公开亮相、传播，期刊也因此成为国内外人们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最重要载体。而各个时期党创办的期刊，因其鲜明的政治主张、人民的立场、战斗的姿态、一往无前的精神，也逐渐内化为一种党性文化基因，传承至今。

第三，理论期刊是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重要精神旗帜。思想是一个人行动的先导和指南，指导思想则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5月4日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

斗力。”革命道路探索充满坎坷，加强思想理论建党尤为关键。党创办的期刊，以其旗帜鲜明的立场、敢于亮剑的观点、与时俱进的内容、深入浅出的理论、丰富多样的形式，为统一全党全国人民思想、建立广泛统一战线、引领革命的正确方向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如《新青年》除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道路外，还与《每周评论》一起展开了关于“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大论战，扫清了中共建党的思路障碍。《向导》最先刊发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青年》登载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湘江评论》刊登了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等关于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早期经典文章。《党的生活》则把“发展党内的讨论，实行自己批评，提高全党同志的政治认识”作为自己的任务。1937年，在国统区武汉创立的《群众》周刊高举“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退步”的大旗，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战绩和根据地建设成就，成为维护党的形象、推动和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载体。《解放》周刊刊发了许多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党的思想教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文章。在毛泽东一生占据重要位置并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如《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29篇文章都首发在《解放》上，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林伯渠、董必武、杨尚昆、贺龙、李富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无一例外都曾在该刊发表过文章。1940年，《中国文化》发表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后，带动了《民主》《学习》《上海周报》《群众》《中国青年》等一大批期刊刊载论述新民主主义的文章，有力地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营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强大社会舆论，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形成和传播。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的以报刊为核心的舆论战场，同政治、军事战场一道，铺就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之路。

第四，理论期刊是中国共产党艰难探索革命道路的重要档案记录。期刊是时代的晴雨表、

历史的记录员。党领导创办的期刊始终与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生死与共、形影相随。比如，党创建时期的《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除了继续出版的《新青年》外，又创办《向导》《前锋》《中国共产党党报》《中央政治通讯》；土地革命时期除继续出版《中央政治通讯》外，又先后创办《布尔塞维克》《红旗》《斗争》《党的生活》《党的建设》等；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创办《解放》《群众》《共产党人》；解放战争时期继续出版《群众》。这些期刊既是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喉舌”“旗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思想集萃”，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忠实记录员。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其实，这些“壮丽史诗”“历史画卷”“奋斗赞歌”就撰写在、记录在期刊里，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史、精神史的主流主脉就镌刻在、凝结在期刊里。

三、汲取历史经验，努力提高新时代理论期刊的办刊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在庆祝建党百年的喜庆历史时刻，了解我们党领导创办的期刊史及其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作出的重要历史贡献，是我们今天进行党史学习教育生动而有说服力的鲜活文本，是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真实历史镜鉴。新时代新阶段新征程，高校和社科界要继续用好期刊这一阵地和平台，旗帜鲜明地加强期刊建设，不断追踪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发

守学术品位、学术价值以及学术风格，同时顺应网络时代媒体融合的大趋势，提升刊物的社会影响力，更好地“用学术讲政治”，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一，把握政治性，确保期刊的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认为理论宣传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期刊由党创办，为党服务，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办好办刊方向。《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关于“宣传”明确规定：“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都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1] 1923年6月，在《新青年》成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时，瞿秋白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中就提出，《新青年》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具有革命性的特点，必须成为无产阶级的罗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提出办刊主旨问题：“它的任务是什么呢？它将写些什么东西呢？它和别的党报有些什么不同呢？”他对这些问题一一进行了明确解答：“它的任务就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帮助进行这件伟大的工程，不是一般党报所能胜任的，必须有专门的党报，这就是《共产党人》出版的原因。”

第二，把握专业性，提升期刊的质量水平。期刊要很好承担和完成党的理论宣传任务，必须提升办刊的质量，一方面需要专业的作者队伍，另一方面必须有专业的编辑队伍。我们党的革命时期的理论期刊之所以能够产生重大影响，发挥重要作用，最根本的就是依靠专业的作者队伍和编辑队伍。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张闻天、李维汉等党的领导人不仅亲自创办理论期刊，担任主编、副主编，而且为刊物撰写高质量文章。这些理论期刊还拥

有一大批优秀作者，如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王稼祥、王若飞、艾思奇，他们所撰写的文章时政性、理论性、针对性都很强，从而使《新青年》《湘江评论》《共产党人》等刊物享有很高的声誉，产生广泛的影响力。

第三，把握可读性，推动期刊的通俗化大众化。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理论期刊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农民、战士和来自农村的干部，为适应这种情况，报刊上的文章必须通俗、简短和口语化。在大革命时期的1922年，中共中央在《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中就指出：党的报刊，如《新青年》《前锋》《向导》《工人周刊》《劳动周刊》等，都要“使用口语、求其通俗化”。我们党还提出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强调要依靠全党、依靠群众、依靠读者办好报刊，特别注重听取群众和读者的意见建议。例如，《新青年》设立“读者论坛”，发表读者的来信，加强了《新青年》与读者的联系，扩大了刊物的传播范围；《共产党人》在第11、13、14期连续发表编委会启事：“兹请各地组织和读者同志们对本刊批评和建议，不论在内容上、编辑上或发行上，希望提供意见，以资改进。”这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办刊的民主作风。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
- [2] 中央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本刊编辑部)

从期刊创刊号看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经纬与蓬勃发展

王洪彬

(洛阳师范学院, 河南 洛阳 471934)

摘要: 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主要阵地, 而期刊创刊号折射着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时代脉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党刊的创办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以“中”“人”“新”命名的系列期刊, 迅速建立起新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 以《红旗》为代表的党刊, 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基调, 开创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新局面; 从改革开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形成了三大支撑体系, 呈现出“五化”发展倾向, 促使哲学社会科学进入繁荣期。

关键词: 期刊创刊号; 哲学社会科学; 历史经纬; 蓬勃发展

中图分类号: C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1) 06-0010-06

2016年5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①。2021年5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指出: 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 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 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 促进中外学术交流。^②

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起着重要的助推作用, 是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主阵地之一。期刊的试刊、创刊、停刊、复刊, 都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 折射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时代脉搏。特别是创刊号, 即每

种刊物创制出版的第一期, 往往都开宗明义, 阐明办刊宗旨与基本任务, 成为观察期刊整体发展的窗口, 因而价值斐然。本文以期刊创刊号为例, 探寻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独特历史轨迹。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党刊指明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之前, 中国外无民族独立, 内无民主制度, 革命是民族和国家的第一主题。当时, 中国社会风雨飘摇, 阶级矛盾极为尖锐复杂, 思想文化界各种学说良莠共生, 革命道路曲折艰难, 中国期刊业的发展环境也呈现出光怪陆离的景象。尽管如此, 反映人民心声、传播革命思想的进步期刊却也在夹缝中顽强生长, 一批具有思想性、斗争性、革命性的期刊和办刊人不断涌现。

收稿日期: 2021-06-15

作者简介: 王洪彬, 男, 教授, 洛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建设研究。

这一时期，有关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内容常常登载在综合性杂志上。如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3月创办的《东方杂志》，是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等当时很多思想家和作家就社会问题发表意见的窗口。其创刊号发刊词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既刊登译著和文艺作品，也发表涉及政法、经济、社会、外交、文化、史地的严谨学术论文，成为影响最大的百科全书式老期刊，内容包罗万象，具有明显的综合性。

著名的《新青年》于1915年9月15日创刊，初名为《青年杂志》，涉及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领域，同样具有综合性，陈独秀为其创办人和主笔。它以“改变人的思想”为宗旨，向腐朽的封建制度发起猛烈进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后，《新青年》的办刊主旨开始向宣传马克思主义转变。据统计，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刊登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达130余篇，成为马克思主义原理这一学科在中国诞生的源头。从1920年9月第8卷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宣传机关刊物。

1920年11月，在陈独秀的寓所，即《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另一本中国共产党内部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诞生了。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理论刊物。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理论家李达任主编，陈独秀、施存统、沈雁冰等为主要撰稿人。《共产党》创刊号上刊登了《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俄国共产党的历史》等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介绍俄国共产党及革命情况，发表列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中国社会与革命若干重大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如农民问题），批判实验主义、议会政治道路、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潮，普及建党知识、筹备组织建党，不仅为建党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原理及学科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酝酿、筹备阶段时，为了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力度、扩大社会影响、提升建党组织功能，《共产党》月刊改为

半公开性刊物，正式面向全社会举起了共产主义的旗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3]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创办的期刊，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光辉指引。中国共产党纪律严明，对出版物要求非常严格，比如在党的一大《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第二部分“宣传”就强调：一切出版物，不论中央的或地方的，均应在党的领导下出版；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都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4] 一大之后，党刊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1922年，第一份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向导》创刊；1923年，第一份党内机关报《中国共产党党报》创刊；1927年，宣传革命火种的《布尔塞维克》创刊；1929年，最早提出党报党刊喉舌作用的《党的生活》创刊，等等。这些重要党刊，集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与传播，撬开了封建思想的闸门，可以说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宣告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从此，党刊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风雨同舟，承载了作为开路先锋、时代记录者和见证者的使命，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创新局面

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这一时期，是新中国期刊的系统建构与探索发展时期，为新中国的期刊事业发展定下了基调和方向。在此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1. “中”“人”“新”系列期刊，迅速建立起新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中国”“人民”“新”为刊名关键词，出现了一系列期刊。以“中国”为名者，如1949年的《中国儿童》创刊号；1950年更是集中出现，有《中国金融》《中国影艺》《中国贸易》《中国国家地理》《中国农业研

究》《中国林业》等创刊号。以“人民”为名者，如1949年创刊的《人民文学》，1950年创刊的《人民教育》《人民戏剧》等。以“新”为名者，如1949年由《中建》复刊更名的《新建设》，1950年创刊的《新观察》《新体育》等。这些创刊号见证了新中国的改天换地，迅速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崭新国家意识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研究者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研究什么，主张什么，都会打下社会烙印。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9]以“中国”为刊名关键词，明确了研究者所生活的现实社会，为他们“研究什么、主张什么”打下了鲜明的“社会烙印”。以“人民”为刊名关键词，点明了刊物“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明确回答了“为谁著书、为谁立说”的问题。以“新”字命名期刊，则反映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新面貌、新气象，标志着新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局面的正式开启。

2. 以《红旗》为代表的党刊，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基调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一直考虑创办机关刊物。早期代表性期刊有1949年9月创刊的《学习》，成为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杂志；1949年11月创刊的《新华月报》，是政治文献类杂志；1950年10月创刊的《时事手册》，是新闻时事类期刊，为《半月谈》的前身。随着各省市的相继解放，成立的地方党委也积极创办了第一批地方党刊，如天津的《支部生活》、福建的《福建通讯》、山西的《前进》，都是在1949年创刊。此后，河南的《支部生活》、

湖南的《学习导报》、云南的《支部生活》以及《上海支部生活》在1952年—1954年也相继创刊，为党刊体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55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提出，各省“要选择恰当的人，办好刊物，改善刊物，迅速交流经验”^[6]。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7]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创办党的理论刊物，以党的理论研究带动社会发展、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进步，成为一项紧迫而重要的政治任务。在毛泽东的积极推动下，1958年6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理论刊物《红旗》创刊。与一般的哲学社会科学刊物不同，它兼具指导性、学术性、探索性、实践性于一身，迸发出巨大的政策指导力、学术导向力、文化影响力、实践执行力。在此前后，各省市党委积极筹办机关刊物，包括北京市委《前线》创刊号、上海市委《解放》创刊号、天津市委《东风》创刊号、安徽省委《虚与实》创刊号、江西省委《跃进》创刊号、云南省委《创造》创刊号、山西省委《前进》创刊号、四川省委《上游》创刊号、黑龙江省委《奋斗》创刊号、江苏省委《群众》创刊号、浙江省委《求是》创刊号、内蒙古自治区委《实践》创刊号、河北省委《东风》创刊号、河南省委《中州评论》创刊号、湖北省委《七一》创刊号、贵州省委《团结》创刊号、山东省委《新论语》创刊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新疆红旗》创刊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委《思想解放》创刊号等，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党刊体系。

这些党刊坚持鲜明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基调，成为党建理论、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传播的重要阵地。这种实事求是的研究风气，与新中国成立前的学术之风大有不同，很好地实现了毛泽东“办好刊物，改善刊物”的倡导，从而也影响到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如1976年辽宁创办的《理论与实践》、1984年湖北创办的《学习与实践》、1987年河南省委统战部创办的《统战理论与实践》等，刊名都突出“实践”二

字，即是证明。

3. 以党建党史类期刊为代表，产生了两大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

新中国成立之后，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影响最深的新变化，就是党刊迅速发展，促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党史·党建”成为两个新的学科。

早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早期刊物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初现茁壮成长之势。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类党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大。同时，党刊更是党史党建研究的主阵地。纵观党刊的刊号命名，足以发现历史的传承、理论的关注点与兴趣点以及时代的变迁。党的建设是我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党刊创刊号的命名即体现了这一点。最早的《党的建设》，创刊于 1932 年，是中共苏区中央组织部主办的刊物。新中国成立后，以“党的建设”命名的党刊较为集中，相继有甘肃省委 1982 年创办的《党的建设》、四川省委 1987 年创办的《党的建设》、山西太原市委 1987 年创办的《党的建设》、湖北省委 1989 年创办的《机关党的建设》等。党的建设类刊物侧重组织原则、理论探讨，而与之相辅的是党的生活类刊物，较为贴近实践，相继有中共中央宣传部 1954 年创办的《党的生活》、上海市委 1979 年创办的《党的生活》、贵州省委 1980 年创办的《党的生活》、河南省委 1980 年创办的《党的生活》、江苏省委 1988 年创办的《党的生活》，以及一些地方县委如湖北鄂城县委 1973 年创办的《党的生活》等。党的建设的承载主体是支部建设，相继有山西省委 1961 年创刊的《支部建设》，江西省委 1981 年创刊的《支部建设》、陕西省委 2003 年创刊的《支部建设》等。与支部建设类刊物相辅相成的是支部生活类刊物，相继有上海市委 1954 年创刊的《支部生活》、江苏省委 1958 年创办的《江苏支部生活》、陕西省委 1981 年试刊的《支部生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 2000 年创刊的《支部生活（新疆）》等。党的建设归根结底要靠发展共产党员、树立优秀的党员典型来实现，由此出现了以共产党员（支部书记）命名的刊物。

最早的是著名的党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于 1939 年 10 月 4 日创刊。新中国成立后又有辽宁省委 1956 年创办的《共产党员》、广东省委 1960 年创办的《共产党员》、辽宁省委 1982 年创办的《共产党员》，以及辽宁省委 2003 年试刊的《党支部书记》等。这些党刊架构科学、组织合理，很好地解决了不同时期党的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史研究类刊物也在逐渐发展。1954 年，内蒙古《党史学习参考资料》创刊；1955 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创刊；1955 年，四川《中国共产党党史学习参考资料》创刊；1956 年，中共中央党的监察工作创办《共产党的知识》。此后，各省各地党史研究阵地不断扩大，相继出现了中共中央党校 1979 年创刊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上海市委 1979 年创刊的《党史资料丛刊》、北京市委 1980 年创刊的《党史博览》、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 1980 年创刊的《党史研究资料》等。此外，党的理论研究类期刊队伍也在壮大，如中共中央外文局 1956 年创办的《各国共产党文选》、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1964 年创办的《学习》、云南大学 1975 年创办的《思想战线》等。这些期刊的创办使中国共产党党史党建研究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新领域，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改革开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进入繁荣期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国期刊业也不断丰富、壮大。以期刊出版为带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进入繁荣期。如表 1 所示，1978—2015 年，中国期刊品种数持续增加。总印数、总印张在 2012 年达到峰值。之后，受纸质期刊向电子期刊转型的影响，品种数虽仍在增加，但印刷数量有所回落，成为期刊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一个显证。

截至目前，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学科门类不断完备、布局趋于合理，共有 20 多个一级学科、400 多个二

表1 中国期刊业的三项基础指标(节选)^⑧

年份	品种数(种)	总印数(亿册)	总印张(亿印张)
1978	930	7.62	18.80
1992	6486	23.6	62.73
2012	9867	33.48	196.01
2015	10014	28.78	167.78

级学科,如马克思主义原理、历史学、考古学、哲学、文学、语言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与人类学、宗教学、政治学、新闻学、军事学、教育学、艺术学和国际问题研究等。

各个学科的期刊创刊号,也是蓬勃发展。如马克思主义类期刊创刊号,有1980年创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书讯》、1983年创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1990年创刊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创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2012年创刊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5年创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等。马克思主义类期刊的广泛创办成为引领学术发展的指南针与风向标。

从创刊号的命名上看,形成了三大支撑系统,包括学校学报系统、研究机构刊物系统和出版社期刊系统。学校学报系统又包括高等学校、党校行政学院与军队院校的不同特色的学报,都是随着学校的建制数量不断增长的。中共中央党校于1977年创刊《理论动态》,并在1978年5月10日出版的第60期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1日在《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新华社向全国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同时转载。该文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体现了学术研究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

研究机构系统包括全国和各省市的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冠以“社会科学”的刊物,以及发展研究中心、政策研究室等党政所属研究机构主办的各种刊物。1955年,党中央重建中央政治研究室,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创办党刊做组织人事上的准备,成立了以陈伯达为总编辑的编辑组,保障了1958年6月《红旗》的顺利

创刊。出版社系统指各地出版社出版的学术研究杂志,如中国出版集团主管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创办的《读书》创刊号、中华书局1981年创办的《文史知识》创刊号等。

从期刊的发展趋势上看,呈现出“五化”发展倾向,即专业化、学科化、高校化、网络化、国际化。专业化是相较新中国成立前的综合性而言,彼时受限于国家整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专业性学术期刊并不多见,一些学术文章都发表在综合性期刊上,期刊也以综合性为生存之道。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哲学社会科学期刊的专业化、专题性开始凸显,如1986年在湖北发行的《思想政治工作》创刊号、1987年在内蒙古发行的《思想工作论坛》创刊号、2001年在辽宁发行的《思想政治工作》创刊号以及辽宁鞍山市委2001年发行的《宣传思想战线》创刊号等,都是专门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的刊物,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学科化是指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都建立起了独立的、可以支持本门学科发展的期刊系统,有利于学科研究领域与方向的逐步深化与细化。随着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新闻传播学类期刊应运而生,多达300多种。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1年创刊的《国际新闻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1981年创刊的《新闻大学》,黑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1985年创刊的《新闻传播》,新华通讯社1987年创刊的新中国第一家新闻业务刊物《中国记者》等,有力保障了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发展。

高校化是指高校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镇之一,以此为基础,高校学报不断分化,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文章的合编联出发发展到“哲学社会科学版”“社会科学版”“人文科学版”纷纷单独面世,成为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直接见证。较早创办的高校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有1958年创刊的《杭州大学学报》、1974年1月创刊的《黑龙江大学学报》。而随着专业化与学科化的深入发展,期刊数量品种增加,加大了研究者有效阅读的难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摘类期刊随之而生,如1958年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创办享誉

全国的《复印报刊资料》系列刊物、人民出版社1981年主办的《新华文摘》(由1979年《新华月报·文摘版》改名)、办刊地址设在上海师范大学的1984年创刊的《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社会科学院2000年创刊的《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

网络化指随着网络与新媒体技术迭代创新,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正在跟随国家媒体融合发展战略,逐步由纸质期刊向电子期刊、两微一端、学术平台发展。如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刊的《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创刊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等,均实现了网上阅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中国知网”“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等数据库的建设,使期刊的网络与新媒体传播不断迭代升级,开辟了期刊发展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图书文献、网络、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加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构建方便快捷、资源共享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信息化平台”。^[9] 习近平总书记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图书文献网络化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国际化是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对国际传播的重视。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一倾向就有显现,如1951年《中国文学》(英文版)创刊、1952年《中国建设》(英文版)创刊、1952年《中国科学》(英文版)创刊可为见证。改革开放后,为讲好中国理论,传播好中国学术话语,搭建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哲学社会科学期刊不断增加英文及其他语种的外文版,如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创刊、2009年《求是》(英文版)创刊等。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10] 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为我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为做好新时代对外传播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也必将指引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国际化发展跃上更高层次、更高水平。

创刊号就是时代书写与记录的开始。一份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的创刊史,就是一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缩影。从创刊号回顾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道路,我们倍觉根深叶茂,对前辈满怀崇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更觉重任在肩,理应坚定迈好哲学社会科学不断繁荣的步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3] [5] [9]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 [N]. 光明日报, 2016-05-19 (1).
- [2] 习近平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 [N]. 人民日报, 2021-05-11 (1).
- [4]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2册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200.
- [6] 毛泽东. 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和加强领导问题 [C]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6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7] 毛泽东.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C]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5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7: 362.
- [8] 李频. 中国期刊史: 第4卷 (1978—2015)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导言5-6.
- [10] 习近平.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N]. 人民日报, 2021-06-02 (1).

(责任编辑 刘红)

(下转第34页)

努力造就党和人民满意的教师队伍

——中国共产党教师队伍建设的百年历史与经验

冯建军 苗双双 高展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工作。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和教师传播先进的革命思想,成为弘扬革命精神的中坚力量;社会建设时期,教师以技术促生产、以智识育信念、以教化树新风,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支撑;改革开放时期,教师的地位不断提高,成为教育改革的主力军;进入新时代,教师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与使命,成为新时代的筑梦人。回顾中国共产党教师队伍建设的百年历史,党和人民对好教师的要求表现为:道德高尚的示范者、业务精湛的专业者、学生成长的引导者、社会文明的传播者。为了努力造就党和人民满意的教师队伍,应当从中国共产党教师队伍建设的百年历史中汲取经验,继续坚持党对教师队伍的全面领导,高度重视教师地位,提升教师专业素质,增强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关键词:建党百年;教师队伍建设;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 G4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1) 06-0016-11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兴国必先强师,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秉持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一直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工作。回顾与学习中国共产党教师队伍建设的历史、思想与经验,努力造就党和人民满意的教师队伍,对于推进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教师队伍建设的百年历史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教

育事业。教师作为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在不同历史时期从各个方面为我国的发展贡献力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这段革命时期,教师传播先进的革命知识和革命理念,为新中国的成立打下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的过渡时期和建设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教师以技术促生产、以智识育信念、以教化树新风,在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党将教师视为教育改革的主力军,通过建设教师队伍促进我国教育事业不断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教师成为打造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斗不息。

收稿日期: 2021-05-21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研究”(20JYA001)

作者简介: 冯建军,男,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苗双双,女,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高展,女,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1. 星星之火：作为革命时期中坚力量的教师（1921—1949年）

为了改造现实社会，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起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农民运动讲习所、上海大学等新型干部学校，毛泽东、周恩来、李大钊等共产党员曾任教于这些干部学校。干部学校中的教师们向有志青年、工人和农民传播革命知识，在帮助他们认清社会现状的同时以文化知识武装其头脑，在传播思想、培养人才和唤醒民众意识等方面为革命事业做准备。

传播新思想、培养革命人才、唤醒民众觉悟，需要思想先进、知识丰富的教师对民众进行教化。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言，“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1]，教师在这一时期承担着传播新思想的重要任务。一些教师将满腔热血投入到革命年代的教育事业当中，以实际行动“为教育新后代而努力”^[2]。然而也有部分教师身处资产阶级，未能认识到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存在思想陈旧、观念落后的问题。

1922年5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倡学生参加校务运动，原因在于“校内的一切设施和课程，都由校长、教职员自身的志愿和利害来支配，一点也不合于学生的需要和愿望”^[3]。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部分教师存在理论与实践分离的问题，导致了“谬种流传，误人不浅”的不良后果。^[4]

针对革命时期教师队伍存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教师队伍的领导与建设。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对党内教育的教授法进行规定，提出启发式、讨论式教学法，保障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参与度，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对于部分教师教学态度阻碍农民教育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依靠私塾、改良私塾、创办培养农村小学师资的学校等措施保障农民教育的实施。^[5]教师对待农民态度不佳的问题，本质上是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问题。1939年5月，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6]

对于教师队伍中理论与实践分离的问题，“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7]。

为了将革命的思想精神更快更广地传递给民众，唤醒广大民众的革命觉悟，中国共产党采取诸多措施吸收知识分子，让更多教师成为传播革命知识的星星之火，成为革命的启蒙者。毛泽东指出：“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炼，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8]同时，毛泽东也强调，必须慎重对待教员，“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9]。通过有选择地、尽可能地团结知识分子，使广大知识分子在革命年代传播先进革命思想，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知识分子中的教师群体在传播先进思想的同时向工农子弟传递生产劳动技能，为新中国的成立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2. 奠基之石：作为社会建设重要支撑的教师（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诸多方面破旧立新，为教师加入工人阶级、参与社会建设提供了重要契机。在这一时期，教师为社会建设贡献了诸多力量，主要表现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点是经济建设。教师作为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者，在这一阶段主要是用生产劳动理论与技术促进我国社会的经济建设。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出，“我们的教育也应该以工农为主体，应该特别着重于工农大众的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10]。1950年，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中指出：“当前教育工作的重点和主要目标，应该是为生产建设服务”，倡导将教育与经济建设的需要密切联系起来。^[11]在1958年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建议工业学校建立附属工厂、农业学校建立附属农场、

派遣教师入住合作社,^[12]使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教师队伍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科学研究、传播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以科学知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在政治建设方面,教师以智识育信念。钱俊瑞在《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中区分了“人民教育”与“资产阶级所谓的劳动教育”。资产阶级所谓的劳动教育“仅仅是资产阶级为了培养他们自己更有效和更驯良的工资奴隶的工具”,而“我们是要通过人民教育使我们的劳动人民为了巩固与发展自己已经得到的胜利,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国家主人翁的地位”。^[13]由此可见,教师在教育的过程中通过唤醒民众的政治觉悟,帮助广大民众树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促进我国的政治建设。

在文化建设方面,教师通过对学生的教育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1966—1976年,我国社会文化建设遭受重创,社会风气遭到严重破坏。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说到:“我们现在要把风气扭转过来,这就要求学校培养好的风气。要有爱劳动、守纪律、求进步等好风气、好习惯。教师有责任把这些好风气带动起来。”^[14]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教师队伍通过对学生的教化来净化社会风气,创设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1976年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氛围,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当时的文化建设。

3. 兴教之源:作为教育改革主力军的教师(1978—2012年)

1978年12月,改革开放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面对改革开放,教育界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对接历史,以回归正常轨道。教育改革也首先从思想观念层面展开,对教师作用的认识逐渐深化,意识到了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因此要提高教师待遇。邓小平将教育工作者与科研人员并列,提出要改革工资政策,努力提高教师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推动思想观念上的“拨乱反正”。教师的地位得到了承认,然而,经历了动荡的一代知识分子在80年代拿起课本、走上讲台、重执教鞭时,由于缺乏教育基本训

练,他们的教学能力捉襟见肘,教育改革的步伐落后于经济及社会的发展。

为加快改革进程,党对教师除了在思想观念上承认其地位、物质上提高其待遇,更认识到教师积极参与对教育变革的推进作用,为其主体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更多机会。1985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文件指出,“在教育体制改革中,必须紧紧地依靠教师,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15],通过完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方式保障教师参与民主管理的权利。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强调,教师要“精心组织教学,积极参加教育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16]。1999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建设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基本保证”^[17]。教育改革最终聚焦于教师本身的变革上,教师成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力军。

除了推进教育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进入21世纪,教师队伍的结构优化及教师管理政策的综合改革成为解决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校际差距等不公平问题的基础。2007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2012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合理配置教师资源,改善教师资源初次配置”^[18],逐步建立和完善县域内校长、教师交流的政策措施,创新教师补充机制,为巩固“两基”“两全”攻坚成果、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4. 追梦之范:作为新时代筑梦人的教师(2012—2021年)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的伟大构想,开启了新时代的筑梦篇章。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会中讲到:“‘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一颗丹心,一生秉烛铸民魂。’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广大

教师就是打造这支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19]

步入新时代，党对教育方针的论述体现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亦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立德”要求教师立德垂范，加强自身思想道德修养，做学生的道德模“范”；“树人”则唤醒广大教师的从教初心，澄清自身教育理想，提供“范”本与方向。新时代教师承担着立德树人的职责使命，示范作用更加凸显。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致慰问信，“希望全国广大教师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增强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20]。

新时代的教师队伍高度凸显师德建设。2018年颁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把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摆在首要位置，并制定了“到2035年，教师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大幅度提升”^[21]的目标。

作为新时代的筑梦人，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22]。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广大教师要“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23]。2019年3月，他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对新时代思政课教师进一步提出了“六要”即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的更高的要求。^[24]

新时代教师是师德更为高尚、思想更加深刻、素质更为全面、学识更加扎实的优秀人才，他们以自身的道德修养、思想情怀、完整人格、专业经验为学生作出示范，帮助学生筑梦、追梦、圆梦。

二、党和人民满意的好教师的要求

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教师队伍建设的百年

历程，党和人民对好教师的要求体现在四个方面，即道德高尚的示范者、业务精湛的专业者、学生成长的引导者、社会文明的传播者。

1. 道德高尚的示范者

师者，人之模范也，无德者无以为师。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至今，一直把道德品质作为培育优秀教师的重要标准。1950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教师要为人师表，“成为少年儿童道德的表率 and 行为的模范”^[25]。改革开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文件对教师的道德素养作出规定。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将“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作为教师的首要义务。^[26]《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加强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将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和教学实绩，作为选聘教师、评定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和确定待遇的主要依据”^[27]。无论是将道德作为教师首要义务，还是将道德作为教师选聘、评价和确定待遇的主要依据，都是党和人民对好教师高尚道德的明确要求。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对好教师的道德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提出了“四有”好教师的要求，其中，理想信念、道德情操、仁爱之心彰显了道德高尚作为好教师标准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好老师首先应该是以德施教、以德立身的楷模。师者为师亦为范，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老师是学生道德修养的镜子。好老师应该取法乎上、见贤思齐，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提升人格品质，并把正确的道德观传授给学生。”^[28]2018年9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2.0的意见》，将师德养成教育作为培养卓越教师的首要举措。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也明确要求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29]。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树人必先立德。

教师的道德素养不仅会影响教育工作的质量,还会影响学生的品行,继而影响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教师只有严于律己,不断提高个人道德水平,确保自身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才能够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才能够为国家培养出栋梁之材。因此,党和人民满意的好教师必须是道德高尚的示范者。

2. 业务精湛的专业者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教师职业是一个对专业素养要求较高的职业。教师的专业性体现在其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理念等诸多方面。党和人民满意的好教师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熟练的专业技能以及先进科学的专业理念。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对教师的专业性作出了要求。1950年4月,党在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大会上明确表示:教师若想树立威信“中心问题是要教好功课”,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教师“必须了解少年儿童的心理、兴趣和特点,关心他们”,运用正确的教育方式引导学生的发展方向。^[30]

改革开放后,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等文件,对教师的专业性提出了具体的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明确指出“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教师的义务包括“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守规章制度,执行学校的教学计划,履行教师聘约,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31]为了履行上述义务,教师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专业技能。2000年,教育部发布《〈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对教师的专业性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规定申请认定教师资格者必须“具备承担教育教学工作所必需的基本素质和能力”^[32]。扎实的知识功底、过硬的教学能力、勤勉的教学态度、科学的教学方法是教师的基本素质。^[33]

新时代以来,新的发展阶段对教师专业性提出了新的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在信息时代做好老师,自己所知道的必须大大

超过要教给学生的范围,不仅要有胜任教学的专业知识,还要有广博的通用知识和宽阔的胸怀视野”^[34]。2018年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指出,在新时代我们应当“造就学科知识扎实、专业能力突出、教育情怀深厚的高素质复合型教师”^[35],从专业知识、专业能力、教育情怀三个方面对新时代教师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高素质复合型的专业表现。好教师应当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不断学习、持续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丰富自身的专业素质,与时俱进,成为业务精湛的专业者。

3. 学生成长的引导者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隐喻彰显了教师对学生成长的重要作用。教师的本职工作是“育人”,即培养品学兼优的学生,肩负社会未来发展的希望。因此,党和人民满意的好教师必须成为学生成长的引导者。

在革命战争年代,教师对青年进行启发引导,帮助青年学生走上革命的正确道路,为新中国的成立培养了革命人才。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建设时期的教师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技能,还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培植学生的爱国情怀、奋斗精神与良好的政治素养,引领学生成长为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投身祖国的发展建设,投身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1978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教师是培养革命后代的园丁。”^[36]教师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就是对国家的贡献”^[37]。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更加注重教师对学生成长的引导作用。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明确规定了教师引导学生成长的具体使命,即“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38]。1996年,江泽民同志在教师节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教师“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为社会主义祖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建设者和接班人”^[39]的辛劳付出。2005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中提到“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青少年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并要

求教师自觉地履行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以高尚的情操引导学生全面发展。^[40] 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规定：“教师要关爱学生，严谨笃学，淡泊名利，自尊自律，以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教育感染学生，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41]

步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发挥教师的示范作用以引导学生成长。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广大教师必须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引导和帮助学生在把握好人生方向，特别是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42] 习近平总书记对好老师在引导学生方面作出了具体的阐述：“好老师对学生的教育和引导应该是充满爱心和信任的，在严爱相济的前提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学生‘亲其师’、‘信其道’。”^[43] 2016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考察时强调：“广大教师要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44]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将“四个引路人”的要求写入《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党和人民满意的好教师，不仅要引领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还要在教育过程中因材施教、宽严相济、充满耐心和责任心，呵护学生的健康成长，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做一名优秀的引导者。

4. 社会文明的传播者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的本职任务在于传播社会道德文明、传授专业文化知识、解答学生在学习当中的困惑，排在第一位的是“传道”。胡锦涛同志曾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表示：“教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教师是知识的重要传播者和创造者”。^[45] 党和人民满意的好教师应当是社会文明的传播者。

在革命战争年代，教师通过向工农大众传播先进的政治思想和革命文化，唤醒了民众的

觉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毛泽东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46] 因而，传播革命文化对革命斗争的胜利至关重要。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共产党多次对教师应当传播的社会文明具体内容作出要求。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指出，教师的义务之一在于“对学生进行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的教育，法制教育以及思想品德、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组织、带领学生开展有益的社会活动”^[47]。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强调：“好老师应该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积极传播者，帮助学生筑梦、追梦、圆梦，让一代又一代年轻人都成为实现我们民族梦想的正能量。”^[48] 除此之外，好老师还应当把正确的道德观传授给学生。^[49]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强调“教师承担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的历史使命，肩负着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时代重任”^[50]。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要求教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规范有效传授给学生”^[51]。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教师群体在各个历史阶段传播先进的文化知识、理想信念和道德准则，促进我国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在革命年代，教师传播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信仰，唤醒广大民众的革命意识，培植工农大众“人民当家作主”的觉悟，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在和平发展年代，教师传播道德规范和社会主义文化，助力社会主义文明和道德建设。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发展时代，党和人民满意的好教师始终是社会文明的传播者，他们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指导思想，传承革命的红色基因，传播时代的先进文化，培植学生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断促进社会进步。

三、中国共产党教师队伍建设的百年经验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52],构成关于教育论述的九个坚持之一,强调了教师队伍建设对于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地位。这一重要论断,是对党的教师队伍建设百年经验的科学总结。在新时代造就党和人民满意的教师队伍,需要学习与继承党百年来教师队伍建设的经验。

1.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教师队伍建设指引方向

我国教师队伍建设的伟大成就首先得益于始终坚持党对教师队伍的全面领导,以其总揽全局的领导体系、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方略、一脉相承的教育方针实现着对教师队伍的全面领导,为教师队伍在数量上稳步扩充、质量上渐进跃升、结构上趋于优化指引方向。

在教师队伍建设工作中,党建立了协调各方的领导体系,形成了中央组织进行顶层设计、地方组织为责任主体、基层党委进行基层建设和探索的工作格局,为总揽全局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央作出工作指示、指导思想、总体目标与重点任务,地方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及地方政府需承担考核,将工作任务的完成列入业绩重要内容。学校党组织抓好党建工作,将党的教育方针贯彻到教师培训、教师教育的各环节。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各级各类学校,党组织以统一的指导思想进行战略布局,形成各方合力,使得教师队伍建设得以稳步推进。

党始终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53]。人民教师从人民的需求出发开展教育工作,不忘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同时,作为社会代言人,坚定拥护党所代表的政治理念,成为党与人民之间的紧密纽带。

百年来,党的教育方针既与时俱进,又一

脉相承。面对不同的时代任务,与时俱进地对“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作出阐释,并以此为中心展开教育工作。“始终遵循‘培养人’的逻辑主线”^[54]是党教育方针的传承,实现着教育培养人的本体功能。中国共产党既与时俱进又一脉相承的教育方针,牢牢掌握了教育之舵,为教师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

2. 高度重视教师地位,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尊师重教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继承着这一优秀血脉,在革命战争、新中国成立及社会主义建设等历史时期,都高度重视教师地位。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教师等知识分子对革命胜利的攻坚力量,认为教师是办教育的前提,教员能为社会运动及民众的文化教育提供服务。在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时期,毛泽东高度肯定了知识分子的重要贡献。“在长期的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动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55]争取与吸收教师等知识分子,是赢得民族解放与建设新中国的重要条件。

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56]他倡导全社会尊师重教。1985年1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广大教师拥有了自己的节日,职业认同感极大增强。教师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逐渐得到重视与保障。为加强教师的政治与社会地位,党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先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

每年的教师节前后,党以召开座谈会、发表讲话、书写慰问信、表彰优秀教师等活动,

向人民教师致以祝贺与问候。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表示：“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57]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瓦尔基基金会编制的2018年《全球教师地位指数》显示，中国在全球教师地位排名中遥遥领先，81%的受访者认同尊师重教理念。^[58] 党和领导人在尊重、爱戴教师方面作出了表率，带领全党、全社会形成了尊师重教的优良风气。

3. 重视发展教师教育，提升教师专业素质

教师教育是教育的母机，开展教师教育是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环节。出于对教师地位的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同样非常重视教师教育，以会议为基础、以政策为导向指导教师教育工作，与时俱进，不断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提升教师队伍的质量。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当时教师的专业素质状况有着深刻的洞察，结合实际进行教学，密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构成了教师专业素质的重要内容。毛泽东非常重视教师的道德素养，高度推崇授业恩师徐特立“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道德情操与人格魅力。这一时期的师德主要表现为为社会革命贡献力量、为他人奉献、为人民服务的情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于1951年8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明确了师范教育的重要地位，“师范教育，对于各级师资的培养与提高，又是整个人民教育事业能否办好与能否发展的关键”^[59]。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要“普及教育，培养出一支数以万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巨大任务之一”^[60]。在这一时期，提升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与专业能力是重要目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师范教育也迎来了春天。1980年，中共中央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确立了“高等师范本科培养高中教师，专科培养初中教师、中等师范学校和幼儿师范学院培养小学和

幼儿园教师”^[61]的三级师范教育体系。1986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关于加强和发展师范教育的意见》，规定综合性大学等有条件的高等学校承担中等师范教育培训工作，教师教育体系开始走向开放。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颁布，1995年《教师资格条例》颁布，规定了取得教师资格应具备的学历要求，从教师入职环节即着力保证教师质量，成为提升教师专业素质的有力举措。

21世纪以来，为了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中国共产党着手建设教师教育体系。2004年，教育部印发《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构建以师范大学和其他举办教师教育的高水平大学为先导，专科、本科、研究生三个层次协调发展，职前职后教育相互沟通，学历与非学历教育并举，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终身学习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62]。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为此，要完善培养培训体系，积极推行师范生免费教育，构建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综合大学参与、开放灵活的教师教育体系。^[63]

进入新时代，随着教师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的发布标志着21世纪以来我国教师教育培养目标由基本“合格”走向更高层次的“卓越”，^[64]并制定了“到2035年，教师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培养造就数以百万计的骨干教师、数以十万计的卓越教师、数以万计的教育家型教师”^[65]的目标。我国的教师队伍建设也实现了从“追求数量”到“重视质量”的转变，教师队伍走向了更为专业化的道路，专业素质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4. 创设良好工作条件，增强教师职业幸福感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尊重教师，肯定教师的辛勤工作与伟大贡献，努力为教师服务，让教师热心从教、安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

教师工资待遇问题受到了党的持续关注，即使在有限的社会条件下，亦尽力保障教师的

应有待遇。早在 1954 年，在国家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谈到教师待遇，邓小平就指出，“现在要普遍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是很困难的，但是真正有本领的教授、副教授、高级工程师、高级医生以及其他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工资待遇，应该提高”^[66]。1987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提高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的通知》，决定从 1987 年 10 月起，将中小学教师和幼儿园教师现行的工资标准提高 10%。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可以在不超过工资标准提高 10% 的增资总额范围内，根据本地区实行情况，将增资总额的大部分用于提高工资标准，小部分用于调整中小学教师内部的工资关系。^[67] 199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将“寒暑假期的带薪休假”规定为教师的一项基本权利。1993 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要求，“教育系统平均工资要高于当地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水平”^[68]。为了依法保障教师投身教书育人事业且长期从教、终身从教，2009 年起，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开始实施绩效工资制，极大地提高了教师的职业吸引力。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随着办学条件不断改善，教育投入要更多向教师倾斜，不断提高教师待遇”^[69]，要求继续提高教师待遇，为教师营造良好的工作条件。

在提高教师待遇、明确教师权利的基础上，为了保障教师权益及待遇政策的落实，中央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199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把“按时获取工资报酬”等权利通过法定形式规定下来。除了保障教师基本的经济权利，教师参与治校治学的机制也逐步得到完善，要求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保障教职工参与学校决策。在新时代，党更加凸显教师职业的公共属性，强化教师承担的国家使命和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确立公办中小学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特殊的法律地位，明确中小学教师的权利和义务，强化保障和管理。

此外，党和政府从住房、医疗、养老等方面出发，切实解决教师的生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对教师的住房、医疗及养老等问题做了法律规定。关注农村教师生活问

题，启动“安居工程”，并对农村教师进行针对性帮扶与补贴，逐步落实教师公租房优先和优惠的政策。2018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要求，继续健全教师社会保障制度。鼓励地方政府将符合条件的农村教师住房纳入当地住房保障范围统筹予以解决。^[70] 为减轻教师工作负担，让教师静心从教，2019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要求“切实减少对中小学校和教师不必要的干扰，把宁静还给学校，把时间还给教师”^[71]。为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提供服务，增强了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总之，百年来，党以全面领导为教师队伍建设指明着前进的方向，重视教师的地位，通过开展教师教育，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增强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带领教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新时代需要我们继续探索，努力造就让党和人民更加满意的教师队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

参考文献：

- [1] [2] [4] [6] [7] [8] [9] [12] [46] [55] 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99. 42. 111. 53. 116. 74. 208. 272. 99. 74.
- [3] [5] 李桂林. 中国现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9. 7.
- [10] [11] [13] [25] [30] [59] [60] 何东昌.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M].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6. 22. 23. 13. 13. 108. 859.
- [14] [36] [37] [56]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54. 95. 96. 108.
- [15]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5（15）：

467-477.

[16] [68]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通知 [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1993 (4): 143-160.

[17]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J]. 人民教育, 1999 (7): 4-7.

[18]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 [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12 (26): 39-42.

[19] [28] [33] [34] [42] [43] [48] [49] [57] 习近平. 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4-09-09 (1).

[20]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致慰问信 [EB/OL]. (2013-09-09) [2021-05-21].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9/09/c_117294186.htm.

[21] [35] [50] [65] [70]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N]. 人民日报, 2018-02-01 (1).

[22] [24] 习近平.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J]. 求是, 2020 (17): 4-16.

[23] 习近平.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N]. 人民日报, 2016-12-09 (1).

[26] [31] [38] [47] 中国政府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EB/OL]. (2005-05-25) [2021-04-25]. http://www.gov.cn/banshi/2005-05/25/content_937.htm.

[27] [62] 2003—2007 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N]. 人民日报, 2004-03-31 (11).

[29] [5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N]. 人民日报, 2019-10-28 (1).

[32] 教育部网站. 《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 [EB/OL]. (2000-09-23) [2021-04-25].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1/moe_621/200009/t20000923_180473.html.

[39] 江泽民向广大教师祝贺节日 [N]. 人民日报, 1996-09-11 (1).

[40]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 [J].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05 (3): 3-5.

[41] [63]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J]. 人民教育, 2010 (17): 2-15.

[44] 努力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考察时的讲话引起热烈反响 [N]. 人民日报, 2016-09-11 (2).

[45] 何东昌.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2003—2008) [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 1460.

[52] 牢牢把握教育发展的“九个坚持”——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教育大会重要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8-09-14 (2).

[53]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8.

[54] 秦惠民, 曹翼飞. 建党百年来党的教育方针的传承与创新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1 (4): 11-17.

[58] 《全球教师地位指数》报告: 中国人最尊师重教 [J]. 中国德育, 2019 (1): 5.

[61] [64] 中国昌. 中国师范教育发展史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1: 238. 272.

[66]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210.

[67] 国务院关于提高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的通知 [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1987 (28): 931-932.

[69]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N]. 人民日报, 2018-09-11 (1).

[71] 教育部网站.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EB/OL]. (2019-12-15) [2021-05-21].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1912/t20191215_412081.html.

(责任编辑 刘 红)

**Strive to Create a Team of Teachers Satisfi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eople
--The Centenary History and Experi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eng Jianjun Miao Shuangshuang Gao Zhan

党的百年教育研究

Abstract: Education is the basic of a one-hundred-year strategy of a nation. Teachers are the foundation of educ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e hundred years ago, it has alway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staff.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intellectuals and teachers spread advanced revolutionary ideas, becoming the backbone of carrying forward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In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eachers have become important support for social construction by promoting production with technology, cultivating faith with intellectual knowledge and building new social atmosphere with educ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tatus of teachers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teachers have become the main force of education reform. Entering the new era, teachers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of achiev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becoming the dream-builders of the new era. Recalling the centenary histor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team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s requirements for good teachers are as follows: a noble moral model, a skilled professional, a guide for students' growth, and a disseminator of social civilization. In order to make great efforts to build up a contingent of teachers that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are satisfied with,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tingent of teach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tinue to adhere to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for the teacher team,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promoting the status of teachers, improve teachers'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enhance their vocational happiness.

Key words: 10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Teaching team construction; Historical experience

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的百年审思

李松楠 杨兆山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 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根植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内蕴社会主义教育人民性的价值追求, 反映“人民满意”的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目标。结合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使命, 梳理从“教育为工农服务”到“教育为人民服务”再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百年教育思想发展的演进逻辑。总结教育历史经验、探索实践方略, 坚持党对教育的全面领导, 处理好党性与人民性的内在统一关系, 坚守人民立场, 建构公平有质量的教育体系, 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 以人民为中心; 教育发展思想; 人民性; 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1) 06-0027-08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是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总结提出的重要思想, 内蕴着“为什么人办教育”“办怎样的教育”等重大问题, 不仅体现着党和国家办教育的价值立场和目标方向, 也确证着办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实践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一重要原则的创造性应用, 是对教育根本目的和价值立场等问题的科学认识。追溯这一思想的百年流变, 明晰演进逻辑, 总结历史经验, 为新时代更好落实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方略。

一、价值立场: 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的历史必然性

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 人民作为一个类概念, 是一种集合性的存在, 其内涵指向个体的

人与类的人的有机统一。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就是坚持人民的教育主体地位, 教育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教育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具体而言, 在教育主体上, 秉持办教育的人民立场, 以人民为教育的价值主体和实践主体; 在根本目的上, 实现个体的解放与类的解放相统一, 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发展为旨归; 在动力方法上, 从人民对教育的现实需求出发, 依靠人民办教育, 发挥人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从人民中汲取办教育的智慧和经验; 在评价标准上, 以人民为教育评价的主体, 办教育以“人民满意”为根本标尺。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的政党,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既是历史必然, 也是时代之需。

1. 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反映着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在关于“什么

收稿日期: 2021-04-29

基金项目: 2018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子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研究”(1804033)

作者简介: 李松楠, 女,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研究; 杨兆山, 男, 教授,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研究。

是历史真正的主体”这一论争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人民从各色的唯心主义宿命论中解放出来，认为历史不是源于精神的一种“精神存在”，能够创造、拥有历史并为之不断“斗争”、推动其发展的是“现实的人”，历史的首要前提就是有生命的“人”的存在。现实的世俗基础使“现实中的个人”集合为一个整体，这个集合体在追求自身目的时产生的活动就建构出了客观的、连续性的历史过程。“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 这些观点清晰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宰者和创造者，是决定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人民，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

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劳动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旨在建立一个人人自由平等、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未来代替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2]。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思想体系中，人的全面发展是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马克思主义在追求人的解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道路上重视教育的作用，把实施全面教育作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是基于人的解放立场形成的科学思想理论，是社会主义教育目的的理论基础，这使得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始终保有人民性初心。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成立初期就明确提出“成立劳工补习学校和劳工组织讲习所”，旨在对广大劳工进行文化教育的教育政策；在中华苏维埃时期，党提出了让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的教育方针；新中国成立后，党坚持“教育为工农开门”的办学价值取向；改革开放以来，党秉持“实现共同富裕”与“为人民谋幸福”的教育初心，把教育“为人民服务”写入教育方针，把“人民满意”作为教育发展的目标取向。党的教育事业已历百年，坚守的价值立场始终如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这

一思想反映着党办教育的人民立场，蕴含着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和人的解放的终极关怀，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2. 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内蕴着社会主义教育的人民性

教育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构成了教育理论研究中的“两大关系”主线。以往研究在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上，主要强调教育对个体的培养；在论及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的问题上，则重在分析教育对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功能和作用，不同程度地存在剥离开“人”来谈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理论倾向。而社会正是由“类”的人所构成，“类”的人作为一种哲学概念，并不是个体的简单相加，只有重申教育中“个体”的人与“类”的人的统一，才能够完整地、正确地认识教育的“两大关系”问题。人的集合性存在构成了社会，个体通过聚合使其在获得个体性的存在的同时也获得了集体性。“这种集合性的存在就是人民，其得以维系的基础就是由生产和交往而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即我们常说的社会，所以人的社会属性的另一方面就是人民性。”^[3] 由此，当我们试图勾连起教育、社会、人三者发展的内在关系时，“人民性”概念就进入了教育理论的视野。

教育的人民性是一个具有“类”属性的概念，其内涵指向个体发展与类发展的统一。以教育的“两大关系”为逻辑起点，可以得出教育要兼顾社会和人的双重需求。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是社会的主人，在制度层面消灭了几千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立，这就在立场和出发点上使社会和个人有了统一的前提。教育的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在教育领域的体现，这也就回答了消灭社会中的阶级对立后，社会是人民的社会，社会的需要和人的需要在总体上就有了根本利益基础上的一致性。在教育上，“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和“办社会需要的教育”，即“教育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和“教育为社会培养所需人才”，在本质上就具有了内在的统一性。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教育的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属性。

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历程中，教育的人民

性始终是构成中国共产党教育事业的价值轴心。“党在不同时期对教育的其他性质的论述，最终是为了充分实现教育的人民性，这是党的教育事业，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性质。”^[6] 百年来，党在教育方针表述上有很多变化，但为人民服务一直是党办教育的根本宗旨。从教育的“二为服务”到教育的“四为服务”，“教育为人民服务”始终不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从教育主体到价值目标，从出发点 to 落脚点，无不证明着人民性是我国教育的本质属性，而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正是教育的人民性在我国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

3. 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体现着“人民满意”的教育改革发展目标取向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在新时代的具体教育目标。“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6] 是新时代教育发展总要求。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回应“办怎样的教育”这一重大教育问题的总纲，人民满意既是评价标准也是发展方向。人民满意强调的是既要办好合目的性的教育，也要办好合规律性的教育，让人民满意成为中国共产党办教育的“第一规律”，而尊重、遵循教育规律又是实现人民满意的先决条件。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教育发展，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既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实践路径，也是回应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时代要求。

教育改革是实现人民满意的有效途径，同时人民满意也是衡量教育改革成效的根本标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全面发展，教育公平持续推进，教育质量不断提升，人民的教育获得感不断增强。然而现阶段，我们的教育也仍然或多或少存在人民不满意的地方，诸如，我国教育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的需要还存在差距，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优质教育供给能力不足，与人民群众需求个性化、多样化之间的矛盾仍没有彻底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必须在实践推进的过程中探寻解决的路径，教育问题的解决也是如此，“教育实践问题在教

育实践改进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6]。面对我国教育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新特点，当前教育改革发展将以不断满足人民对更好更公平的教育需求为导向，要在办学体制、经费投入体制、管理体制、考试就业制度等方面积极推进改革，不断深化教育领域改革，构建人民满意的高质量教育体系。

二、演进逻辑：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历程中，始终把人民作为办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既取决于党的性质和宗旨，也在于教育作为重要战线，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7]。从百年的历史看，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经历了从初始到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逐步发展为科学、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办教育打破了几千年封建桎梏，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最终指向增进人民的福祉。

1.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教育为工农服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农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教育事业的教育主体。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第一个决议》提出在各单位中成立“劳工组织讲习所”和“劳工补习学校”等面向工农群众的学校，旨在对中国社会中广大普通劳工进行扫盲、文化教育。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提出实行教育普及，并强调女子应享受政治、经济和教育上的平等权利。在党成立初期阶段，工人补习学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夜校等一系列群众性教育活动应运而生，对提升工人和农民阶级思想意识和文化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

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时期，从革命斗争出

发，中国共产党开始重视教育权问题。1931年，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提出，“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8]。1934年，毛泽东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9]。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了新民主主义时期我国教育的根本性质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一教育根本性质的规定是中国共产党在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上的伟大创见。这一时期，在战争背景下，教育作为“社会革命”的一环，是使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重要手段。中国共产党广泛开展群众教育、识字运动，开办各种补习所，创办“抗大”与“女大”等战时学校，都印证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办教育的宗旨与决心。

新中国成立后，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教育思想，经历了教育为工农服务到教育为人民服务的转向。1949年12月，党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首次就“为什么人办教育”这一问题作出明确回答，即教育“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10]。后又提出学校为工农开门等教育政策，都在反复强调工农群众的教育主体地位。毛泽东也曾指出，中国教育史中，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等思想都反映了我国教育具有人民性的一面，但“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11]。

总的来看，中国共产党坚持办教育要为工农服务的根本宗旨，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满足工农群众需要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教育，使工农群众真正成为文化教育的主体。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教育以提高工农文化水平、培养建设国家的人才为宗旨，使受教育者全面发展，

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工农”代表着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教育为工农服务成为新民主主义时期和建国初期的时代强音和鲜明标识，标志着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旧教育的彻底变革。但囿于阶级划分等特定的时代社会因素，“工农”与“人民”之间仍存在价值区分和实践差异。随着社会的发展，“工农”向“人民”的演变成为教育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

2.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教育为人民服务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首先体现在回应现代化人才培养的问题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把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主要任务逐渐转移到经济发展上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保证人民群众受教育权利的基础上，党还充分考虑了现代化建设需求和人才需求。例如，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人民群众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作出规定；1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培养的人才“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12]。“四有新人”的提法表明所培养的人才最终要为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而服务。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凸显中国共产党办教育的初心与使命。

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旨在提高民族整体素质。党的十四大以来，教育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先进文化”的关键一环，逐渐成为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实现民族振兴和提高整体民族素质。这一时期，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将教育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为什么人办教育”问题关涉教育价值取向，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坚持教育与实践相结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13]把教育“为人民服务”列入教育方针，回应了我国“为人民”办教育的价值立场。

进入 21 世纪，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理念。教育作为民生工程的重要一环，把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作为教育的目标，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指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14]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把人民满意与否作为衡量我国教育的重要目标导向和评价标尺，确证了人民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内核。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的内涵不断丰富，逐步形成科学的思想体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引领时代发展价值理念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式提出。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和起点上，党中央把教育事业作为民生之首，^① 提出努力办好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增强人民的教育获得感。从历史和现实双重维度看，“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是新时代以人民为根本价值立场的教育发展思想的最新表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在教育领域的必然要求，也是认识与把握新时代教育主要矛盾的客观诉求。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在价值立场上，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赓续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的人民立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5] 秉持办教育的人民立场就是要以人民为我国教育的起点和目的，在教育实践中生动诠释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价值宗旨。在教育主体上，把人民作为教育的价值主体和实践主体，“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6]，重申人民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正是教育的人民性在我国教育中的具体体现；在根本目标上，强调以增强人民的教

育获得感为旨归。获得感包含着“给”与“得”的辩证法，它更强调一种实实在在的“得到”，可测量、可感知。教育获得感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只有抓住人民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在共建共享中不断增强人民的教育获得感。

概括来说，百年来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在初始和形成发展的过程中，遵循着“变”与“不变”相统一的原则。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始终不变的是教育的根本立场，中国共产党秉持教育的人民立场，无论教育在不同时期的价值使命如何，党办教育的人民立场从未动摇；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理论内涵。伴随着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我国教育经历了从为“政治服务”到为“经济服务”、从“文化建设”到“民生工程”的转变，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的内涵也随之完善；在对教育主体的认识上，明确了教育主体从“工农”到“人民”的科学转变；在培养目标上，对全面教育的认识，百年来经历了从“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到“德智体美等方面”再到“德智体美劳”的变化过程。党对人才培养规格和全面发展以及全面教育的认识不断深化，推进了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的科学化进程。

三、实践方略：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曲折复杂的艰苦奋斗中，在各个历史阶段教育都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的实践经验，不仅有助于新时代教育思想理论的创新，提升其实践解释力与理论指导力，同时也为新时代更好践行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提供借鉴。

1. 坚持党的领导，实现党性与人民性的内在统一

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既反映着社会主义教育的人民性，也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根本要求。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教

育是人民的教育，教育在其性质上具有人民性。反映在教育实践中，教育的人民性就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为人民办教育和依靠人民办教育有机统一起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均是人民现实需求的体现，在教育中坚持党性则主要体现在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教育的领导。在教育领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在此意义上我们讲党性与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17]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党始终秉持办教育的初心，领导我国教育事业从“普及”到“提高”，从提升“全民文化素质”到不断满足人民对“更好更公平”教育的追求。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教育事业正不断向实现教育现代化、跻身教育强国行列迈进。百年教育实践证明，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在更高水平上保证了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统一，是我国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根本保证。我国教育要把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同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相结合，确保党性与人民性在教育上的统一。只有坚持党对教育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发展思想才能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2. 坚守人民立场，以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立场，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一脉相承。坚守教育的人民立场，基于人民、依靠人民和为了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目标和理想。“为什么人办教育”的问题反映着教育的价值目标追求和取向，是判断教育究竟为谁服务的根本标尺。在这一核心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探索中，从“教育为工农服务”到“教育为人民服务”，再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根本立场——人民立场的坚守。

马克思主义畅想建构一个以劳动人民自己为发展目的的社会组织，在那里一切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是最高目的。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理论的内涵指向“个体”人的全面发展和“类”的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史上，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即“类”的人的全面发展始终是党办教育的不变主题。而在对个体的全面发展的认识上，党从“三育”到“四育”再到“五育”认识的演变反映了对于培养人的认识不断深化，个体在教育中更好地实现了全面发展。百年教育实践表明，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教育发展的鲜亮底色，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基础。

3. 推进教育公平，建构人民满意的高质量教育体系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懈追求的价值理想。百年教育实践中，从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受教育权”到“均衡教育资源”再到“教育优质均衡”，党对教育公平的追求一直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内驱力。教育公平具有人生起点的重要意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为每个个体提供更好更公平的教育，个体通过接受教育实现全面发展，过上美好生活，教育就实现了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促进作用。社会不断促进教育公平，将教育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从根本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在此意义上，教育公平是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的基本要求。

“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是有机统一的整体”^[18]，实现高质量基础上的教育公平，是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的目标追求。全面推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是建构人民满意的高质量教育体系的两个重要支点。没有以公平为前提的教育质量提升，优质教育只能是少数人独享的盛宴，必然加剧社会的不公平，亦悖于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立场；而低质量的教育公平，最多只是低层次上的平均与共享，不是社会主义教育公平的应有之义。“人民满意的教育，就是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19]新时代，在党的领导下，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发展思想为价值引领，努力构建人民满意

的社会主义高质量教育体系，持续在“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上下功夫，使全体人民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使每个人都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和造福人民的能力。

注释：

①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社会进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第八点论及“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即关涉国家重要的民生问题上，教育被放在就业、收入、社会保障体系等诸多问题之前，作为民生工程的第一个问题，进行重点论述，这也印证了我国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教育是民生之首。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4.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91.
- [3] 林尚立. 论人民民主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3-4.
- [4] 石中英. 中国共产党关于教育性质问题的百年探索 [J]. 重庆高教研究，2021（1）：3-11.
- [5] 习近平.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N]. 人民日报，2018-09-11（1）.
- [6] 余清臣. 基于教育实践问题的教育理论实践应用机制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9

（9）：9-16.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60.

[8]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 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 [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234.

[9] 人民教育出版社. 毛泽东论教育 [M]. 3版.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7.

[10]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 [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8.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7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98.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22.

[13]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32.

[14] 胡锦涛. 胡锦涛文选：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42.

[15]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2016-07-02（2）.

[16] 习近平.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2016-05-10（2）.

[17] 杨兆山，陈煌. 坚持办教育的人民立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全国教育大会重要讲话精神 [J]. 现代教育管理，2019（1）：1-7.

[18] 王炳林，郑丽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 [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5）：25-32，156.

[19] 杨银付.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若干思考 [J]. 教育研究，2013（1）：4-9.

（责任编辑 吴潇剑）

Centennial Reflection on the Thought of People-centere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Li Songnan Yang Zhaoshan

Abstract: The thought of people-centere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s rooted in the people's position of Marxism, contains the value pursuit of people-oriented socialist education, and reflects the education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goal for people's satisfaction in new era. Combining with the value and mission of educatio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e paper sorts out 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thoughts from "education serving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to "education serving the people" and then to "education developing for people-centered" in one hundred years. Summarizing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education and exploring practical strategies,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over education, properly handle the internal unity between the Party spirit and the affinity to the people, adhere to the people's position, build a fair and 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and constantly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

Key words: People-centered; The thought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The affinity to the people; People'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Marxism educational thought

(上接第 15 页)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irst Issue of the Journal

Wang Hongbin

Abstract: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journals are the main position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and the first issue of the journal reflects the pul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starting of the CCP Journal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a series of journals named after "Zhong", "Ren" and "Xin" quickly established the national ideology of New China. The CCP Journal, represented by Red Flag, set the research keynote of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opened up a new situation in the stud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he new era of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journals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journals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have formed three major supporting systems, showing the developing tendency of "five modernizations", and pushed th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to enter the new booming period.

Key words: The first issue of the journ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Booming

监测之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 合理性及其价值

王战军¹ 杨旭婷² 刘 静³

- (1.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 100081;
2. 河南大学, 河南 开封 475004;
3.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要: 监测是人们认识、了解事物的一种方式, 是一种获取并处理信息的认知活动。以监测来认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 是由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和监测二者特性共同决定的。一方面,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多元主体性、内容复杂性、过程重要性呼唤符合其发展特点的新的认识评价模式; 另一方面, 与以排名为代表的传统学科认知模式相比, 监测具有认知对象上更为关注过程、认知内容上体现复杂思维、认知过程上回归学科内生、认知依据上基于数据判断的典型特点。以监测来认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 能够发挥监测呈现状态、预警预测的基础功能, 也具有创新学科认知模式、提升学科治理能力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 世界一流学科; 建设状态; 学科监测; 学科评价

中图分类号: G6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1) 06-0035-10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是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基础, 一流学科的建设发展状况直接关系着“双一流”建设的最终成效。在我国首轮“双一流”建设进入收官阶段的关键时期, 系统考察、客观呈现、科学分析我国一流学科建设发展情况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监测评估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持续收集和深入分析有关数据, 直观呈现高等教育状态, 为多元主体价值判断和科学决策提供客观依据的过程。^[1] 其时间尺度密集、空间尺度多样、价值尺度多元的特点为我们科学认识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目前, 一些学者探讨了世界一流学科

建设监测, 并从“双一流”建设的政策要求、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趋势^[2], 以及清理“五唯”、创新教育评价模式^[3]等视角解释了开展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這些已有的研究均是从监测对象——世界一流学科外部出发来分析监测之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合理性, 而从世界一流学科这一本体视角解释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为什么要开展监测的研究却相对不足。

监测是人们认识、了解事物的一种方式, 是一种获取并处理信息的认知模式。从本体视角来看, 开展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监测并不只是

收稿日期: 2021-05-0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互联网+’时代研究生教育管理变革与创新研究”(71834001)

作者简介: 王战军, 男, 教授, 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 主要从事“双一流”建设与评价、研究生教育研究; 杨旭婷(通讯作者), 女, 讲师, 河南大学教育学部, 主要从事“双一流”建设与评价、研究生教育研究; 刘静, 女, 助理研究员, 河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主要从事“双一流”建设与评价研究。

政策要求和技术发展等外部力量的推动,更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本身创新认知模式的诉求。这一诉求和监测认知模式之间的逻辑契合从根本上解释了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监测的合理性,是我们开展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监测的核心动因,也正是这种逻辑契合,赋予了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监测的重要价值。

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呼唤认知模式创新

在以往学位授权点建设、重点学科建设的基础上,进入“双一流”建设发展阶段,我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在建设重点、发展方向、需要处理的主要矛盾等方面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机遇和挑战。区别于以往学科建设实践,我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存在以下几个重要特点,这些特点为我们选择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认知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1. 学科建设主体的多元性要求一种回应各方信息需求的认知模式

历史上,我国对高等教育实行集权管理,中央政府控制了绝大部分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权,并通过一定的行政手段,对地方高等教育政策和高校办学施加直接而有效的领导与管理。^[4]政府、高校是学科建设系统的核心主体,其他利益相关组织、公民群体和个人基本被排除在学科建设与管理活动之外,在举办、决策、监督和信息共享等方面没有参与的权利。彼时,学科建设并没有面临协调各方利益相关者、满足多元需求等组织和制度层面的挑战,学科建设主体的多元性不强。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和社会力量的发展壮大,多元主体的趋势日益显现出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课题,学科的治理能力成为影响其建设与发展的关键因素,甚至有学者直接指出,学科善治是一流学科生成与发展的根本途径^[5]。与此同时,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破50%,正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阶段。普及化不仅意味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高增长率还会给高等教育结构和教

育管理等带来巨大的挑战。^[6]其中,如何优化治理结构是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发展和学科建设面临的重要议题。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决策受到统治阶层、利益集团和雇主、毕业生、教师和学生、学者等多元利益群体的影响,^[7]在这一背景下,参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主体数量必然会增加,不同的学科利益相关群体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需求日益强烈。

从当前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实际来看,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趋势已经显现出来并愈发强烈,社会组织与个人成为影响学科建设发展不可忽视的力量。行业企业需求更加广泛地渗透到人才培养过程当中,形塑着学科人才实践能力的培育理念和培育路径;产、学、研一体化合作的学术探索模式被越来越多的学科采用,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成为学科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各类社会第三方组织开展的学科评估与评价活动方兴未艾,评价结果甚至直接影响着学科建设的方向与重点……基于新的时代背景和学科发展实际,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已经成为一项涉及多种利益相关组织、公民群体和个人的事业。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主体的多元性特征,要求我们在认识、评价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情况的过程中关注多元利益主体,建构一种符合其主体多元性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认知评价模式。一方面,注重吸收多元学科建设利益相关者对一流学科建设的数据信息和意见评判,丰富我们关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状况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回应多元主体对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信息的了解诉求。

2. 学科建设内容的复杂性要求一种深入学科当前建设实际的认知模式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曾说,21世纪将是复杂性科学的世纪。随着系统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事物发展过程中散乱、无序、混沌、突变等特点被研究者们所发掘,这些特点打破了传统科学研究中存在的简单化还原式思维,超出了矛盾二元结构的解释范畴。进入现代科学研究阶段,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将目光集中到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上,不再局限于理想化与简单化的情景,而是反映现实世界的复杂性。^[8]

同样的，进入“双一流”阶段的学科建设，也呈现出愈来愈强的复杂性特点，这种复杂性表现在多个方面。

第一，学科发展边界的模糊性。一方面，学科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学科系统的边界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被模糊、淡化。当前，承载着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目标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已经与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特色的一流学科建设不仅强调在知识创新方面的引领地位，更强调其承担时代使命和社会职责方面的卓越贡献。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卡脖子”问题成为学科建设的重要导向，基本科学知识被鼓励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去，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系统更为广泛地渗透到一流学科系统当中。另一方面，学科边界的模糊性也体现在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上。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导致知识的增长点逐渐从学科大厦内部转移到了学科边缘和交叉领域。伴随着这一趋势，集体性、跨学科的团队协作研究模式兴起，个人主义的研究文化正在被多学科团队合作文化所代替。^[9] 学科建设已经超出了某个学科的单一定义，涉及学科间的协同合作，复杂性增强。

第二，学科建设投入、产出的非线性。学科建设投入与产出的非线性关系即学科建设要素投入的多少与学科建设效果产出之间并不一定呈正比，具有不均匀、不规则、不确定的特点。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早期阶段，学科建设面临基础差、底子薄的现实问题。因此，彼时的学科建设主要与学位授权点建设紧密关联，以满足国家规定的学位授权点对师资、设备、平台等的基本要求为准，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增加人、财、物的投入。投入的多，学科建设效果也会有相应的提升，甚至学科之间水平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学科要素的投入水平上。而进入“双一流”阶段，学科建设早已过了“满足温饱”的阶段，甚至已经出现了资源大规模集聚的“脂肪肝”现象，很多重点大学在“硬件”上与发达国家已经不相上下^[10]，物质条件不再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关键决定要

素，基于外延式发展理念的“学科建设”的历史使命已基本完成^[11]，一流学科建设投入与产出的非线性特点日益显现。

第三，学科建设模式的不可复制性。学科建设内容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学科建设与发展模式的不可复制性。在长期的国内外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实践当中，存在借鉴其他高水平学科经验而取得进步的学科，但却绝不会有照抄照搬某个学科的建设发展理念、模式而建成另一个高水平学科的情况，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尤其如此。世界一流学科是在经年累月的知识生产和组织创新基础上形成的，^[12] 在这一过程当中，学科在一代代师承传递中积淀学科文化，在持续的创新引领过程中塑造学术品牌，在共同的理念指引下培育学科共同体。这些无疑是不能被其他学科复制的，而正是不可复制的内容塑造了一流学科的内在灵魂。我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对中国特色、学科特色的强调，同样是对学科不可复制性的强调。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之“魂”就是要探索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发展模式。^[13] 而何为“中国特色”“学科特色”、如何建构具有特色的一流学科，却没有统一的国际标准，也无法用其他学科的标准来衡量。

这种学科建设内容的复杂性特点启示我们，在认识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过程中，要深入学科建设实际场景，把握学科建设关键内容，了解学科建设真实样态。避免用纯粹的学术性思维来考虑学科建设水平，而需要关注学科与外界社会之间的互动；避免用传统的人财物要素、用直观的投入-产出绩效思维来认识学科建设成效，应注重把握一流学科建设的系统进展、主要矛盾和核心问题；避免用简单的比较思维来评判一流学科建设的优劣，而应理解学科之间的差异与特点，在获取全方位、多角度信息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认识和合理分析。

3. 学科建设过程的重要性要求一种精准辨识建设过程的认知模式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过程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是相对于建设结果而言的。以往我们对学科建设的认识往往基于一个认知评价结果，用结果

来反映学科发展的全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过程信息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第一,学科建设的特色与创新主要蕴含在学科建设过程当中。学科建设本身是一个动态积累的过程,学科人、财、物各类建设要素的投入情况,学科管理与建设机制创新的实际措施,学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师资队伍结构优化与调整以及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具体举措等等,这些影响学科建设水平的关键内容,无法通过一个简单的评价结果得以显现。同时,过程性内容蕴含着学科建设发展的特色,学科建设的特征、特点主要体现在过程层面而无法用一个冷冰冰的结果予以表征。学科建设的这种动态积累性,需要我们用过程性、发展性的眼光来认识一流学科建设,进一步挖掘评价结果背后的丰富内容,全面展现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状态与发展动态。

第二,满足社会各界了解学科建设的需求主要依靠过程信息。传统评价活动试图用一个学科评价结果来解释学科是好还是不好,但随着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发展关注程度的提升和参与程度的深入,大众对学科建设这一具有“象牙塔”色彩事物的了解愿望愈发强烈。简单的“好”与“不好”已经无法满足其对学科建设相关信息的需求,他们更需要了解这一学科“哪里好”“为什么好”。在这个信息资源日趋丰富、透明的时代,学科管理者、建设者与社会公众之间对于学科建设信息的不对称问题愈发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认识必须深入学科建设实际过程,了解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过程的动态变化,发现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在各个方面的积累情况,科学、全面地展现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的特点,在此基础上,以常态的过程化数据持续服务外部社会对学科建设状态信息的需求。

第三,推动学科改进具体措施的采取主要依据学科建设过程信息。基于学科评估结果的“以评促建”,由于缺少必要的针对性、具体化信息,在实际应用中,其学科定位功能可能超过了以评促建功能,在推动学科建设发展方面的效果有限。与此相对,开展过程性信息收集

与分析,发现学科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并及时改进,则是促进学科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有助于从促进发展出发,分析学科建设结果形成原因,诊断发展问题,总结和提炼学科建设经验。^[14]在建设过程中实时把控学科发展进展与方向,推进学科建设目标更好更快地实现,提升学科建设科学化程度。

综上所述,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所具有的主体多元性、内容复杂性、过程重要性的典型特征,对其认知评价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以学科排名为主流的个别主体主导、易得数据量化分析、以结果表征建设水平、周期性的学科认知评价思路,显然在体现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特点、反映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内涵上有所不足。面对复杂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与发展问题,解决的办法可能并不在于设计更好的改革方案,或者从某些具体的革新和政策上出新花样,^[15]而在于能够根据时空条件的变化适时地转变思维模式和发展策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这些新的特点,要求我们必须结合当前发展实际,选择适当、恰切的认知评价模式,全面认识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状况,科学把握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问题。

二、监测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逻辑契合

高等教育监测是伴随着信息技术的突破发展以及教育认知与评价理念的变革而产生的一种新模式。监测的认知逻辑、认知特点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兼顾多元主体、统筹复杂建设内容、探究动态建设过程的特点相契合,成为我们认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情况的可靠选择。与传统的认知模式相比,监测在认知的对象、内容、过程、依据等方面均具有不同的逻辑出发点。

1. 认知对象:从结果到过程

已有的学科建设认知评价活动,其认知的对象一般为某一时间节点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水平,因而,得出一个反映水平高低的结果一般是其认知评价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以几个典型的学科排名为例,THE、ARWU、U.S.News、

QS均以百分制分数来表征学科建设水平，教育部学位中心组织的全国学科评估则以A、B、C不同类型来描述学科发展水平。在政府、大学、社会等不同主体对学科建设信息了解需求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学科评估这种关注结果、直观呈现排名情况的认知思维模式对于人们了解学科建设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也正是因为它所具有的对学科建设水平直接表达的特点，其评价结果成为社会各界了解信息、作出判断的重要参考。学科的优劣通过一个分数或者类型变得一目了然，似乎学科高深学问与社会大众之间的认知鸿沟就此被一个结果填平了。但这种结果直观呈现式的认知模式，真的能够适应一流学科对动态监测建设过程的政策需要，能够满足当前多元主体对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全面的、过程化信息需求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这种方式无法反映学科建设当前的、动态的、过程性的信息，虽在以评促建上存在一定的时效性，但在全面展现学科建设复杂过程方面非常不足，不利于学科建设信息的深入挖掘、分析和使用。

相对于学科排名对结果的追求，监测注重的是结果产生之前学科建设的全过程，关注学科建设过程中各项核心要素的基本情况和常态化的发展表现。监测以事物发展的“状态”为对象，意在反映系统的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在特定时间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态，包括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等内容。系统无时无刻不处于发展变化当中，任何状态都是过程累积发展的产物，今日之势孕育明日之变。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系统复杂，内外部的变化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监测注重对系统纵向时间维度发展状态的考察，通过较高频率的数据采集、更快的更新速度和不间断的延续时间，反映一流学科建设系统状态变化的过程。这种过程信息的实时收集、处理与呈现，一方面有利于多元利益主体随时了解一流学科建设进展，更为全面、深入地理解学科建设状态；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随时开展学科建设数据的纵向时间序列分析以及横向多学科对比分析，及时发现问题，常态化促进学科建设改进。

2. 认知内容：从简单到复杂

简单思维下的学科建设认知与评价表现为通过个别指标，尤其是量化指标、数据易得指标来反映学科建设整体。这在以往的学科排名中尤为常见，其简单思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学术实力评价为主来反映学科建设整体水平，而较少关注学科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产业转型、社会治理状况等内容。从评价指标和权重的设置布局情况来看，目前国内外较有影响力的学科评价体系大多遵循一种注重学术实力的评价取向。^[16]将学术成果作为核心内容，以发表论文数、出版著作数，以及高被引论文数、篇均被引数、H值等来反映学科质量。以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学科为例，在U.S.News、THE、QS、ARWU学科评价体系中，关于学术实力的指标权重分别占到了65%、57.5%、70%和76.2%，而与此同时，关于社会服务的指标只有THE中的“产业收入”一项有所涉及，且权重仅占5%。关于学术实力的评价内容、评价权重远远高于学科其他建设方面。二是倾向于评价学科建设中的显性产出要素。选取量化可测指标、数据易得指标作为主要评价内容，如学科培养的毕业生数、专任教师数、篇均论文被引量、科研资金投入金额等等。而对于学科科学研究的前沿性、学科对知识增长作出的贡献程度、学科在某一研究领域的影响力、学科师资队伍构成的合理性、学科管理运行机制有效性、研究团队的梯度配置情况、学科文化养成和以文化人成效等相对隐蔽、不易直接测量、不易获取的建设要素则很少考虑。这种简单、便捷、抛却事物复杂性的认知评价模式，带来的更像是一种“假象式”的学科建设认识结果。^[17]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在认识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把握其非线性、个性化等特点，全面了解各个核心建设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不能以偏概全、以管窥豹，试图以简单化思维解释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这一复杂系统问题。尤其是要回归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学科的战略内涵，考察学科满足外部社会需求的能力以及学科特色发展与创新发展

的能力。当然，这种简单式认知模式存在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没有形成反映一流学科建设的核心内涵的认知内容，另一方面也是受到数据采集与处理方法的限制。与此相对，监测内容与监测体系的构建强调深入监测对象内部，通过对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系统运行特点与规律的分析以及与多元利益相关者的互动，明确涉及系统状态的各类核心要素，在此基础上实现复杂思维模式下监测内容的全面化、系统化。同时，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高等教育监测，在大规模数据的收集、分析与处理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在非结构化数据、非量化数据的处理方面有更多的技术手段支持，能够回应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复杂性的特点，通过对大规模数据的科学分析实现一流学科建设复杂化过程的状态呈现。

3. 认知过程：从外塑到内生

从学科建设评价活动的出发点到最后得出评价结论的整个行动逻辑来看，已有的学科建设认知活动大多是站在学科建设之外，评价者以学科建设“局外人”的身份，制定评价方案和评价标准，并据此来展开的认知评价活动，属于一种“外塑”式的认知过程。一方面，这种“外塑”的认知思维意味着其认知与评价的标准大多是从外部主体的视角出发来设计建构的，因而普遍上更容易关注学科建设结果和产出情况，体现的是外在观察对学科建设活动的理解与认识。但这种“由外而内”的理解与认识并不一定能够反映学科建设的真实内容和关键信息。这从已有的学科评价内容中对学科建设结果性产出的重视和对过程性内容的分析不足上可见一斑。另一方面，这种“外塑”逻辑的认知也容易忽略学科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个性化要素，认知主体不太容易转换身份，从学科建设出发来理解、考虑其个性化的问题，而是更多地从外部评价者自身出发，选择性地“轻视”甚至“忽视”一些特色化、复杂化的建设内容，只保留符合评价者认知范畴的评价内容。这种“局外人”身份貌似为学科建设评价活动增加了一定的客观性，但其出发点体现的仍然是评价者的主观意志，操作层面的客观性

并不能掩饰其内在行动逻辑的主观色彩。

与此相对，数据驱动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监测从学科之外走向学科之内，将监测者、监测对象以及学科发展环境等置于统一的整体当中来考虑，从而赋予了学科建设认知与评价全新的内涵，属于一种“内生”式的认知过程。监测者并不以高高在上、远离学科建设这一“世俗”活动的判断者或评价者自居，也不会仅仅依据自身的经验或大众普遍认同的眼光来审视学科建设水平。监测是一种具有浓厚扎根精神的认知模式，是在深入了解监测对象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状态的分析呈现。监测通过深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了解学科建设多元利益相关主体关于一流学科建设的认识，发掘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的核心要素，构建监测的具体内容并开展监测活动。因而，监测者绝不是“局外人”，而是学科建设认知活动的组织者、协调者，是与学科建设各个利益相关者平等交流并共同致力于学科建设改进的合作者。监测的这一特点也实现了梅耶等人所说的，促使评价者与被评价者以合作伙伴的关系在评价过程中承担互补性工作任务，将不同利益主体的专业性知识和具体情境有效结合起来。^[18]这种从学科建设之外走进学科建设之内的认知过程，符合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对个性化分析、关键问题呈现、复杂化过程关注和针对性改进的需求，“内生”的认知逻辑和认知过程也是监测区别于以往学科排名的显著特点。

4. 认知依据：从经验到数据

从行事依据上看，目前的学科建设认识评价活动大多是基于经验驱动，数据通常是支持经验判断的“材料”，而非作出最终科学价值判断的“动力”。一些学科评价活动，比如学位授权点的合格评估、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评估等，其认知的依据主要是专家的经验。评价过程主要以专家为主导进行把握，评价结论需要专家结合自身经验来判定，基于评价给出的意见也体现了专家的经验传承，以专家的理性、知识、经验来保障评价活动的专业性，依靠票决、回避、公开等程序性规定来保证评价活动的规范性。整个过程没有突出强调数据的基础性价值，

更多的是将数据作为一种描述学科建设行为的证据。当然，一些学科建设评价活动并不完全依赖于专家，也有基于数据的分析和解释。但这些数据普遍上看是“小数据”，数据规模小，更新速度慢，收集周期长。因而也不具备依靠数据进行最终判断的条件，更多的只能依靠人的经验来完成。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对其建设过程作出全面、客观、科学的认识，仅仅依靠专家经验来认识评判或由部分人来进行判断是远远不够的。

监测是数据驱动的，数据不简单只是监测获取信息的工具和材料，更是监测能够产生价值、发挥作用的核心所在。数据驱动意味着监测的主要目标不是直接作出价值判断，而是从数据中获取信息并提炼出知识和智慧。即将收集的数据转化为经过处理的信息，将信息进一步提升为被人们理解的知识，将信息进一步加工形成用来指导行动的智慧。^[9]因此，数据是监测活动的核心驱动力，从数据中挖掘有用的知识和智慧是监测的重要使命。同时，监测的数据具有显著的大数据特征，围绕其监测内容的相关数据都会被广泛地收集、分析与处理，形成大规模（volume）、时效性（velocity）、多样性（variety）和真实性（veracity）的数据集，全面、深入地反映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状态，发现学科建设过程中的优势与不足，发挥监测促进学科建设、优化学科发展的作用。

综上所述，监测在认知对象、内容、过程、依据上均体现出了与以往学科建设认知评价活动截然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主体多元性、内容复杂性、关注过程性的特点相契合，是一种符合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发展逻辑和发展需求的新的认知模式，如表1所示。

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监测的价值功用

结合高等教育监测评估理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监测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持续收集和深入分析有关数据并直观呈现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状态，为多元主体价值判断、科学决策和学科

表1 学科建设两种认知模式的区别

	传统认知模式	监测认知模式
认知对象	某个时间点的学科建设结果	体现实际过程的学科建设状态
认知内容	简单化思维下的显性、量化数据	复杂化思维下的真实、全面数据
认知过程	“由外而内”的局外人认知	“自内而生”的自体反映
认知依据	专家经验、小规模数据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大数据支持

改进提供客观依据的过程。作为我们认识与理解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一种新形式，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监测具有实现一流学科建设状态全过程关键要素的呈现以及预测、预警的基本功能，同时也通过其服务多元主体、创新学科建设认知模式，发挥监测对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

1. 基础功能：状态呈现、预警预测

第一，呈现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状态。通过收集大规模数据来呈现建设状态是监测区别于以往学科建设认知评价模式的主要方面，也是其首要的基础功能。通过监测呈现出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状态是反映学科建设状况的“晴雨表”，是定期或长期观察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基本状况的新的工具和手段。它在深入剖析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内涵的基础上，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影响一流学科建设的核心因素进行定性、定量和系统的综合分析，探索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各要素的变化，描述建设状态、分析监测结果。这种实时的状态呈现方式彻底改变了传统评估存在评估周期长、评估主体单一、评估信息滞后等弊端，能在不干扰被评价对象的情况下持续动态反映一流学科建设状态，为政府部门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学科建设者持续改进学科质量，公众、家长、学生等进行价值判断提供有力支撑。

第二，实现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预警、预测。在状态呈现的基础上，监测也能够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数据挖掘、仿真处理，实现基于已有状态数据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预警与预

测分析。预警的核心目的是对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状态存在的异常与风险进行认知,并提前作出警示。预警建立在监测基础上,当要素指标接近或超过设定的异常值或区间时,发出预报。预测的核心则在于对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未来趋势进行认知。预测一般通过对历史数据进行建模处理,利用仿真工具,进行未来发展状态的监测。预警、预测也是监测区别于以往学科评价的重要方面,是大数据时代实现学科建设科学化有效工具。通过预警信息,可以提示学科建设者与管理者发现问题,及时地、有针对性地采取预防措施保障学科建设的有效推进。通过预测信息,基于学科建设各类数据的分析与整合,根据历史数据推演出部分信息,提高学科提前防范控制风险的能力,优化学科建设发展路径选择。

2. 延伸价值:创新认知模式、提升治理能力

对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而言,监测不仅具有呈现状态、预测预警的基本功能,也因其特有的内涵、特征,赋予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新的价值。状态监测既通过创新认知评价模式服务提升社会各界对一流学科建设的认知水平,也通过协调多元主体提升学科治理能力,以增强学科长期的发展潜力。

第一,以认知模式创新提升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认知水平。区别于以往以学科排名为代表的学科认知评价活动,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状态监测在认知的逻辑、理念、模式、方法、依据等各个方面均呈现出显著的差异。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状态监测模式是在原有学科认知与评价的基础上,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学科认知新模式,这种新模式带来的变革体现在对学科利益相关主体关系的改变上,体现在对传统认知内容的打破和重构上,体现在认知方式的动态与过程性上,也体现在其对学科建设认识与理解的视角、对学科建设本质与目标的把握、对认知活动展开的逻辑等价值层面上。监测是一种基于大数据的认知、基于过程信息的认知、面向建设状态的认知、深入学科内部的认知、协调多主体关系的认知,这种新的学科认知模式,通过系统地、动态地、客观地展

现学科建设相关数据信息,将学科建设这一抽象的过程以核心数据的发展变化形式呈现出来,极大地丰富了学科建设利益相关者的数据存量,有利于减少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失衡,有利于大数据时代人们学科建设认知水平的提升。

第二,以协调多元主体提升一流学科治理能力。治理视角下的监测者不是自主开展学科建设认知与评价活动的外部观察者,而是建构多个学科建设利益相关者的共同价值诉求并建立各方对话交流渠道的协调者、服务者。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状态监测具有兼顾多元主体、服务多元主体的特点,基于学科建设多元利益主体的诉求开展监测活动是监测的重要行事逻辑,以监测结果服务学科优化改进、服务政府科学决策、服务社会公众了解过程化信息是监测的重要目标导向。同时,监测对学科治理水平的积极作用并不仅仅体现在理念上对多元利益相关者的重视,更体现在实际监测活动中对多元参与路径和平等协商机制的建构。各利益相关者以平等的身份和地位共同参与监测活动,建立沟通、对话与协商等利益调整机制,在监测内容的选取、监测过程与步骤、信息收集与分析、监测结果解释与使用等各个方面充分倾听和采纳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平等协商、共同决策,推动教育治理的民主化。因而,具有丰富治理意蕴的状态监测模式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科各利益相关者的主动性,从根本上体现了一种自上而下制度设计和自下而上主动建构相结合的双向互动过程。^[20]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状态监测活动的展开能够为一流学科建设各个利益相关者参与学科建设提供渠道,有利于搭建学科建设的多主体协作治理体系,营造学科建设平等合作的治理氛围,从而实现以状态监测提升世界一流学科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战军,乔伟峰,李江波.数据密集型评估:高等教育监测评估的内涵、方法与展望

[1]. 教育研究, 2015 (6): 29-37.

[2] 王战军, 刘静, 杨旭婷.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状态监测: 理论建构与方法革新 [J]. 中国高等教育, 2020 (Z2): 42-44.

[3] 张务农, 娄枝, 李永鑫. 国内高校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引入监测评估的行事逻辑 [J]. 中国高教研究, 2019 (4): 33-39.

[4] 别敦荣, 易梦春.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与政策应对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4 (1): 11-16.

[5] 何晓芳. 学科嵌入式治理: 一流学科生成与发展的制度逻辑 [J]. 中国高教研究, 2019 (9): 29-34.

[6] 钟秉林, 王新风. 迈入普及化的中国高等教育: 机遇、挑战与展望 [J]. 中国高教研究, 2019 (8): 7-13.

[7]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 School enrollment tertiary [EB/OL]. (2019-03-01) [2021-01-23].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E.TER.ENRR?name_desc=true.

[8] 普利高津. 确定性的终结 [M]. 湛敏, 译.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1998: 5-6.

[9] 李志峰, 高慧, 张忠家. 知识生产模式的现代转型与大学科学研究的模式创新 [J]. 教育研究, 2014 (3): 55-63.

[10] 朱冰莹, 董维春. “建成”抑或“生成”: 世界一流学科成长的逻辑与路径 [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7 (9): 14-20.

[11] 武建鑫. 学科生态系统: 论世界一流

学科的生长基质——基于组织生态学的理论建构 [J]. 江苏高教, 2017 (4): 7-14.

[12] 武建鑫. 世界一流学科的组织成长特征及演化路径研究——以工程学科为例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9 (6): 34-42.

[13] 靳诺. 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的“形”与“魂”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6 (6): 3-8.

[14] 张应强, 赵锋. 从我国大学评价的特殊性看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基本方向 [J]. 江苏高教, 2021 (2): 1-8.

[15] 富兰. 变革的力量——透视教育改革 [M].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加拿大多位的国际学院,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5: 9.

[16] 王战军, 杨旭婷.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评价的理念变革与要素创新 [J]. 中国高教研究, 2019 (3): 7-11.

[17] 蒋士会, 郭少东. 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探微 [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3): 33-37.

[18] 施托克曼, 梅耶. 评估学 [M]. 唐以志,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67.

[19] ZELENY M. Management support system: towards integrated knowledge management [J]. Human system management, 1987 (1): 59-70.

[20] 肖红缨, 乔伟峰, 王战军. 高等教育监测评估的哲学审视 [J]. 中国高教研究, 2015 (2): 38-41, 45.

(责任编辑 刘红)

Monitor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class Discipline: Rationality and Value

Wang Zhanjun Yang Xuting Liu Jing

Abstract: Monitoring is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 things, and a cognitive activity to obtain and process information. To recognize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class discipline by monitoring is determin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class discipline and monitoring itself. On the one hand, the multi-subjectivity, the complexity of content,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ocess in building the world-class discipline call for a new evaluation model matching with thes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other hand,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ognitive model of discipline in term of ranking, monitoring has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mphasizing on the process of cognitive objects, representing complex thinking of cognitive content, returning to discipline internalization of cognitive process, and relying on data judgment of cognitive basis. To underst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class discipline through monitoring can play the basic function of monitoring the explicit statue, as well as early warning and prediction. And has the crucial value of innovating the cognitive model and improving the governance ability of discipline.

Key words: World-clas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statue; Discipline monitoring; Discipline evaluation

应用型本科院校 共生型产业学院建设与广东实践

黄大乾¹ 饶丽娟²

(1. 广东白云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50;

2.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40)

摘要: 产教融合是实现教育与产业一体化发展、融通专业链和产业链、解决人才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重大战略举措, 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基本办学模式。尽管政府为产教融合实施提供了清晰的制度框架, 但组织间的资源依赖与共生发展需求也是实施产教融合的客观要求。高校资源依赖与企业绝对超越形成的价值诉求不平衡导致“校热企冷”, 制约了产教之间的深度融合。通过政策赋能和广东高校实践创建形成的共生型产业学院, 有效破解产教分离以及校企融合难的症结。

关键词: 资源依赖理论; 应用型本科院校; 产教融合; 共生型产业学院; 广东实践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1) 06-0045-07

教育
时
论

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有关问题意见的通知》就提出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是结构性的,即大学生就业难表现出结构性失业的特征。有研究指出,当前大学生就业存在供给质量结构性矛盾、供给价格结构性矛盾及供给意愿结构性矛盾问题。^[1]高校作为人力资本投入的主阵地,培养“有质量”的人才才是其肩负的历史使命。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存在办学封闭性较强、主体单一、教育资源较为缺乏及体制机制改革滞后等问题,完全封闭的办学已经越来越背离经济模式转型的需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应用型本科院校改革发展、全面提升办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能力的关键突破点。教育发

达国家早已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作为一种常态化教育模式,以德国的“双元制”模式、英国的“三明治”模式、日本的“官学产”模式、澳大利亚 TAFE 模式为典型代表。

我国很多高校与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涉及“共建资源”“订单培养”“工学交替”“分段培养”等方式,但高校和企业往往出现合而不融的“两张皮”现象。高校寻求合作的意愿强且行动积极主动,而企业内驱力显现不足,校热企冷的“壁炉现象”成为双方融合的痛点。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没有一个组织可以完全自给自足,对自己的生存条件具有完全的控制力,^[2]所有的组织都是建立在相互依赖基础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高校还是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形态,它们在社会大环境中

收稿日期: 2020-11-05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8 年度学科共建项目“分类视角下广东省建设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理论与战略研究”(GD18XJY04)

作者简介: 黄大乾,男,教授,广东白云学院院长,主要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饶丽娟,女,副研究员,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院校研究。

是交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形成命运共同体。“壁炉现象”看似是教育的公益性与企业的逐利性之间的矛盾，实则是高校资源的过度依赖与企业资源的绝对超越引发的需求不平衡冲突。

应用型本科院校要获得持续生存与发展，必须发挥能动性，加强组织变革，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路径加强与外部环境的联系，增强社会适应性；同时，在合作中强化高校行为、智慧和能力的贡献度，让企业认识到与高校合作的有用性与合理性，增强高校对企业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减少单方资源依赖，实现共赢共生。办学已经不是单纯的校企合作行为，而更多涉及产业制度与教育制度的系统安排。^[9] 产业学院是产业与教育融合融通的新型组织模式，是系统化的制度安排。

本文以资源依赖理论为基础，分析产教融合的产业学院组织模式的形成，并以广东应用型本科院校共生型产业学院为例，阐释共生发展需求影响下高校产教融合的实践模式。

一、建设共生型产业学院的理论依据与组织形式

（一）资源依赖与共生需求对产教融合的适用性

1. 资源依赖论与共生关系说的基本要义

资源依赖理论形成于杰弗里·非佛（Pfeiffer）和 R.萨兰基克（R.Salancik）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合著的《组织的外部控制：对组织资源依赖的分析》（*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其主要观点为，生存是组织发展的前提，生存需要资源，而组织具有社会性，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从组织与外界关系看，没有一个组织是完全独立于外界存在的；从资源的角度，也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够实现自给自足。组织需要并可以通过依赖其他组织，获取生存所需要的稀缺、珍贵资源，以维持其存续。依赖是相互的，通过组织间的资源交换与相互作用，从而构筑一个资源关系网，最终走向共生。^[4] 在此基础上，组织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互依，如合并、合作或其他联盟形式。

“共生”源自生物学领域，是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首先提出的概念。共生又称“互利共生”，是生物间相互关系的高度发展。因生物生存发展的需要，它们之间必然按照一定的模式互相依存和相互作用，从而形成共同生存、协同进化的共生关系。简单地说，共生关系是指两种生物间彼此互利共存、相互依赖和彼此不可缺失的关系。共生关系具有普遍性，适用于管理、经济、教育等社会科学领域。因以共享为关键举措、以共存为基本前提、以共演和共创为发展使命构建相互依赖、互惠互利的命运共同体，最终能够为参与者创造价值，共生理论被广泛应用。

2. 资源依赖与共生需求对产教融合的适用性

“产教融合”概念最早出现在 2013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这是一个基于认知而演进的概念，体现教育改革理念的变化，核心是解决教育供给与产业供给结构性矛盾问题。关于产教融合，学术界有不少研究，如有研究认为产教融合是学校与区域内相关行业、企业在人才培养、技术与研究升级和成果转化中密切合作、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把学校办成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科技服务为一体的产业性经营实体，形成学校与企业浑然一体的办学模式^[5]；有研究提出以创新为核心的价值链重组、以技术进步为融合发展的主轴、实现技术技能积累创新的共同体是产教融合的三个基本点，最终目的是构建以技术进步为主轴、以人才培养为根本的教育创新生态体系，^[6] 等等。学术界对产教融合观点众说纷纭，但产教融合反映的是产业界与教育界的合作、融合关系。

应用型本科院校体现了地方性、突出应用性、彰显融合性三种主要特征。^[7] 应用型本科院校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改变对传统大学的学科路径依赖，另辟发展蹊径。从资源视角分析，应用型本科院校办学时间短，基础相对薄弱，师资资源、信息资源、技术资源、学科资源、声誉资源等都远不及老牌本科院校，走协同发展、融合创新之路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基本战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应用型本科院

校主动融入产业升级和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适应性举措,也是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提升创新创业能力的可取模式。

校企主体间的相互依赖及共生发展需求,为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实施提供了可能。企业对高校的依赖表现为,企业的发展依赖高校培养的人才,企业的创新有赖高校的智力支持,高校可为企业发展带来新的资源并创造新价值。正所谓依赖是相互的,高校对企业的依赖体现在企业在市场的前沿引领高校发展方向可为高校带来新的资源,让高校了解行业前沿并将新技术的项目引入课堂。对应用型院校而言,企业还能助力“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弥补师资短板。

校企间资源依赖构成合作基础,但共生共赢才是组织合作目标,合作能给双方带来新的理念和催生新的资源,并据此创造新的价值链。产业界为教育界提供各种资源,对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产业界在满足教育界需求的同时必须获得其资源所需,满足其利益需求,这样协同才能更加稳定和深入直至融合。教育界要通过共建共创机制改变资源依赖现状,形成对合作方的影响力甚至控制力,应反向思考“我能为企业带来什么资源”“我能为企业创造什么价值”等问题,并通过组织变革发挥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人才支撑与创新引领作用。上述提及的“共建资源”“订单培养”“工学交替”“分段培养”等协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组织间在资源和能力方面的共享与互补,但这种合作关系并没有持久的机制保障,相互间的融合彰显不足,难以实现共享共创之目标。

(二) 共生型产业学院及其内在共生关系

1. 产业学院是产教融合的新型组织形式

作为社会共生单元的企业与高校基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如果能找到互惠共生的基点,则既能实现跨界资源的优势互补,又能实现价值增值效应。作为新型组织的产业学院就是通过组织创新、组织重构进行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实现价值增值。

“产业学院”一词最早可追溯至英国倡导

并于2000年正式运营的产业大学,是为提升企业竞争力与帮助个人获得就业能力,借助于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建立的一种为社会提供优质教育服务的开放式远程学习组织(学习者和学习产品之间的中介机构)——“产业大学”^[8]。我国的“产业学院”与英国的“产业大学”具有不同的功能。对于何谓“产业学院”,学界并未达成统一认识。但产业学院作为产教融合的一种组织创新形式,是共识性的。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三链”融合说,研究从创新链、教育链和产业链融合的视角剖析产业学院组织制度创新的内在机理和逻辑,厘清了产业学院与其他类型校企协同平台的差异。^[9]作为产业界与学术界融合的产物,产业学院以区域现代产业集群或特定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以助推产业转型升级、产业技术创新为牵引,通过有效汇聚企业、高校、政府、行业等多方创新资源和要素,通过创新组织形式,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释放彼此间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而实现深度合作。

产业学院具有办学主体多元化、跨界共生特征、市场化运行机制、明确的服务领域和多重功能性组织等基本特点。其中,办学主体多元化是指产业学院是由政府、高校、行业企业、社会团体等多元主体和多组织参与办学,多元投资体制是产业学院区别于传统校企合作最显著的特征,也是产业学院形成治理体系的决定性要素;跨界共生特征是指作为一种组织形态,产业学院具有明显的跨界特征,因各主体致力于共生发展,也称为“共生型产业学院”;市场化运行机制是指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是产业学院治理的价值取向,无论是作为独立于高校的办学组织还是高校内部二级学院,无论是实体还是虚拟组织形态,产业学院都既有高校性质的办学权,又具有企业性质的经营权、收益权,能够以市场化运行机制运营,自由吸收民间资本,根据市场变化进行供给侧改革;明确的服务领域是指依托某产业(群),高校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合作企业的要求选择合适的学科专业与相关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其人才培养、科技研发、员工培训、创新创业、社会服务等

功能具有明确的向度；多重功能性组织是指产业学院具有人才培养、科技研发、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基本功能，并兼有师资培训和创业等衍生功能。

2. 产业学院办学主体间的共生关系

产业学院作为产业界和教育界的链接点，必然要依托市场资源和学科资源，并在产业需求和学科资源交叉融合中产生效益。高校、企业、政府构成产业学院创新发展的三螺旋结构，各螺旋间相互影响、彼此依赖共生，在产业学院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控制着不同的资源。首先，政府竞争性资助和政策支持及统筹性资源是其控制高校、企业的制高点所在，构成助推产业学院发展的外生动力源。没有政府的支持、指导、嫁接，产业学院只能停留在学术界研究层面，无法落地。其次，产业学院基于对知识生产的需求而产生，这对以知识生产、人才培养为核心使命的高校而言，自然把握了主动权，智力投入与人才产出为产业学院带来新的增值性效应。最后，作为全程参与产业学院办学的企业主体，其理念、技术、设备甚至资金都构成产业学院发展的不竭动力。

产业学院以资源共享、合作共赢为目标，有机衔接和深度嵌入教育链、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有效解决大学、产业界、政府之间异质信息沟通问题。集聚各方管理、技术、人才、设备、资本和营销等优势资源互补，在组织与其他组织实施合作、协同发展过程中，衍生创造新的价值链，实现 $1+1>2$ 的效应。随着高校、企业、政府三螺旋进一步构建不同的复合结构，知识在不同组织之间扩散，知识流动和交易的成本降低，创新的速度和质量不断提高。

二、建设产教融合共生型产业学院的广东实践

（一）共生型产业学院的省域政策

广东是我国产业学院实践的起源地，以中山职业技术学院与当地镇政府合作举办的四个产业学院为典型，包括面向电梯特色产业兴办的南区电梯学院，面向休闲服装产业组建的沙

溪纺织服装学院，依托五金制品等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兴办的小榄学院，面向照明器材设计与制造产业兴办的古镇灯饰学院。产业学院成为高校“多元协同组建的创新发展共同体，也是高校深度融入具体产业链、创新链，由理论型向应用型转变的重要标志”^[10]。产业学院着力解决的是校企间松散耦合问题，高校走不出去、企业进不来的双向互动难问题，高校学生对企业、产业认知不足的问题，服务产业、引领产业的工程实践能力不强的问题。

广东教育借助得天独厚的与产业对接的优势，以服务产业发展为导向探索产业学院建设模式，找准服务产业需求的切入点大力推进产业学院建设。《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实施意见》指出，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建设一批产业学院，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推进本科高校产业学院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将产业学院建设成为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企业服务、学生创业和继续教育的多功能基地，实现区域教育和产业的联动创新发展，破解产学错位难题，形成高等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广东模式”，鼓励高校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工业园区共建产业学院，建立以市场需求、行业标准、职业需要为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

广东省教育厅召开全省本科高校产业学院建设工作推进会，进一步明晰产业学院的内涵、功能定位及其价值，指出产业学院是以提升高校服务特定产业能力为目标，整合高校、政府、行业、企业资源建立的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兼有学生创业就业、技术创新、科技服务、继续教育等多功能、多主体深度融合的新型办学实体，是促进新工科建设落地见效的重要载体，也是实现区域教育和产业的联动创新发展、形成高等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广东模式的有力抓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在立足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背景下，广东省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强互动”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

(二) 共生型产业学院的运作模式与经验

结合新工科建设,广东通过统筹谋划产业学院布局,分类定位、因校制宜,面向产业整合学科专业教学资源,积极探索多方协同、融合发展的共生型产业学院建设路径,以重点集群和重点平台为根基,以共生型产业学院为载体,创新产教融合运作机制,构建特色化协同育人模式,校企资源开展科研创新和社会服务,构建“双师型”师资队伍等举措,与地方政府、行业协会、产业园区、企业及科研院所积极探索共建产业学院,对提升办学水平、深化产教融合和推动区域创新驱动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形成了产业学院组织创新广东模式与经验。

1. 筑牢产业学院根基

重点学科、专业集群是产业学院内涵建设的根基或“四梁八柱”;重点平台是产业学院内涵建设的重中之重。集群定位解决的是产业学院内学科专业集群在支撑产业集群中的战略支点问题。广东本科院校以大产业为依托、以大协同为主导、以大集群为基础、以大教育为根本,通过“产业学院+”模式,走产学研创新之路,形成集成发展、协同育人优势。东莞理工学院瞄准“大湾区大产业”建设大学学科专业集群,重点打造智能制造、绿色低碳、创新服务三大学科专业集群,搭建“产业学院+产业园”,共建共管区域协同创新平台,与新型研发机构、行业龙头企业、专业镇街园区和国际名校等创新主体合作,创建了若干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与社会服务于一体的现代产业学院;广东白云学院面向广东省大数据应用行业和“大数据+”教育、物流、农业、金融等产业,共建了基于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和应用服务的“数据中国‘百校工程’产教融合基地”,并在此基础上建设“曙光大数据产业学院”;广州城市理工学院以花都汽车、电子、皮革等产业为中心,整合华南理工大学的科技资源,联合行业龙头企业、产业联盟及行业协会及其他科研院所,建设智能制造产业学院。

2. 产业学院治理明晰

广东首批产业学院主要实行的是理事会或管委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完善了包括建设

规划、经费预算、组织架构、教学质量、目标达成评价在内的产业学院章程和各项规章制度建设。理事会或管委会由高校和企业人员共同组成,负责产业学院运行中的制度建设、人力资源建设、收益分配等重大问题的审议、决策、检查、监督和协调等。根据产业学院特殊性,广东省首批试点产业学院创新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探索建立符合产业学院自身特点的治理体系。如佛山科技学院的产业学院实行管委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不以获得利润为出发点,而以培养“根植产业、服务产业、引领产业”的产业行业人才、深化产教融合、促进互利共赢、形成“校企发展共同体”为目的;广东白云学院实行学校与曙光瑞翼教育双主体的校院二级管理模式,校级层面成立校企合作项目管理委员会,整合全校资源,与校政行企进行对接。二级学院承担产业学院建设的主体责任。

3. 多方融入协同育人

紧密结合学校自身的学科专业特色与优势,广东高校产业学院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校企协同育人模式。例如,东莞理工学院先进制造学院(长安)创新“校政企协”多方协同育人模式,依托“校园+工业园”双园办学场地,实施“3年高等工程教育+1年现代师徒制”培养模式,将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和技术创业有机结合,打造“教育+培训+就业+创业”完整教育服务链,形成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协同培养的长效机制(见图1);佛山科技学院开展互利共赢的“双学院制”人才共育新模式,企业将产业资源、行业经验、职业标准、实习岗位、技术工艺等植入产业学院,高校负责提供日常教学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研讨、专项技术开发以及人力资源服务等,形成“校企发展共同体”;广东白云学院建立了“双主体六共建”的曙光模式,充分利用民办院校的灵活办学机制,以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数据中国“百校工程”项目为依托,以人才培养为基础,通过产品(大数据平台)共同投入,以中科曙光为品牌,以数据资源建设为目的,着力促进“双主体”开展“六共建”,形成利益共同体(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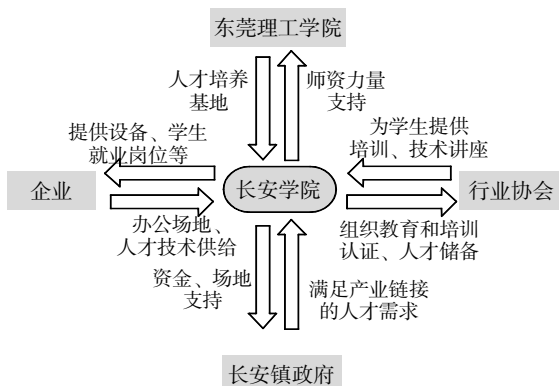


图1 校政企协共同体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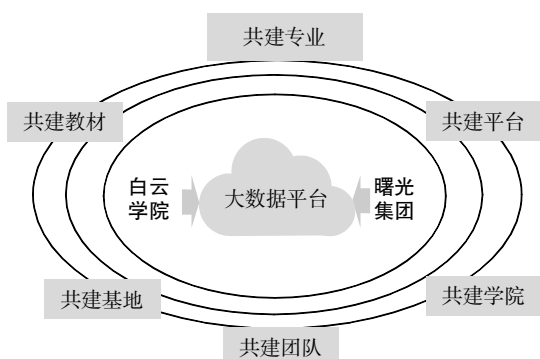


图2 “双主体六共建”模式

4. 师资双向流通与培养

师资队伍是产业学院运行管理的核心，探索建立校企师资双向流通与培养机制，构建由高校学术性教师和产业工程师组成相对稳定、优势互补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是产业学院持续发展要突破的瓶颈要素。广东省本科院校产业学院充分利用和挖掘学校、产业学院资源和平台优势，围绕学科专业的主要研究领域，采取从全球、全国范围内引进高水平优秀人才与选拔培养现有优秀年轻教师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产业学院学科建设的人才高地；定期派送产业学院的教师到知名企业参加实际项目的研发，提高教师自身水平，以代替到高校进行交流与进修的传统方式；请入驻企业、其他知名企业的优秀员工来校任兼职教师，为学生带来实际的研发技术、最新发展动向以及现实需求；建立与产业学院发展相适应的教师职称评审制度，促进对产业学院教师工作成果的认可。例如，东莞理工学院粤港机器人学院融合境内外人力资源、松山湖产业基地与企业资深工程师、金融创投知名人士，构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国际化视野的一流师资队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与行业企业实施“双聘、双挂”制度，即双方互聘兼职教师、创业导师或工程师、设计师，双方专业技术人员互换到对方挂职等。

5. 协同科研创新和成果转化

产业学院不仅积极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而且十分重视科研成果转化，着力创新科研成果转化模式，服务地方企业发展。通过校企项目共研，师生直接面向产业行业企业

生产实际问题，参与产品研发、技术攻关，搭建政产学研平台，强化产学研用结合，推进科研成果转化。在这些方面，不少院校已经在进行实践。例如，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半导体光学工程学院在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行业企业）、学（二级学院）、研（工程研究院）深度融合的成果转化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研发产品走产业化、品牌化道路，重视产品研发，引入更多、更专业的市场力量，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定制化产品研发，提升研发产品的竞争力，提高合作企业的满意度和竞争优势；广州城市理工学院以花都区重点发展的汽车制造业、电子制造业和皮革制造业为桥梁，吸引知名企业共同参与项目研究和开发，不断完善内外联动，共同致力创新型、开放型、综合型的产业孵化开发平台建设，协同开展科研创新与成果转化，增强服务产业能力。

综上所述，产教融合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高校、行业企业形成“三位一体”的结构。最重要和关键的是要促进行业、企业共同参与高校人才培养工作，将教育条件改善由校内资源支撑转向由行业企业资源支撑。创新校企协同育人的机制，企业有积极参与人才培养的动力，而高校有持续服务企业的

能力。政府要行使其制定政策框架的职能，引导地方本科院校和地方企业发挥各自的优势，调动企业的社会责任感，长效参与办学；学校层面应主动强化内功，根据地方产业调整和转型

升级的发展动向,注重课程设计、教学过程与社会实际需求的对接,主动加强科技创新与服务、决策咨询服务,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共生型产业学院既坚持教育的社会公益性,又合理引入市场机制并融合企业化的管理方式,是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有益探索。

参考文献:

- [1] 刘静,张天雪.大学生就业结构的关联模型、矛盾形态与破解路径[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1(5):90-94.
- [2] 菲佛,萨兰基克.组织的外部控制:对组织资源依赖的分析[M].闫蕊,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23.
- [3] 石伟平,郝天聪.从校企合作到产教融合——我国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思维转向[J].教育发展研究,2019(1):1-9.
- [4] 霍丽娟.资源依赖理论视角下企业承担

职业教育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2020(1):42-48.

[5] 王丹中,赵佩华.产教融合视阈下高职院校协同育人机制探索[J].中国高等教育,2014(21):47-49.

[6] 陈锋.产教融合:深化与演化的路径[J].中国高等教育,2018(Z2):13-16.

[7] 饶丽娟,黄大乾,刘秀光.高等教育分类政策及其对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的驱动[J].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学报,2020(4):1-5.

[8] 郑琦.产业学院:一种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高职办学模式[J].成人教育,2014(3):62-64.

[9] 胡文龙.论产业学院组织制度创新的逻辑:三链融合的视角[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8(4):13-17.

[10] 孙柏璋,龚森.产业学院:从形态到灵魂重塑的转型发展[J].教育评论,2016(12):14-17.

(责任编辑 吴潇剑)

Construction of Symbiotic Industrial College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and Practice in Guangdong

Huang Daqian Rao Lijuan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s a major strategic measure to realiz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industry, integrate the professional chain and industrial chain, and solve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of talent supply side. It is the basic school running mode of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provides a clear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dustry education integration, the resource dependence and symbiotic development needs among organizations are also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dustry education integration. The imbalance of value demands between university resource dependence and enterprise absolute transcendence restrict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hrough the policy empowerment and the practice of Guangdong universities to create a symbiotic industrial college, we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sepa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and the difficulty of school enterprise integration.

Key words: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Symbiotic industry college; Guangdong practice

社会信任的价值之维及其学校培育

董从勋¹ 余庆²

(1. 淮南师范学院, 安徽 淮南 232038;

2. 苏州大学,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 培育社会信任是价值教育新的着力点。社会信任的培育应该融入价值教育体系之中, 以师生信任为切入点, 并与其他价值品质的学习结合起来。但缘于社会信任的特殊性, 将社会信任纳入价值教育时遭遇诸多困境, 以功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在逻辑上难以自洽, 同时遭遇集体主义教育和过于精细化学校管理的现实制约。针对此, 学校需要与其他社会机构协作, 维持学生信任体验的一致性, 创设信任的学校文化, 建构陌生人伦理, 以信任的精神引领个体社会信任的发展。

关键词: 人际信任; 社会信任; 价值教育; 普遍主义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1) 06-0052-07

当今时代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面临全方位的变革。信任是一种重要而特殊的价值, 如果没有信任这种基础的价值观, 不仅良好的社会合作无法达成, 其他价值观也难以持久长效。因此, 转型社会中的社会信任问题受到空前关注。

社会信任是相对于人际信任提出来的, 主要指普遍对他人的一般性信任, 而非基于熟人之间特殊交往关系的人际信任。两者区别之处在于: 人际信任会因一次失信行为而遭到不可逆转的摧毁, 具有脆弱性; 社会信任则具有公共性, 其对象包含着社会的运行机制、专业知识等, 既有认知的维度, 也有情感的维度, 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为了应对社会信任危机、提升社会成员的社会信任程度, 学校教育培育学生

的社会信任素养就变得不可或缺。目前, 很多发达国家已经将信任纳入价值教育计划。在英国的一项调查中, 有75%的教师认为信任是学校必须要培育的价值。^[1] 在价值教育中纳入社会信任的维度势在必行。

一、社会信任教育的现实困境

学校是内在异质的非共同体集合, 并不具备熟人共同体的全部特征。这使得学生对校园中他者的信任既从人际信任中生成, 也与之相区别。社会信任教育往往被等同于单一维度的价值教育, 较大的认识误区使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

1. 功利主义理论基础的误读

社会信任教育以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福祉

收稿日期: 2021-04-30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 (2018T110537)

作者简介: 董从勋, 男, 副教授, 淮南师范学院教育学院, 主要从事教师教育研究; 余庆 (通讯作者), 男, 副教授,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 主要从事教育哲学研究。

为终极目标。国家、社会、教育系统的实际出发点都是将其看作社会资本，以“投入-产出”模式对待社会信任教育，要求个体应当具备相应的素养。这符合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伦理学的逻辑。“功利主义的行为标准并不是行为者本人的最大幸福，而是全体相关人员的最大幸福。”^[2] 只要社会信任能为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带来增益，那么所有相关部门都有责任来构建社会信任。社会信任的教育工作就转化为协调个体利益与公共福祉之间的矛盾，让渡局部的个人利益以求得良好的社会合作。功利主义肯定了日常经验中的个人利益，侧重对行为后果的评判。

按照上述逻辑，功利主义伦理学应当成为社会信任教育的理论基础。这里存在两个较大误区。第一个误区是功利主义将社会信任看作稳定的社会情感，使其失去了可教性。抛开对功利主义庸俗化、狭隘化的误解不说，功利主义本身将社会情感作为道德情操的根源，就意味着社会情感必须是稳定的甚至是不变的，由此良好的道德情操才可能达成。正如约翰·穆勒所说，“假如功利主义道德没有一个天然情感的基础，那么，这种道德关联即便已由教育培养起来，也很可能被分析消解掉”^[3]。这种稳固的、强有力的天然情感基础，即人类的社会情感，是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共同感。社会信任的程度代表着共同感的强烈与否，人性中的社会性体现在此。“它（社会情感）是无需我们不断进行灌输，而仅仅由于文明进展的影响就变得更加强烈。”^[4] 换言之，功利主义认为社会情感取决于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不需要教育来改变。如果这样，社会信任教育乃至社会情感教育的正当性就值得质疑，通过教育培育社会信任的可能性大打折扣。

第二个误区是功利主义容易导致策略式的信任。功利主义伦理学以行为后果来判断行为是否合乎道德，并将之建立在稳定的社会情感基础之上。那么，如果仅仅以后果来衡量社会信任是否符合道德，它就是一种算计式的信任，是群体出于理性的策略式信任。这能否作为一种道德情操交由学校专门培养就值得质疑。以

这种逻辑来断定社会信任是否是道德，还面临着受惠群体范围的问题。因为功利主义的评价标准事关全体相关人员的最大幸福，那么如何来断定全体相关人员，即指涉的共同体范围究竟有多大。功利主义只有将全体相关人员等同于整个人类，才能获得逻辑上的自洽。这不仅与人类经验及理性的有限性相冲突，而且与教育对象的有限性相冲突。概言之，社会信任的后果永远无法精确计算。功利主义的准则难以获得理论上的逻辑自洽，我们只能根据有限的知识和情感判断是否应该去信任。

2. 集体主义教育的实践困境

熟悉是信任的前提机制，社会信任需要建立在熟人人际信任的基础之上。因此，信任的对象首先是集体中其他成员。集体主义教育就成为社会信任教育的重要方式，其实质是将群体内部的生存斗争转化为有意义的分工协作，使群体利益最大化。集体设置了个体行为的群体情境，调和着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在熟悉的集体中最能协调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集体的凝聚力与成员彼此之间的信任程度有同构性质，集体越团结，彼此间的信任程度越高。学校中的集体生活带有鲜明的社会性，常常是以班级、年级、社团等为共同的集合单元。我国的集体主义教育通常以班级为实施单位，马卡连柯的“在集体中、通过集体、为了集体”是其中的重要实践原则。为了集体是指以集体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是相对于个人利益更大的集体利益（比如班级、学校等）而言的。但问题恰恰在于个体需要在价值选择中将所在集体利益置于更高的位置，个体和集体之外的利益都要服从于所在的集体，学生容易狭隘地局限于所在集体，并以此为判断标准。当班级利益与其他群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体所在的小集体利益便被标榜为高过一切。全体相关人员的利益被置换成班集体等小集体的利益。

集体主义教育有社会性，但其所意向的共同体大小值得我们思考。马卡连柯所提出的集体主义教育的几条原则，比如尊重与要求相结合、平行影响原则等，背后的实质都是要建立起联系紧密的共同体，用熟悉的特殊信任关系

将集体成员凝聚起来，这是个体社会信任发展的中间阶段。个体在集体中走向社会信任，学校需要在集体利益的基础上将更广泛的社会利益容纳进来，逐步发展社会信任。如若长期拘泥于班级、学校这样一些较小的集体之中，形成一种非此即彼的价值心态，即只考虑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小集体利益，势必造成对共同体之外其他社会成员、群体的不信任，社会信任乃至社会参与都难以为继。

3. 学校管理精细制度的去主体化

制度建设是社会有效运转的保障。在传统的前现代社会，人际信任就能很好地应对社会场景，故不需要建立对制度的信任，也没有建立匿名性的制度系统。在现代社会的制度性情境中，熟人信任无法应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场景，而制度则具有稳定、无差异等保障性特征，故群体的理性促使人们信任现代性制度。现代社会的管理制度为信任提供了外部支持，我们能够更便捷地将自己纳入由全社会建构的匿名化的信任网络之中。对制度的信任使人们摆脱传统社会的人身依附，依照制度便可妥当行事。与之相应，为了形成更加完善的制度体系，不仅制度自身在变革，与之相应的法律、习俗都在不断调整以适应制度运转。

社会信任教育不能仅仅依靠熟人交往与情感维系，更应该诉诸无对象差别的制度建设。“信任在本质上与现代性制度相连。信任这里被赋予的，不是个人，而是抽象能力。”^[6] 制度所塑造出来的系统信任与人际信任逐渐被研究者区分对待。“系统信任是指对匿名者组成的制度系统的信任。”^[7] “世界的全部复杂性可能遇到更有效的复杂性简化方式。从主体的交往过程中创建出稳定的系统，并且使他信任这些系统的功能。”^[8] 出于对现代社会复杂性的简化，制度系统成为社会信任得以有效维持的前提。

学校管理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较早的制度生活，是整个社会制度在学校中的缩影。学校管理工作的精细化会带来效率的提升，能够赢得学生对制度的一些信任，从而奠定社会信任的基本心态。但是，过于细致的学校管理，尤其是管理主义至上的学校制度建构也会带来一

些相应的问题，忽视学生的主体性。一方面，社会信任需要在交往情境中孕育，是基于人际互动的情感养成，但制度规范并不能因人而异，无对象差别的学校管理制度安排容易在情感上给学生以伤害；另一方面，教师出于国家或社会本位的立场，过于强调制度的强制性，学生无法理解其中的合理性，易造成对教育过程及教师的不认同，不能有效建立共同体内部的信任关系。

二、价值之维：社会信任教育的内涵重塑

社会信任具备诸多道德特性，指涉普遍主义的向他性情感。社会信任教育需要突破功利主义的理论逻辑，将其作为一种道德价值进行培育。此外，社会信任教育与很多价值的形成有高度的关联性，并不是单一价值品质的教育，需要考虑与其他价值的关系。结合社会信任教育的情境性特征，以价值之维重塑社会信任教育内涵，成为突破其理论误区和现实困境的必然要求。

1. 道德价值：社会信任教育的目标定位

不同于人际信任的脆弱性，社会信任是一种稳定的向他性社会情感，增加了亲社会行为的可能性，同时它还是很多价值品质习得的前提。作为一种价值，信任必须依赖对象的存在。“价值本身无法存在，它的存在基于某种通常是具体事务的价值携带者。”^[9] 社会信任也是依赖信任对象才得以发生，正是在一个又一个价值观的习得过程中，社会信任得以稳固。

社会信任不仅取决于对社会运行系统的合理性认识，更取决于对匿名者角色期待的胜任能力及道德水平的判断。系统的社会信任以表象和认知为基础，但更需要愿意去信任他人的动机前提。“信任他人是基于一种基础性的伦理假设，即他人与你共有一些基本价值。”^[10] 社会信任是个体对社会上陌生人以及大多数人的信任，反映了个体对人性善的依赖，也就是说，社会信任教育的目标定位应当是一种道德价值的培养。

社会信任教育，同样要以善良意志作为价值前提。它的作用是把我们同那些不同于我们的人联系在一起，也因此我们不会只相信熟人或同类人。这是一种积极、普遍的价值观。只有作为一种道德价值，个体才会选择作出利他性的信任决策，就此强化社会信任的意识，铸就相应的信任模式。缘于社会信任的稳定性，它并不会像人际信任那样难以建立却易于破坏，相反，个体会结合信任的体验经历及其后果，提升社会信任的成熟度。如果失去了道德属性，个体的信任就是算计式或策略式的信任，并不值得培养。事实上，生活中大部分时候我们可以预测对方是否值得信任，这种类型的信任并不需要学校教育去专门培养。

2. 诚信与同情：社会信任教育的价值主体

要想从根本上遏制住信任危机，前提是有一个人值得民众信任的社会环境。在个体层面，值得信任的环境需要以个体相应的价值品质为保障。因此，社会信任教育还是要落实到个体的价值品质。信任他人者要求自身也是诚实和值得信任的。虽然社会信任在形态上与人际信任有差异性，但它却依赖于人际信任所蕴含的信任需求与诚信品格。具体而言，一方面，要使学生在学校生活中获得基本的信任感，认同社会信任的价值观；另一方面，要落实到个体的品行是值得信任的。澳大利亚出台的价值教育计划倡导9种价值品质，其中一种便是诚实与值得信赖 (honesty & trustworthy)。^[10] 将诚实与信任联系在一起进行培养，对其他公民品格具有奠基性。这符合了价值教育的整体性原则，也为价值教育的路径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值得信任既包含能力上的，也包含人格上的。诚实主要指涉人格，诚实和值得信任构成信任关系的两个必要条件，两者合在一起即是诚信。因此，个体诚信品格的养成构成社会信任教育的要义。

信任的价值观关涉人们最实际的情感感受。借鉴情感教育的思路成为社会信任教育的着力点。“情感教育就是培养人对价值的感受和体验，并逐渐将社会文化的客观价值移入人格内部，使人形成融合统一的价值体系。”^[11] 人格的一致

性将认知、情感等因素包纳进来，形成完整的价值体系，这使得行为具有恒定性和合理性。同情是情感发育之端，与信任具有同样的向他性结构。“由于同情心的接触传染和教育的广泛影响，这种感情的最弱小的萌芽也会被人发掘出来予以精心培养；同时，由于各种外在约束力的强大作用，这种感情还获得了一张完备的围绕着自己的支持性关联网。”^[12] 对这一关联网的熟知，使其在面对某一类社会群体的相同或相似处境时发生共鸣，个体的同情由此被赋予社会性，即形成社会同情。这在作用机制、内容上都与人际信任走向社会信任的过程吻合。基于同情的社会信任感也成为社会信任教育的目标，同情得以成为其价值主体。

3. 师生关系：社会信任教育的价值载体

学生并非对每一个学校成员都产生同样的信任。缘于彼此间情感的密切程度，他们对不同人的义务感有所差异，差序格局仍是学生信任状况的基本布局。教师是学生的重要他人，学生在学校里体验到的最重要的信任关系就是师生关系。卡尔·罗杰斯和博尔诺夫都提出要创设信任的教育气氛。罗杰斯认为情感因素是儿童学习及师生关系的前提性、关键性因素，教师要对学生进行无条件的积极关注，创设充满理解和信任的教学气氛。博尔诺夫则指出，“教育者对儿童的信任也可培养起儿童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心并使其心情愉快。如果教育者对儿童一点都不信任，儿童就不敢去检验自己的力量”^[13]。他们讨论范围基本就是师生的信任关系。以往对师生关系的讨论，指向一种理想状态，落脚点在教师应给予学生充分的信任，认为师生信任是学生成长的一个良好环境，能够有效促进教育的发生。很多研究直接认为教师应给予学生无条件的信任，或借鉴哲学家关于人际信任关系的观点，要求将这一规范落实到教师身上。

师生之间的信任关系要从真实的教育场景出发进行考察。在师生关系上，信任与不信任都是常见的，这是培育社会信任的现实出发点。教师不仅需要理性对待师生关系中的信任与不信任现象，还要教会孩子理性对待。很多时候，学生会基于教师言行形成刻板印象，尤

其是低学段的儿童往往出于模仿和从众而陷入人云亦云的境地，无法正确地对待师生之间的信赖关系。

除了知识授受之外，师生更需要将现代社会分工对信任关系的要求纳入传统的伦理型关系，即彼此要基于自己的社会身份与角色而信任对方。师生关系具有不对称性，彼此拥有不同的角色规定。在教师眼里，学习任务的完成就占据了教师信任学生的主要内容。而在学生眼里，教师的才干和正直则充盈他们对教师个人乃至整个教师行业的信任。对教师来说，他的本职工作是教书育人，教学能力就是使学生能够信任教师的技术角色能力，这本就是社会信任。除此之外，教师应当知晓哪些具体的教学内容、形式能够养成学生的社会信任，并在工作中践行。在交往中，教师践履自己的教师身份，使学生对自己的专业能力、人格产生信任，这是师生交往的本义，也是现代教师的工作伦理。

三、培育社会信任的学校教育何为

鉴于社会信任与其他价值品质的关联性，社会信任教育要在价值教育的整体框架内着力，保持教育方式与内容的一致性，彻底体现信任精神，以信任的态度来养成学生的社会信任。

1. 创设彰显主体的制度情境

在一个好的学校环境里，个体能够习得诸多良好的价值品质。但是到了社会大熔炉之中，一些良好品质会受到现实的冲击，这是困扰价值教育的一道难题。单纯地将社会信任当作道德情感来培养，一方面，与匿名他者交往时，可能遭到欺诈，一味地恪守信任就会吃亏，造成他们对信任的畏惧情绪；另一方面，由于对社会信用体系的不熟悉，他们并不知道失信者会遭受何种惩罚，很难主动去启动失信的制裁，失信者不仅逍遥法外，而且得利。这导致他们的不信任感会进一步加剧。两相比较，养成稳定的社会信任感，其中的反复性和艰难可想而知。

合理的制度是保障信任感的前提条件。不

完善的制度，容易使学校、教师等价值教育的主导者轻易钻制度的空子，用不真诚的方式开展教育。这种行为让学生要么对教师的行为极端厌恶，要么对此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无论怎样，都是营造了不信任的教育氛围，让学生体验到教师行为的虚假性，获得不信任的体验，这对培育社会信任有百害而无一利。

因而，学校价值教育要创设彰显主体的制度情境，化解信任冲突，尽量避免给予负面的信任体验，保障学生信任体验的一致性。对价值教育工作而言，其一，学校要向学生传授社会政治、经济等公共生活中的基本规范和奖惩机制，将之内化到个人习性、集体习俗和道德规范上来，使社会信任成为学生群体共享的价值观；其二，要依靠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建设的社会信用体系，使正式制度对信任的保障与非正式的惯例匹配起来，保障其信任体验的一致性；其三，家庭、社区需要与学校通力合作，联动开展社会信任的培育工作，以保证儿童成长环境的一致性。正是在社会系统协作创造的制度情境中，儿童正确地认识自我，知晓自己及其所属群体的社会角色，发展自己的社会认同与社会信任。

2. 构建具象化的学校信任文化

儿童在进入学校场域之前，就已经处在与周围人信任或不信任的关系之中，他们在此基础上发展自己的信任与不信任的情感。帕特里夏·怀特指出：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学校之于培养信任的任务，一是用具体的事例客观地说明什么叫社会信任；二是力图使学生理解一个民主社会中的社会信任与不信任；三是鼓励学生把那种理解不仅应用于社会，而且应用于作为社会机构的学校；四是培育维持其成员之间的个人信任得以形成和发展的条件。^[4] 学校需要为社会信任的养成创设环境，这即是处于良好信任氛围之中的学校文化。

学校首先要信任学生，让学生处在一个具象化的信任文化之中，学生才有可能养成信任的价值观。整个学校的制度、环境、交往方式都应该是以信任的方式去运作，这样才能给学生营造整体良好的信任氛围，进而为培育社会

信任奠基。要将信任的精神彻底贯彻于学校生活的全过程，以信任的精神来对待儿童，才能营造有利于儿童社会信任成长的教育氛围。

互惠和规范的网络是社会信任的重要来源。为了成为值得学生信任的机构，学校不得不设置防止不信任的程序机制，这些可能会遭到学生的误解。这些机制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制止不信任的行为，并不能让信任自然地流淌出来。在学校中，除了班级这样的常规学生团体，还存在社团、亚文化的小群体等微观集体，这些组织生活并不为学校制度完全约束，并在行政力量与个体之间形成缓冲地带。对学校来说，要鼓励学生参与社团。在他们以自身兴趣、价值为导向而组建的社团中，拥有高度共享的价值规范，对同类型的群体成员具有天然的信任，这种基于分工角色的信任实乃社会信任的雏形。其中，社团的规模是影响信任文化创设的重要因素。“社团规模对信任关系的建立有较大影响，过于狭小的社团交往会囿于彼此的私人关系，有碍学生走向匿名化的社会，而过于庞大的社团则直接将儿童投掷于陌生的社会情境，脱离生活经验。”^[15]

3. 增设基于陌生人伦理的教育内容

社会信任以认知为基础，却不是仅仅基于认知的信任。它指涉对人性本善的相信，并没有对对象的具体要求。所谓信任的认知基础，其实就是将利己的成分考虑进去，并不妨碍其性质。这也注定了社会信任不能仅仅受制于信任对象的社会身份、地位等。中小学生在很多事务上独自面对周遭的世界，面对陌生人时，由于在人际交往上显得稚嫩，且不明晰自己究竟应该如何去面对匿名的他者，这就使得他们缺乏对陌生人的信任体验，加之家长出于安全的考虑一再训导儿童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这些都加剧了学生对陌生人的信任偏见。因此，学会与陌生人相处就成为摆在学生面前的一道实在的问题。

学校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情境，处于熟人社会与匿名社会的中间地带。学校可以有组织地增加学生与陌生人交往的机会，有保障地进行社会信任的培育。倘若没有有序的组织 and 规划，

学生与陌生人的交往体验将会千差万别。他们的社会信任也会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经验，会因为某些不值得信任的人、某些失信行为而丧失对匿名他者的信任。

构建陌生人伦理是社会信任培育工作的终极保障。儿童需要知晓自己应该如何去面对陌生的他者，这有赖经验的积累。在一般性的社会场景中，不仅学校，家长也不敢随意地将儿童置于陌生人的情境之中，但是学校却可以通过自身的社会资源进行有组织的规划，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有组织地增加学生与陌生人的交往机会。美国公立基础学校在教育儿童如何处理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他们强调平等地对待陌生人的异质性，如作为同学的面对面非选择性关心及作为社区居民的近距离关心，创设多种条件促使青少年与学校内外的陌生人交往，以促进对陌生人的了解和信任。^[16]在与陌生人相处的过程中，信任与其他价值观镶嵌在一起，学生获得了对一般性匿名他者的原初经验，能够自如、自主地与陌生人相处，合理的社会信任感在其中自然而然地形成，并奠定了社会信任的价值信念。社会信任作为一种普遍主义价值观被共享，会给予他们信任的义务感，使得他们可以不完全顾及信任行为的风险，选择相信其他场景中的陌生人。

参考文献：

- [1] ZERN D. The attitudes of present and future teachers to the teaching of values (in general) and of certain values (in particular) [J].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997, 158 (4): 505-507.
- [2] [3] [4] [12] 穆勒. 功利主义 [M]. 徐大建, 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 12. 31. 31. 32.
- [5] 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 [M]. 田禾,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23.
- [6] 郑也夫. 信任论 [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 5.
- [7] 卢曼. 信任: 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

制 [M]. 瞿铁鹏, 李强,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28-29.

[8] 方迪启. 价值是什么——价值学导论 [M]. 黄藿, 译.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4: 4.

[9] 尤斯拉纳. 信任的道德基础 [M]. 张敦敏,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2.

[10] 王占魁. 澳大利亚学校价值教育的国家框架及其实施 [J]. 教育发展研究, 2009 (6): 25-28.

[11] 朱小蔓. 情感教育论纲 [M]. 北京: 人

民出版社, 2007: 160.

[13] 博尔诺夫. 教育人类学 [M]. 李其龙, 等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78.

[14] 怀特. 公民品德与公共教育 [M]. 朱红文,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8: 78.

[15] 余庆. 从生活史角度看社团活动的价值性 [J]. 中国教育学刊, 2014 (6): 34-37.

[16] 侯晶晶. 美国公立基础学校生活化的陌生人伦理教育 [J]. 教育研究, 2014 (12): 126-132.

(责任编辑 刘 红)

The Value Dimension of Social Trust and Its Cultivation

Dong Congxun Yu Qing

Abstract: Cultivating social trust is a new point of values education. Due to the special nature of social trust, integrating social trust into values education encountered many difficulti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is utilitarianism which is logically difficult to self-discipline. At the same time, collectivism education and overly institutionalized school management constitute realistic constraints. The cultivation of social trust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values education system, and treat the trust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s a starting point, combined with other values of quality learning. For schools, it is necessary to cooperate with other social institutions to maintain the consistency of students' trust experience, create a school culture of trust, construct stranger ethics, and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social trust in the spirit of trust.

Key words: Interpersonal trust; Social trust; Values education; Universalist values

关于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全面领导的思考

黄 杰

(西南大学, 重庆 400715)

摘 要: 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全面领导是新时代高等教育领导体制的理论升华, 是建设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强国的时代要求, 是推动高校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需要。党对高校全面领导是系统的、整体的、发展的、全方位的, 在其内容体系中, 管党治党是实践起点, 办学治校是价值原点, 深化改革是战略支点, 立德树人是关键落点。要实现党对高校全面领导, 必须健全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运行机制、党领导下的教授治学运行机制、党领导师生参与民主管理运行机制,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 确保党始终成为高校改革发展的坚强领导核心, 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高校党委; 全面领导; 逻辑进路; 内容体系; 运行机制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1) 06-0059-0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1], “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 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 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2]。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全面领导是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 必须深刻理解党对高校全面领导的逻辑进路, 准确把握党对高校全面领导的内容体系, 健全完善党对高校全面领导的运行机制,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 确保党始终是高校改革发展的坚强领导核心, 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深刻理解党对高校全面领导的逻辑进路

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全面领导, 事关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大学的根本问题。深刻理

解党对高校全面领导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与实践逻辑, 是牢牢掌握党对高校的领导权, 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的前提条件。

1. 高等教育领导体制的理论升华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领导体制经历了“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等发展变化。^[3] 1990年7月,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党的建设的通知》, 要求“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1996年3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明确了“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1998年8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

收稿日期: 2020-11-18

作者简介: 黄杰, 男, 助理研究员, 西南大学党政办公室主任,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第1期教育部直属系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暨第61期高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 主要从事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和高校党的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2014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健全高校党委与行政议事决策制度。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办好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高校党委对学校工作实行全面领导，承担管党治党、办学治校主体责任，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保落实”。^[4]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强调“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5] 2021年4月，中共中央印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强调坚持和加强党对普通高等学校的全面领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6] 这些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与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加强党对高校全面领导提供了理论支撑和行动指南。

2. 建设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强国的时代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高等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十三五”期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002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进入普及化阶段。2016年至2019年，高校毕业生累计达3200多万。2019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0.7年，新增劳动力中有50.9%接受过高等教育。^[7] 这些历史性成就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了“十四五”时期发展蓝图，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同样，我国高等教育也面临着发展中的机遇和挑战。“十四五”时期，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的作用从基础支撑向支撑引

领并重发展，体量规模从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结构类型从相对单一结构向多元多样化办学结构转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需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8] 这样的历史使命给予了高等教育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使其面临严峻的压力和挑战。这就需要党更加有力地加强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努力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使命。

3. 推动高校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需要

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看，党对高校的领导切实得到加强，党的教育方针得以有效贯彻，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获得有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政治底色得以坚决保证。同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党对高校的领导还存在诸多不足。一是不同程度存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问题。比如，分析《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巡视公布二十九所中管高校巡视反馈情况》，29所高校存在“四个意识”不够强的问题；16所高校存在党委领导作用发挥不够的问题；23所高校存在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到位的问题；27所高校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23所高校存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的问题；22所高校存在基层党建方面的问题；20所高校存在“两个责任”落实不到位的问题。^[9] 二是党的全面领导内容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距离贯穿管党治党、办学治校全过程还有差距，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不够显著，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融合发展不够紧密。三是党的全面领导运行机制还需进一步健全。党政机构职能体系不够完备，校院两级治理体系不够优化，党委、行政、教授、师生等内部治理要素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进一步筑牢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全面领导的思想共识，不断提高党全面领导高校工作的能力水平，确保工作取得实效。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进一步筑牢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全面领导的思想共识，不断提高党全面领导高校工作的能力水平，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二、准确把握党对高校全面领导的内容体系

党对高校全面领导是系统的、整体的、发展的、全方位的，体现在管党治党、办学治校各领域各环节，融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全流程各方面，构建起内涵丰富、要素齐整、覆盖全域的内容体系。

1. 实践起点是管党治党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打铁还需自身硬，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全面领导，首先必须贯彻落实党的建设总要求，切实增强高校各级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组织建设力。

第一，加强党的政治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10] 加强党的政治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体现。高校党委要以共产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师生党员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重点加强学校政治生态建设、班子政治功能建设、干部政治素质建设。^[11] 严格落实“两个责任”，坚持“严”的主基调，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第二，加强党的思想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12] 高校党委要引导广大师生坚定理想信念，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师生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第三，加强党的组织领导。高校党委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引导广大师生党员在立德树人、学业学术、创新创造、管理服务等各方面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按照“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

实、勇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和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的要求，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2. 价值原点是办学治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各类学校党组织要把抓好学校党建工作作为办学治校的基本功，把党的教育方针全面贯彻到学校工作各方面”^[13]。要把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管宏观、谋全局、抓大事，重点加强对办学方向、发展规划、依法治校的领导。

第一，加强对办学方向的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高校党委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不动摇，始终确保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始终坚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使命不动摇；必须牢牢把握并不断强化“四个服务”意识，使高校在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发挥更加积极、更为主动、更有成效的重要作用。

第二，加强对发展规划的领导。党领导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是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高校党委要领导并主持制定学校“十四五”发展规划，认真分析学校的历史方位、职责使命、机遇挑战、发展基础等，精心谋划发展蓝图，科学设定未来五年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以及重点任务。在全校开展规划制订大讨论，广泛征求师生员工的意见建议，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第三，加强对依法治校的领导。依法治校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高校的具体实践，是完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客观要求。高校党委要深入开展法治教育，引导广大师生将依法治校法治观念内化为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加强对制定（修订）大学章程的领导，把党对高校的领导体制、运行机制、内容体系等写入大学章程，使大学章程充分体现党的意志和党的主张。

3. 战略支点是深化改革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

的宝贵经验。当前,高等教育深化改革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更需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准改革航向,把握主攻方向,加强统筹协调,确保各项改革相互配合、协同推进。

第一,加强对党政机构职能体系改革的领导。在机构设置上,确保党的领导全覆盖,按要求设立党委巡察工作办公室、党委教师工作部等党委职能部门。根据工作实际,将有的党委部门与职责相近的行政部门合并或者合署办公,构建统一高效的党政机构格局。梳理各职能部门职责,厘清部门职责边界,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优化工作流程,提升治理效能。

第二,加强对校院两级治理体系改革的领导。积极探索从“校办院”向“院办校”转变,试点“院为实体”建设,发挥二级学院的主体效能,激发二级学院的办学活力。进一步落实“放管服”改革,实现决策权力、资源配置、管理责任向二级学院“打包下沉”,完善对学院工作的指导、支持、服务与监督制度,使两级治理运行更科学、更顺畅。

第三,加强对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的领导。要树立一盘棋思想,推动党的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各类评价体系改革一体谋划、一体建设。把教育评价改革与党和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结合起来,与高校发展愿景、发展战略和“双一流”建设等重点任务结合起来,创新评价模式、要素和手段,通过评价改革激发高校内涵发展、质量提升的活力。

第四,加强对党建与事业发展融合考核改革的领导。强化党建工作与事业发展同部署、同落实、同推进、同考核,解决党建工作和事业发展“两张皮”现象。年终考核时,将党建工作考核分数与事业发展考核分数互为系数相乘得出融合考核分数,以此作为二级单位工作成绩评定、绩效工资核拨、评优评奖、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和有关资源分配的重要参考。

4. 关键落点是立德树人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立德树人是党对

这一根本问题的时代性回答。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要抓住关键落点,紧紧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展开。

第一,加强对构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领导。高校党委要切实肩负起领导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的主体责任,全面统筹各领域、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加强体制机制、项目布局、队伍建设、条件保障等方面的系统设计,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全面融入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努力形成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全员协同参与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第二,加强对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的领导。高校党委要深刻领会“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14]的内涵意蕴,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干部考核、教师评价、绩效分配、资源配置的重要指标,让立德树人成效成为硬约束、指挥棒。牢固树立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大力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构建“思政课、通识课、专业课”协同育人格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按要求配齐配强辅导员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第三,加强对师德师风建设的领导。高校党委要把师德师风建设作为加强教师队伍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抓手,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引导广大教师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的要求,坚定理想信念,恪守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以深厚学识教育学生,以高尚情操感染学生,做到“经师”与“人师”的统一,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成长成才。

三、健全完善党对高校全面领导的运行机制

健全完善党对高校全面领导的运行机制,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科学构建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相互耦合、有序运行的体制机制,确保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

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1. 健全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运行机制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党领导高校的根本制度，是高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保证，必须毫不动摇、长期坚持并不断完善。

第一，正确处理“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的关系。“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是这一机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委领导”是“校长负责”的前提，重在谋划和决策，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政治属性；“校长负责”是落实“党委领导”的基础，重在实施和管理，保证党的全面领导落地生根。具体来说，党委是学校的领导核心，对学校工作实施全面领导，履行管党治党、办学治校主体责任，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抓班子、带队伍、保落实的领导作用，支持校长依法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校长和其他行政领导班子成员则自觉接受党委的集体领导，贯彻执行党委决定，积极主动地做好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

第二，正确处理党委和行政决策边界关系。党委决定重大（重要）事项不等于党委包揽全部行政事务。2019年印发的《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党委常务委员会会议和校长办公会议（校务会议）议事规则示范文本的通知》明确了常委会、党委常委会和校长办公会的议事决策范围，规定常委会讨论决定9个方面重大事项、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8个方面重要事项、校长办公会主要研究提出拟由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的重要事项方案，具体部署落实党委常委会决议的有关措施，研究决定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工作。这些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党委和行政的议事决策范围和程序，完善了党对高校全面领导的具体内容。

第三，正确处理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的关系。党委领导不是党委书记个人领导，是以党委书记为第一责任人的集体领导；校长负责不是校长个人负责，是校长统筹行政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负责。党委和行政领导班子成员既要有明确的职责分工，积极主动承担分管的工作任务，又要加强合作交流，相互配合，提高协同

效能。

第四，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严格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研究决策重大（重要）事项。制定学校重大（重要）事项清单，重大（重要）事项决策全面落实师生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等程序要求，进一步推动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健全党委书记和校长定期沟通协商机制和班子成员碰头会机制，坚持党委书记、校长末位发言制度，充分听取班子成员的意见建议。

2. 健全完善党领导下的教授治学运行机制

健全完善党领导下的教授治学运行机制，重点是发挥党的领导优势，为学术权力发挥作用营造浓厚氛围，作出制度安排，进行规范引导。

第一，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高校党委要充分发挥在思想发动、宣传教育方面的显著优势，在全校上下营造崇尚学术、尊重学术、激励创新、追求卓越的学术氛围，特别是要引导专家教授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恪守学术道德，发扬学术民主，维护学术尊严，为学术权力有效运行奠定思想基础。

第二，保障学术权力有效发挥。高校党委要健全和完善决策机制，协调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为学术权力发挥效用作出制度性安排。比如，在《党委常委会会议议事规则》《校长办公会议议事规则》中明确规定，涉及学术事务的重要事项，应当在决策前充分听取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意见。经学术委员会审定或评定的事项，通报党委常委会或校长办公会；若有重大异议，提请学术委员会复议或暂缓实施；若对复议事项有全体委员的3/4以上赞成，不再提请复议。经学术委员会审议或咨询的事项，提交党委常委会或校长办公会审议决定；若学术委员会对审议决定提出明确不同意见，党委常委会或校长办公会应当作出说明、重新协商研究或者暂缓执行。

第三，引导学术权力规范运行。高校党委要指导学术委员会健全会议开放、委员回避、结果公示、年度报告等制度，提高学术治理透

明度,增强学术公信力。建立学术委员会定期向教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制度,接受教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对学术委员会委员开展专项培训,提高其学术事务治理能力。健全信息通报、数据共享机制,保证在信息完整、数据精确的前提下科学进行学术评判。强化党的审核把关机制,为学术事务管理设定政治边界、把住学术底线、守住纪律红线。

3. 健全完善党领导师生参与民主管理运行机制

党领导师生参与民主管理,既是党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充分保证、切实维护师生切身利益的实现形式,也是完善党的全面领导运行机制的组成要素。

第一,保证协商民主精神充分彰显。高校党委要加强协商民主文化建设,激发广大师生积极主动参与学校建设的主人翁意识,保证广大师生民主参与学校治理的权利。努力把协商民主意识贯穿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管理服务全过程内化为大学精神文化,营造民主和谐的发展氛围。

第二,建好师生参与民主管理平台。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发挥统一战线的优势和作用,建立党委常委联系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等制度,广泛吸纳党外人士参与学校民主监督、民主管理。完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强化教职工主体意识,推进教职工自治、自律。完善学生代表大会制度,健全学生组织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完善社会参与和监督机制,保障理事会对学校改革发展相关事项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第三,健全师生参与民主管理机制。建立重大事项调研制度,积极践行“一线规则”,深入院系、支部、教室、宿舍等,问计于师生,为科学决策奠定基础。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加强信息公开的时效性、准确性、全面性,重点推进重大决策、财务预算、资产管理、资源配置、涉及师生切身利益事项的信息公开。健全办事公开制度,全面公开办事依据、条件、要求、过程和结果。建立领导干部与师生“面对面”“键对键”制度,广泛听取师生意见建议,高效快捷地回应师生诉求,解决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1] [4] 习近平.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N]. 人民日报, 2016-12-09 (1).

[2] 习近平. 坚持立德树人思想引领 加强改进高校党建工作 [N]. 人民日报, 2014-12-30 (1).

[3] 张斌贤. 我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变迁 [J]. 教育学报, 2005 (1): 36-42.

[5] [13] 习近平.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N]. 人民日报, 2018-09-11 (1).

[6] 中国政府网.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EB/OL]. (2021-04-22) [2021-04-26].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4/22/content_5601428.htm.

[7] 吕佳蓉. 从“零的突破”到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 [EB/OL]. (2020-11-07) [2020-11-15]. http://www.ccdi.gov.cn/yaowen/202011/t20201107_229578.html.

[8] 杜玉波. 面向未来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新思考 [EB/OL]. (2020-09-14) [2020-11-15]. https://news.eol.cn/xueshu/202009/t20200914_2011869.shtml.

[9] 王强. 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巡视公布二十九所中管高校巡视反馈情况 [N]. 中国教育报, 2017-06-22 (1).

[10] [1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45.

[11] 张东刚. 加强我国高校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经验——直属高校领导班子建设“三位一体”理念解析 [J]. 中国高等教育, 2020 (7): 24-27.

[14] 习近平.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8-05-03 (2).

(责任编辑 吴潇剑)

Reflections on Uphold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ove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uang Jie

Abstract: Adhering to and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ove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he theoretical sublimation of the leadership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requirement of the times for building a powerful socialist higher education country, and the practical need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arty build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ove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systematic, overall, developing and all-round. In its content system, party management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practice, school management is the origin of value, deepening reform is the strategic fulcrum, and moral education is the key poin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ove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 must improve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president responsibility syste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ommittee,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professors' academic research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democratic managem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We must implement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all aspects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running a school and running a university,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Party has always become a strong core of leadership in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University Party committee; Overall leadership; Logical approach; Content system; Operating mechanism

“十四五”时期 高校网络思政工作的时代内涵和发展逻辑

张江艺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 100029)

摘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作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网络思政工作必须准确把握新的历史定位和历史使命,深刻认识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对高校网络思政工作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更加注重大学生的理想信念锻造、人民情怀培养、创新能力提升、责任担当塑造,准确把握时代性更强、开放性更大、融合性更密、安全性更严、辐射性更广的新的特点,在“准”上强化内容供给、在“广”上拓展实践路径、在“用”上建强平台阵地、在“全”上整合育人资源、在“培”上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十四五”; 高校思政; 网络思政; 时代新人; 新任务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1) 06-0066-07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1]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重点研究“十四五”规划问题并提出建议时,按照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的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将“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进行统筹考虑,描绘了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发展蓝图。作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网络思政工作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宣传思想工作、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准确把握高校网络思政工作新的历史定位和历史使命,深刻认识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对高校网络思政工作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迎接新的发展任务、把握新的发展特点、开创新的发展思路,更好地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一、“十四五”时期高校网络思政工作的发展任务

高校网络思政工作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重要渠道。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经

收稿日期: 2020-11-18

作者简介: 张江艺,男,副编审,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大学生在线、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常务副主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第1期教育部直属系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暨第61期高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主要从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编辑出版、文化产业研究。

验告诉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围绕中心和以人为本。“思想政治教育既有根本目标与任务，又有具体目标与任务；既有长远目标与任务，又有近期目标与任务。其内容包括紧密联系、有所侧重的两个方面：一是服从服务于全党工作大局和中心工作，围绕各个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保证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二是以人为本，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培养所需人才、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先后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呈现持续加强改进、不断向上向好的发展态势。其中，高校网络思政工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生动局面。一是保障机制不断完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党中央对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作出了战略安排和全面部署，课程、科研、实践、文化、网络、心理、管理、服务、资助、组织“十大”育人体系不断完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格局基本形成，理论武装、学科教学、日常教育、管理服务、安全稳定、队伍建设、评估督导“七大体系”加快推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四梁八柱”基本建立，高校网络思政工作有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二是阵地建设不断推进。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使用，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主阵地、最前沿，各地各高校积极抢占网络意识形态主阵地。学校层面上，各高校的新媒体建设不断加强，融媒体建设深入推进；国家层面上，从全国、省级到高校的三级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初步建成，中国大学生在线、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易班“三驾马车”的平台吸引力和全国影响力日益提升。三是方式方法不断创新。网络思政工作在尊重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学生成长规律的同时，不断加强对互联网发展、建设、应用规律的研究，使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融合起来，不断增强时代感、

针对性、吸引力，网络思政工作的有效性不断加强。四是队伍建设不断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高校新媒体建设队伍作为网络思政工作的骨干力量，活跃在互联网各个角落，在网络上搭建起了思政工作与大学生之间的沟通立交桥。与此同时，高校网络思政工作发展过程中也存在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一是思政工作内容供给针对性不强。思政工作内容纷繁，有的简单地把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搬到互联网上，针对性不强，实效性不足。思政工作内容资源相对分散，有的重复建设，作用发挥有限。二是平台质量参差不齐。网络思政工作平台特别是高校公众号建设快速发展，但是建设质量参差不齐，有的高校拥有多个公众号，由于管理不强，导致自以为是、各自为战，矩阵作用发挥不够，示范性和引领性严重不足。三是抵达率不够，黏着度不足。互联网思维不强，对网络规律、新媒体特点掌握不够娴熟，对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大学生的实际需求、接受习惯、心理特点的研究不够，网络思政工作的方式方法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十四五”时期，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对教育、宣传思想、文化、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等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必须把高校网络思政工作放在这个时代发展大势中思考。“十四五”时期，党和国家将更加注重对时代新人的基本要求，高校网络思政工作需要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积极主动作为。

1. 更加注重大学生的理想信念锻造

理想信念教育关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工作的根本问题。高校网络思政工作的最终目标就是帮助大学生补好“精神之钙”，正确把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高校网络思政工作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帮助大学生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

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要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用好伟大抗疫精神等最鲜活的爱国主义教材，用网络的、校园的、青年的传播方法广泛开展学习宣传，在中西对比、内外比较中坚定理想信念，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更加注重大学生的人民情怀培养

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在2020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寄语全国各族青年，特别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站稳人民立场。高校网络思政工作要帮助大学生强信念、善学习、增感情、重实践，站稳人民立场，增进人民感情。要广泛开展包括调研考察、志愿服务、支教扶贫等在内的社会实践成果网上宣传展示，扩大社会影响面，鼓励大学生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了解国情、社情、民情。要在网络上多展现人民群众的智慧结晶和劳动成果，发挥好道德楷模、劳动模范、大国工匠等的示范作用，推动大学生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在服务人民的实践大熔炉中努力锻造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要加强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和就业指导，鼓励大学生主动投身乡村振兴、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融入乡村振兴战略中，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3. 更加注重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提升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3]。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我国高校要勇挑重担，迎难而上，敢于“啃硬骨头”，一方面要瞄准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技术攻关，以超常规方式加快培养一批紧缺人才，另一方面要广泛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高校网络思政工作要更加注重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提升，发挥网络联结优势，加大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内容、赛事交流、实

践平台、产学研结合等方面的内容供给，帮助大学生不断增强创新自信、激发创新精神、培养创新思维、提升创新能力。

4. 更加注重大学生的责任担当塑造

前进的道路从不会一帆风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一代一代青年矢志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同学们将是接过历史接力棒的主力军。”^[4]当代大学生可谓生逢其时、责任重大。未来五年和未来十五年，党和国家赋予了时代新人新的时代责任：国家建设迫切需要大学生到党和国家最需要人才的地方去，解决“卡脖子”问题迫切需要大学生努力学习，更多地成为高层次人才，提高社会文明程度需要大学生在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等方面起到引领推动作用。高校网络思政工作要注重大学生的责任担当塑造，帮助他们以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驰而不息的奋斗力量、坚定执着的担当意识奋勇前行。

二、“十四五”时期高校网络思政工作的发展特点

信息技术革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历史性交汇，为高校网络思政工作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十四五”时期，高校网络思政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立足“十四五”、面向2035年远景目标开展工作，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更宽阔的视野、更开放的姿态、更有为的状态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服务。在这一历史使命中，高校网络思政工作要准确把握住时代性更强、开放性更大、融合性更密、安全性更严、辐射性更广的新的特点。

1. 时代性更强

“十四五”时期，高校网络思政工作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固占领意识形态领域主阵地、推动教育现代化等方面的任务非常艰巨，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首先，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各方面建设任务对时代新人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更严

格的要求。其次，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环境，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经济总量持续增长，日益逼近美国，对当前以美日欧为主导者和维护者的现行国际体系将形成挑战，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更加激烈。最后，我国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势必将更多地发挥网络信息技术的作用，从而与高校网络思政工作有更多的融合机会。可以说，高校网络思政工作与时代脉搏从来没有这么贴近过，时代对高校网络思政工作的期待也从来没有这么强烈过。高校网络思政工作应该紧紧抓住时代赋予的机遇，立足时代，围绕时代，锐意进取，奋发有为。

2. 开放性更大

当今世界充满复杂因素和不确定性，“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但从历史发展大势看，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大势所趋，开放是联结更多资源、促进各方协同、共同促进发展的必然之举。高校网络思政工作因自身的网络特性，天然呈现开放性特点，而这一特点在“十四五”时期将更加明显。首先，外部的开放性。为推动形成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协同育人的大局面，高校网络思政工作在理念上势必要保持开放，主动寻找、综合运用高校思政工作体系之外的思政育人资源，形成更强更大的育人合力。其次，内部的开放性。高校思政工作理论武装体系、学科教学体系、日常教育体系、管理服务体系、安全稳定体系、队伍建设体系、评估督导体系“七个子体系”，课程、科研、实践、文化、网络、心理、管理、服务、资助、组织“十大育人”在相对独立的同时，将在网络信息技术条件下更加互相开放，用开放促进共享，用共享促进资源利用和工作提升。最后，网络的开放性。高校网络思政工作将更加积极发挥各类线下资源对线上引导的有力支撑作用，形成线上线下的良性互动，充分激发出网络思政在高校落实立德树人中的独特优势。

3. 融合性更密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的抓总工程。“十四五”时期，高校网络思政工作在体系建设方面的融合性特点将

更加明显。首先，网络信息技术与各子体系之间的衔接、呼应、融合。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革命成果，将助推各子体系取得更大实效。其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将形成一体化、全贯通的局面。网络信息技术将助推提高各子体系之间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解决以往“各自为战、只顾一摊”的现象，使之既能化整为块，又能化块为整，同时还能助推块与块之间的协调互补、深度融合、高效联动，让思政工作各领域各环节与整个教育事业融合起来，与学生成长过程结合起来，与广大教师的教书育人实践综合起来。

4. 安全性更严

安全和发展是同步推进的，“十四五”时期高校网络思政工作的快速发展，势必建立在更加严密的安全性要求之上。首先是意识形态安全更加重要。当前国际战略格局“东升西降”，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是高校网络思政工作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需要牢牢抓住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确保用马克思主义占领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其次是网络安全更加突出。网络安全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随着信息化不断深入推进，高校思政工作所面临的网络安全形势将更加严峻。高校网络思政工作必须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网络安全意识和技能，也必须更加注重工作中的数据安全，提高感知能力和防控能力。

5. 辐射性更广

高校网络思政工作的根本目的是立德树人，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十四五”时期，高校网络思政工作要开拓思路，拓宽视野，将工作效果辐射到其他领域和环节，使网络思政成果不仅转化为大学生勇担时代责任的成果，还要转化为人才培养的成果，转化为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为创新创业的成果。首先，加大网络思政内容供给，从源头端把高校网络思政工作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逐一对接，寻找融入点、转化点。其次，推动“三全育人”综合改革不断走向纵深，推动形成“十大育人”的

内循环和外循环，扩大高校网络思政成果转化，形成生动丰富、效果明显的高校思政工作局面。

三、“十四五”时期高校网络思政工作的发展逻辑

“十四五”时期，高校网络思政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宣传思想工作、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为加快构建和健全完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动“三全育人”综合改革不断走向深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在“准”上强化内容供给

一是要更加注重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要充分发挥网络优势，不断增强学习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利用视频、音频、图片资料等生动丰富的网络教学资源去弥补传统课堂教学的不足，通过拍、画、说、演、唱等多种方式去展示实践教学成果，发挥好各网络平台和新闻媒体的联动效应，更好地帮助大学生充分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深刻领悟为什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更加坚定“四个自信”。二是要更加注重网络素养教育。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环境和媒介生态环境下，要规划设计、大力推进大学生网络素养教育，帮助大学生正确对待网络，理性分析信息，提高对不良信息的分辨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进而形成对负面信息的“免疫力”，更为理性地参与网络行动。三是要更加注重相关重点领域的网络内容供给。要面向2035和21世纪中叶的长远发展目标，重点围绕职业规划、就业指导、创新创业、心理健康等方面加大优质内容的网络供给，帮助大学生提前找到职场代入感和人生事业追求，以小我融入大我、青春献给祖国的坚

强信念，以昂扬的精神状态、优异的学业成绩、出色的创新能力，投身强国伟业，绽放青春风采。

2. 在“广”上拓展实践路径

一是建立高校网络思政工作体制机制。健全完善党对高校网络思政工作的领导纵到底、横到边、全覆盖的工作格局。强化网络思政工作在“三全育人”综合改革不断引向纵深中的综合助推作用，为高校网络思政工作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二是加快形成高校网络思政工作新的发展格局。大力推动“十大育人”体系中网络育人与课程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心理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资助育人、组织育人的内部循环，同时加强高校网络思政工作的整体外部循环，使网络思政工作与课堂教学、管理服务有效循环起来，让思政工作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提高软着陆，减少硬着陆，真正入脑入心，取得实效。三是全面挺进移动主战场。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传播主渠道，移动端新媒体已经成为舆论引导主阵地，移动传播已经成为当前传播格局中的主流方式。高校网络思政工作要坚持移动为先，把更多资源倾斜到移动终端上，搭建更多的展示平台，开展更多的育人活动，牢牢把握高校网络思政传播的制高点。

3. 在“用”上建强平台阵地

一是做强全国性的高校网络思政平台。强化中国大学生在线、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易班“三驾马车”的引领带动作用。“三驾马车”作为平台服务者和应用供给者，要摸准学生和战线需求，加强资源匹配，凝聚队伍合力，加大机制保障。高校作为网络建设和平台使用者，要深入了解学生实际需求，精细制定建设需求和任务清单，加强与“三驾马车”的有机对接，形成服务、建设、使用的一体化模式。各省（区、市）高校网络思政工作中心、思政工作创新发展中心、高校思政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要发挥关键枢纽作用，把高校的需求与“三驾马车”的服务精准对接起来，把资源保障和内容供给有效结合起来。二是大力推进各高校网络思政工作平台建设。大力推动教育系统融媒

体建设,加快探索新时代“全程、全息、全员、全效”教育融媒体发展路径,着力挖掘育人元素,丰富校园文化,加强思政教育。特别是要大力推动高校思政类重点公众号项目建设,加强示范引导和建设管理,不断提高新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充分发挥高校公众号的育人功能。三是要积极汇聚各类社会网络力量。要与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学习强国等主流网络媒体加强对接,与微信、微博、QQ、抖音、快手、B站、知乎等主要商业平台加强沟通,加强移动阵地建设和优质内容供给,积极抢占新兴舆论阵地,推动高校网络思政工作手臂延伸,取得更大实效。

4. 在“全”上整合育人资源

一是利用网络聚合各类网络思政工作资源。不断拓宽视野,充分调动国际国内形势与政策、新时代精神图谱、大国重器、先进人物楷模等各类思政工作优质资源,以优质资源吸引资源、配置资源、创造新的资源。二是建设好高校思政工作资源库。资源库建设可分别围绕高校党建、思政、宣传、稳定等方面展开,根据各战线需要建设理论学习资源库、工作案例库、课程库、论文库、网文库等,还可以建设图片素材库、视频素材库。同时,基于资源库用户行为数据,汇总统计资源库各类资源建设情况、资源应用情况、用户分布特征等数据分析结果,有效提升资源库应用的吸引力和黏着度,为高校思政工作提供数据支撑和决策服务。三是加强大学生日常行为数据资源的挖掘和应用。充分运用社交媒体(微信、微博、QQ、抖音、快手、B站、知乎等)、智慧校园(宿舍入住、餐厅消费、自习室预约、图书馆借阅、网上选课、在线学习等)沉淀下来的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对大学生行为习惯及需求进行画像,了解大学生思想动态、学业发展、生活规律、社会实践等相关情况,精准搭建学生思想困惑需求端和高校思政工作供给端之间的桥梁,从而精准调度教育资源,精准提供管理服务,实现精准思想引领。

5. 在“培”上加强队伍建设

一是加大高校网络思政工作队伍培养力度。

以高校思政工作中青年骨干、高校思政课中青年骨干、网络育人名师、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等为重点,提升他们的网络素养,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为他们提供更广阔的网络平台。遴选一批政治信念坚定、热爱网络宣传工作、熟悉网言网语的高校思政工作者、大学生骨干担任网评员,在关键时刻发声,提升舆论引导水平。发挥好大学生年度人物作用,更好发挥朋辈教育优势。二是抓好高校思政工作队伍网络培训。重点开展好高校辅导员网络培训、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培训。充分运用信息化、数字化手段对培训工作进行调研分析,根据需求及时调整完善,提升针对性和时效性。三是通过网络继续加强高校思政工作队伍交流。持续建设好高校思政课教师网络集体备课平台,不断丰富完善高校思政课教学资源库,及时推广高校思政工作先进经验与优秀工作案例。

综上,“十四五”时期的高校网络思政工作必须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深刻认识思想政治工作是高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紧紧服务于党和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紧紧服务于培养时代新人的重大历史使命,以开展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内容,坚持导向为魂、移动为先、内容为王、创新为要,充分发挥网络优势,积极统筹各方资源,在建设教育强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 [3]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9-10.
- [2]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编写组.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411.
- [4]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湖南新篇章 [N]. 人民日报,2020-09-19(1).

(责任编辑 刘红)

New Connotations and Development Logic of the Internet-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of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Zhang Jiangyi

Abstract: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made a comprehensive plan and strategy for China's development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2021–2025).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ir fundamental mission to develop morality and build character among students, universities, in their internet-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must fully appreciate their new status and mission, and fully understand their new tasks an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m when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embraced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and begun to build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They must redouble their efforts in strengthening students' ideological conviction, their commitment to people, their capacity to innovate and their readines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With a firm grasp on new development features which are more open, more integrated, more cybersecurity-focused, more influential along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universities should supply more targeted contents, broaden the pathways for practice, build robust platforms for application, integrate resources in an all-round way for cultivating talents, and promote team building for cultivation.

Key words: 14th Five-year pla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universit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yberspace; New generation; New tasks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建构论析

史 洋

(天津财经大学, 天津 300222)

摘 要: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性, 意识形态性同时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评判的根本依据。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多变, 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建构, 应该遵循“内涵—要求—策略”的逻辑: 理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实质、学科定位和实践发展, 把握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建构的基本内涵; 依据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本质、理论性实质、现实性根源的内在规定, 明确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建构的内在要求; 把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与立场、内容、方法相统一, 确立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建构的实践策略, 从而为不断增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提供基本思路。

关键词: 新时代; 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1) 06-0073-06

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实现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基本关系, 其性质的规定性, 就是意识形态性”^[1]。就此而言, 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无疑可以被看作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和发展的“生命线”, 同时也是评判思想政治教育基本效用的根本依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事关党的前途命运, 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2]然而, 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形势严峻且复杂多变, 亟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因此, 加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建构, 必须“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遵循“内涵—要

求—策略”的逻辑要求, 从而更好地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

一、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建构的基本内涵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建构, 首先必须牢牢抓住党的意识形态教育的本质内涵, 避免思想上的误判。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 因而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就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不断夯实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共同思想基础。基于此, 理解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建构的基本内涵, 需要从思想政治教育蕴含着的理论实质、学科定位和

收稿日期: 2021-03-28

基金项目: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主旋律影视作品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实效性研究”(TJSZZX-005)

作者简介: 史洋, 男, 讲师, 天津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实践发展这几个层面来把握。

第一,从理论实质来看,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是由政治法律思想、宗教、教育、道德、哲学和文学艺术等社会意识形式所构成的思想体系。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属于社会意识形式,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指导思想必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既肩负着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武装群众的重要任务,同时也面临着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现实挑战。可以说,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是新时代不断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的内在要求。因此,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建构一定要自觉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体系,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宣传教育切实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始终。

第二,从学科定位来看,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有机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无疑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自2005年教育部发布《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以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下独立的二级学科的归属得以明确。其附件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简介明确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培养人们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学科。这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其发挥作用的根本依据,同时从根本方向上指明了学科的定位和使命。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设立的根本目的和主要任务就在于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从而为更好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建设,在其现实性上也是新的历史阶段为了更好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而进行的科学谋划。

第三,从实践发展来看,新时代思想政治

教育是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自从中国共产党应运时代而生,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实践发展中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理论形态,使中国人民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这不仅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科学性所决定的,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在指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伟大实践的有力证明。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95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3]进入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要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4]的使命任务,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因此,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建构应从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出发,始终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二、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建构的内在要求

进入新时代,正确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依然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5]意识形态本身的复杂性,需要人们透过现象看本质,理解其实质内容,认清其根源。基于此,深入把握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建构,需要遵循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本质、理论性实质、现实性根源等基本规定。

1. 阶级性规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

注重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分析和考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马克思在考察以往的阶级社会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6]。如上文所述,意识形态

是一种思想体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占据统治地位，而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必然要处于领导地位。当代社会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呈现“思潮化”，即任何一个有影响、有思想体系的社会思潮都被纳入意识形态的范畴。这种意识形态看似是非统治阶级非官方的思想，但究其本质而言，它总是隶属于某个阶级或政党的利益和意志。如新殖民主义、生态主义、新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等社会思潮往往都是在理论层面对自己所代表的某个阶级或政党利益的意识形态表达。

毋庸置疑，在新时代的历史征程中，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不容否认。一直以来，尽管国内外有些人在鼓吹意识形态的“中立论”“终结论”“过时论”等观点，但是意识形态总是反映一定的阶级或政党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并服务于该阶级或政党的利益和意志。“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7] 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其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不仅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或政治性要求，而且直接把党的利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相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规定要求增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必须始终坚持党性原则进而坚定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宗旨。

2. 理论性规定：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

意识形态在内容上是由各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社会意识形式有机构成的思想体系，具有系统的理论性特征。马克思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同人们的物质活动，同人们的物质交往，同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8]

意识形态理论涉及的范围和内容是极其广泛而复杂的。而层次不同、地位和作用各异的社会意识形式有机构成的整体，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人们的思想行为产生深

远的影响。归根结底，理论服务于目的。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总是为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服务，有效整合社会意识诸形式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巩固和维护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地位。“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9]。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建构的理论要求，就是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特别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自觉性。这就表明，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掌握人。意识形态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人们的思想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不加强理论武装人、掌握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10]。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说服人。理论只有说服人，才能获得人们对其正确性的信任，才能凝聚共识和向心力，产生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力量。尤其在当今世界竞争中，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的较量异常激烈。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建构只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才能有效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提升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效果。基于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本质规定从根本上决定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建构，所以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

3. 现实性规定：满足人民生活实践的精神需要

意识形态不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理论，而是源于人们的社会现实生活需要，具有显著的现实性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11] 由此可见，我们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只能是从人的现实需要出发，用来反映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就意识形态的整体构成而言，对于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

“虚假意识”的认识和把握，显然不能被看作认识论上的错误，而只能把它理解为人们现实生活过程的历史产物。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总是喜欢用“虚假意识”反映现实生活，其目的不是揭示现实生活的真相，而是竭力蒙蔽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真实认识，以维护和巩固阶级统治。而无产阶级为了人类解放和发展，应该消除这种颠倒的“虚假”意识形态，真实揭示社会现实生活的真面目。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性规定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满足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反对把理论变成脱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需求、脱离群众火热生活的空洞说教。

毫无疑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2]可见，从实践出发，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意识形态的变迁，不但可以把握其社会现实生活的本质，而且还可以揭示一切意识形态理论活动的秘密。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现实性规定，不能从方法上抽象地谈论意识形态理论，而要通过人的物质生活实践，坚持以现实生活问题为导向，真正理解和把握人民实际的精神生活状态，以满足人民生活的精神需要。

三、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建构的实践策略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建构的实践策略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发展的根本遵循。“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13]既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任务，也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有效建构的根本保证。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将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与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教育根本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从立场、内容、方法上加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的建构。

1. 从立场上确保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的阶级性目标指

向要求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党性原则。这是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建构的前提。事实上，“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14]。因此，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建构必须确保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从立场上牢牢把握住“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一方面，坚持党性原则，核心就是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党的政治立场，坚定“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做好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另一方面，坚定人民立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导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更好地为构筑人民的精神家园提供精神指引，将巩固和维护党的利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相统一。

新时代意识形态斗争形势更加复杂，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渗透力和迷惑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在国内，人们思想意识多元化发展，部分人放弃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认同，淡化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在国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颠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贼心依然不死，利用各种手段对我国渗透“普世价值”等意识形态。因此，在任何时候，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建构一刻都不能放松和削弱。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关键在于坚持党的领导，打造一批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这样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立场任凭国内外错误思潮的波诡云谲而不动摇，马克思主义阵地经受欧风美雨的吹打肆虐而不丢失。只有真正坚守住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认清形形色色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才能顺利推进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开展。因此，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党性原则，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建构的必然要求。

2. 从内容上确保理论与实际相统一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教育，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建构的理论目标。理论是思想中的现实，只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能使抽象的理论变

得鲜活、有效。因此，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的过程建构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内容上确保理论与实际相统一，做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人，解决“培养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其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用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人。切实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进一步整合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和教育的教育。其二，要坚持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要求，体现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坚持以人为本、以育人为中心，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人和说服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然而，社会实践是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做到与时俱进，就需要保持思想政治教育核心内容的稳定性，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境遇的时代性。坚持以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为核心，同时也要努力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触角和辐射范围，以增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为指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融入诸如法律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生态教育等，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全面而充足的思想养分。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建构“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15]，从根本上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建构的理论目标，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生活实践相结合、重大理论问题与社会热点问题相结合、理论武装人与培养人相结合，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尤其要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并将其转化为他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3. 从方法上确保认识与实践相统一

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的实践目标指向，要求立足于实践，在现实生活实践与人的关系

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人的思想行为和精神需求。因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人的存在方式。认识只有和实践相统一，才能转化成指导实践的方法论。因此，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的过程建构，只有从方法上正确认识与现实相符合、相统一，才能破解“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首先，认识和把握教育对象生活精神需求，以服务 and 关切教育对象的实际问题为导向做到“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教育对象。其次，要从人的生活实践出发做好教育引导，找准教育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最后，坚持用全面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教育对象。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对教育对象的某种认识大多只是对处于复杂社会关系中人的某个侧面或属性的能动反映，并且处于动态发展中。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建构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把对教育对象的某种认识与实践绝对等同。总之，思想政治教育在现实性上主要是解决人的精神生活需要矛盾问题，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和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在实践基础上做到认识与实践相统一，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促使人们的思想与行动相一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16]其中，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构成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性方法论。要求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的过程建构必须担负起这个使命任务，从方法论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为目标，关注人民的现实生活问题，采取形式多样的教育方式和载体，不断创新传播手段、拓展传播渠道，既解决人民实际思想认识问题又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问题，既培育时代新人又服务于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大局。

总之，探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建构，从根本上来说是新形势下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不断

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化解社会矛盾、培育时代新人的关键环节。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要更好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任务，努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思想基础；与此同时，针对新时代思想意识领域存在着弱化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也要紧扣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通过提升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化生活中的话语权，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要从根本上以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问题为前提，在育人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

参考文献：

[1]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编写组.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2版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5.

[2]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140.

[3] [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3. 329.

[4] [13] [15] [1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12. 32. 33. 312.

[6] [8] [9] [11] [1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0. 524. 11. 525. 501.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69.

[10] 列宁. 列宁选集：第1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7.

[1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54.

(责任编辑 吴潇剑)

On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Shi Yang

Abstract: As the essential stipul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deology is the fundamental basis to judg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struggle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in the new era is still complex and changeable.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follow the educational logic of “connotation requirement strategy”: understand the theoretical essence, educational task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Marxist ideology, and grasp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ccording to the class nature, theoretical nature and realistic origin of ideology,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should be clarified;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ideological fun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e should unify the leadership of ideological work with the position, content and method, and establish the practical strategy of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New er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arxism; Ideology

中国乐教的美育功能及实践转化

闫若婧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桂林 541000)

摘要: 推进新时代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 美育与传统文化的契合至关重要。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乐教是审美教育的重要载体, 具有独特的审美内涵、审美特质。乐教的美育功能表现为道德内省的审美、身心和谐的调适、人文共生的坚守、科学理性的内化及情感交流的雅尚。新时代, 以立德树人为中心的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实践创新必须注重乐教美育功能的实践转化, 凸显四个基本转化策略: 强化乐教美育核心理念, 构建乐教美育课程范式, 创新乐教美育教学方法和提升乐教美育师资水平。

关键词: 中国乐教; 美育功能; 实践转化; 策略

中图分类号: G40-0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1) 06-0079-07

推进新时代中国教育高质量, 美育与传统文化的契合至关重要, 构建和创新学校乐教美育实践逻辑和行动策略成为应然之举。2020年10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要求“充分挖掘和运用各学科蕴含的体现中华美育精神与民族审美特质的心灵美、礼乐美、语言美、行为美、科学美、秩序美、健康美、勤劳美、艺术美等丰富美育资源”。这就意味着美育是当下和未来学校教育的改革之重, 美育应充分挖掘民族审美资源, 充分体现中华美育精神。这一文件指明了学校美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方向。本文以美育为主旨, 以中国传统文化之乐教为对象, 从内涵与特质对其进行审美释义, 进而探讨中国乐教美育功能及学校乐教美育实践转化的逻辑与策略, 以期助推美育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与改善。

一、美育视域下中国乐教的审美内涵与特质

乐(yuè)教是教育形式的一种, 以音乐的方式和音乐的过程实现人对人的教化涵养。价值追求上, 乐教融“五育”于统一过程, 具有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与劳动教育的综合功能, 使人身、心、情、意和谐发展, 塑造完整人格、丰沛情感、高尚精神与健康体格。中国乐教历史悠久、底蕴深厚, 具有独特的场域类型、实践范式和价值取向, 充分体现中国乐教美育的重要特质。对中华美育精神和民族审美特质的挖掘即在美育视域下对学科资源的审视与提取, 而自古以来在艺术教育中占据突出地位的中国乐教便具有独特而丰富的审美内涵与特质。

收稿日期: 2021-05-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中国民歌育人价值挖掘与教育实践转化研究”(CMA200242)

作者简介: 闫若婧, 女,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美育、民族文化与教育、音乐教育研究。

1. 中国乐教的审美内涵

在中国古代，“乐”是原始宗教施行巫术的媒介，是巫师沟通天人的工具，也是对劳动的记载和赞美。^[1]《吕氏春秋·古乐篇》所提的“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是远古巫术活动中的乐歌。上古时期，乐的表达多与巫术、占卜相关联。从文献记载来看，乐及其应用指向政治、伦理、宗教以至美育等多方面社会功能。^[2]《礼记·乐记》称：“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意为奏、唱音乐并结合舞蹈，称为乐；又说“乐者，通伦理者也”。《中国音乐词典》释义为：乐，古代对音乐及其延伸义的泛称，是诗、乐（音乐）、舞三者结合尚未分立时的称谓。可见乐既是音乐与舞蹈的统合，又是仪式、伦理的审美。

《尚书》有云：“夔！命汝典乐，教胄子”，此为我国乐教或以乐为教的早期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表明乐教主旨在于诗乐合德。西周官学乐教包括“乐德”“乐语”“乐舞”三教。^[3]《礼记·乐记》曰：“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此处，乐教被直接界定为使人快乐的教育，泛指情感教育、感性教育等；《礼记·乐记》又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这表明乐教中美与善的统一是审美境界与道德境界之统合。《论语·八佾》中有“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泰伯》指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礼记·文王世子》记载“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乐与诗、礼并举，乐及其教化使人成长，并养成君子品格。^[4]此乃以乐之教，即“成于乐”之教。无论是君子人格塑造、情感熏陶，还是美、善发育与生长，皆展示出中国传统乐教充沛的美育内涵：对人格的审美要求主张高尚与和谐，养成君子品格；对道德的审美标准强调至善至美，促成道德内省和外化境界；对行为的审美规则重视诗乐合德，养成精神与行动统合；对教化的审美方式推崇诗礼歌舞，实现个体与群体塑造。

中国传统乐教的审美内涵恰好切中当下及

未来我国学校美育之需：一是为学校美育的内涵界定提供了价值参考与体系分类；二是对学校美育的内容与课程模式给出选择借鉴与样态类型；三是对学校美育的教学方法与行动路径呈现案例与模式启发。乐教体现了中华美育精神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能够有力支持学校美育传承与创新。

2. 中国乐教的审美特质

中国乐教在传统文化系统中的突出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多维而深邃的乐教审美特质，以独特的机理实现了对人的审美塑造，彰显了中华传统美育精神和美育文化范式。大致说来，这些特质主要体现为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中国乐教以尊重人、发展人为本。中国传统乐教是面向人、发展人的审美教化过程。其内在教育精神主张“以人为本”，具有深厚的“民本”思想特点，而这源自乐本身的生活与实践品性。中国乐教尊重人的差异性，遵循人的成长规律，由不同人和人的不同成长特征来显示中国乐教实践本身的内在张力。《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此处强调的是孔子乐教内容与形式的丰富性，此为孔子“有教无类”教育思想在乐教中的具体呈现。“一弦一歌”皆为教，以《诗经》、六代乐舞等雅乐为教育内容，其间融合了乐、诗、经之三美的教化功能。与儒家乐教思想有所不同，道家强调乐教的自然体察，《庄子》提出“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李贽提出“发于情性，由乎自然”等，他们都主张以人为本、自然抒情与觉悟，^[5]此为道家学派别具一格的乐教精神。如若说儒家乐教强调人发展的社会性和伦理性，并以乐教引出伦理美与社会美，那么道家所提倡的则在于强调发乎人之自然本性，以生命冲动和本能性情为契机，进而以乐教引出人性美和情感美。

其二，中国乐教寓教于乐，寓美于乐。以乐成教，以乐成美，此为传统乐教的一大特质。换言之，中国传统音乐的源起及其呈现本身即蕴含教化功能，又以美的教化为深层本质。如上所述，此美为伦理美、社会美、自然美、人性美及情感美的融合统一。中国之乐教本为

国传统儒家文明与道家文明合种之果，又由此果转而为因，进一步丰富增进了中国传统教化文明。中国哲学界乃至教育学界常有共识，称中国传统文明为教化文明，特别强调儒家文化具有的教化本性。以孔子为发端，这种教化文明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乐教，正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成于乐”承载诗、礼之造化，而后呈现为人之美的存在，此美之最高境界乃为社会美——儒家视界中的社会美方为大美，其内在深层实质是由乐而发社会之秩序美，又含政治秩序之美感。道家则另起一端，以自然美为乐教圭臬，将“生命教化”寓于诗乐之音，寓于天地之律、韵，凸显人的自然之性与天地大道的和谐美、统一美和内在美。一曲蝉鸣、一缕清风、水滴点石、叶落花谢等皆蕴含美的启示、美的机缘、美的力量。

其三，中国乐教濡化中华美育精神的文化根性。秦汉乐教以乐府一唱三叹的乐歌及歌舞大曲形式的相和歌为主，地方音乐和文士阶层的琴学教育走向兴盛。琴学被纳入汉代乐教体系，《风俗演义》中有“君子常所御者，琴最亲密，不离其身”的记录，琴之“雅乐”，对君子有着独特的情感表达及寄托，具有道德教育与情感教育的双重属性。^[6]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音乐大规模传入中原，融入中国传统音乐，呈现多元融合状态。隋唐时期，音乐空前发展，太常寺增设了梨园和教坊等音乐机构。宋代周敦颐提出“淡而不伤，和而不淫”的乐教主张。张载提出“立人之性”乐教思想，通过音乐恢复善的天地本然之性。程颢提出“朝夕歌之”伴之以舞蹈的乐教形式，激发兴趣。朱熹则强调“志”“义”为乐教之本。明代徐上瀛所著《溪山琴况》提出琴乐教学的“和、静、清、远……”二十四况，有儒道互渗，以“和”况为主论。王阳明《教约》有云：“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表明王阳明重视诵读诗歌的身心准备，强调心气平和的审美效果。回溯中华乐教史，荡气回肠，千回百转，不失的是内在的乐教美育精神及其负载传承的文化根性。这种文化根性便是寓于乐教美育中最为深

沉而坚韧的价值取向，关乎个人、社会、民族、国家与天下，实质是一种人格特质取向，亦即君子人格——一种“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传统人格品质的基本追求。中国乐教正是将此人格特质取向置于价值的根本处，在塑造君子人格的同时，也教化着国民；并将以濡化君子人格特质的乐教文化范式深刻融入儒家文化传统，进一步成就了儒家文化的博大深刻，不断证明着这种文化内在的育人气质。

其四，中国乐教建构独特的美育场域。美育场域源自美育实践，美育实践蕴含美育文化、美育价值和美育精神。中国乐教以中国大地为依托、以中华文明为底色、以中华民族为中心、以中国实践为路径，建构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美育场域，可谓之中国美育场。中国美育场承载并创新中国美育文化与精神，它以中国乐教为基本范式，塑造富有美的精神、灵魂、肉体与行为方式的中国人，内含强大的“以美育人、以美治人、以美化人”的功能特质，具有不可替代性。乐教为当代美育之急需，是美育研究与实践的重要资源。美育及艺术教育的体系建构与质量提升需充分审视、大力提倡并深入挖掘乐教及其审美意义上的育人价值。龚鹏程提出乐教之所涉与所重，一是与礼制相关，二是强调乐的功能。^[7] 杨和平认为：“中华乐教是以礼为本，以乐为体，乐是礼的附庸，是礼乐教育。”祁海文从乐教之乐的历史沿革及形态发展进行考察，认为原始“乐”是集歌、舞、乐混融性艺术形态，因此乐教本质为综合性的艺术。^[8] 谢嘉幸则提出，礼教相当于现代的德育，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9] 凡此所论，说明乐教文化及其蕴含的礼乐精神拥有丰厚的审美意蕴，同时也具有与时代精神契合的审美气质。当前，如何培养具备“文化根性”“中国气质”“艺术精神”“美”的中国青少年，综合提升其人文素养，已成为中国特色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的迫切诉求。中国乐教虽能够有力支持这一美育诉求，但必然依托并致力于现代中国美育场域，而现代中国美育场域的建构又必然要扎根于中国传统乐教美育文化范式及其内

在精神。

二、发展意义上中国乐教的美育功能

美育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情感教育，指向人的审美立美的素质提升、能力发展与情感协调，对于塑造完整的人的生命样态具有重要的意义。席勒在《美育书简》中便充分论证过美对于人的情感调节与改善的重要功能，认为美可改善人的紧张状态或松弛状态，“在紧张的人身上恢复和谐，在松弛的人身上恢复精力，并以此方式按照人的本性使局限状态返回绝对状态，使人成为自身完美的整体”，特别是他称之为“融合性的美”的形式，能够通过情感调节与改善进而使人处于自由的状态。^[10] 乐教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系统教化的美育形态，为当代美育提供了独特的思想与实践范式，具有不可替代的美育功能。

1. 道德内省的审美

审美既是人的意识、道德与能力的最初萌芽，又是人不断成长和内化积淀的最高成果，是人性中最基本而又最开放的部分。^[11] 康德认为美即超功利，它本身就契合人的天性。美育一方面唤起个体优雅在世的身心姿态，另一方面又促成个体的知识学习与道德感知，成为智力和道德品行发展的基础。^[12] 李泽厚在康德“非功利性”的审美特征基础上提出“以美启真”、“以美储善”和“以美立命”。^[13] 可见，礼是对人行为的规范，乐是对人心灵的美化。

《礼记·曲礼下》有云“士无故不撤琴瑟”，朱熹说“养君中和之正性”，这些表达的都是古代文人在修身立业的过程中以古琴抒发情感、涵养德性。古曲《梅花三弄》所奏即梅花傲然风雪、与世无争、自强不息的精神，其作为中华民族高贵人格的代表，被赋予了无尽的精神内涵。《琴操》言：“《猗兰操》者，孔子所作也。”《猗兰操》作为经典的琴曲歌辞，用短短64个字讲述了精擅琴艺的孔子对生未逢时的超然，体现了其高尚的情操。新时代中国乐教的美育功能需基于时代精神和时代需要随之创新、变迁。例如，《经典咏流传》、学校开展的“国

学经典”校本课程、革命歌曲传唱、党史艺术作品及红色经典艺术创作等，均为当代乐教道德内省审美的体现。

2. 身心和谐的调适

“和适”既是乐的审美本质，又是基本法则。《吕氏春秋》提出了“以适听适则和矣”的审美原则，要求以“和适”之心听“和适”之乐。^[14] 《礼记·乐记》中“凡音者，生人心者也”就是从人性的探讨与人性的养成与完善来看待音乐问题，从天人一体、同类相感的思维去研探问题的方式。^[15] 《礼记·学记》记载“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作为一种本真的艺术与精神表达形式，民歌涉及族群中人的的一切活动选择与族群规约，能达到身心和谐、个体归属、言行规矩的调适作用，是个体成长过程中特有的文化场域的有机元素。^[16] 《礼记·乐记》总结说：“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夫歌者，直己而陈德也，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这里刻画了不同素材的乐教与修身对象气质的匹配，表现出因人而异、因乐而异的美育效应和选择法则。从“乐和”、“心和”、“情和”到“政和”，“和合”思想在当代学校美育中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17] 乐教发自内心，塑造人性，调适身心，趋向和谐。这对于处在激烈竞争中且日趋走向“内卷化”的当代青少年健康成长具有独特的育人价值。

3. 人文共生的坚守

《庄子·天道》云：“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宗大本，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面临的首要问题，关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尤其在科技文明日趋发达的当代社会，人类越来越疏离自然，进而遗失了自然，失去了与自然的连接纽带，更失去了感受自然之美和表达自然之美的能力。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美学家、教育家形成了丰富而趋同的人与自然

相统一、天人合一的思想，而这一点表现最充分的价值形态和符号形式即乐教。

秋高气爽，渚清沙白，天高云淡，人景合一。古曲《平沙落雁》呈现了自然中的雁落平沙之独立观景，又在自然之中融为一体地表达出了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即追求天人合一。以中国古典音乐涵养、净化内心，升华境界，天人合一，成就人的高雅、和静、超然、洒脱，即天人合一之美。中国乐教不仅是中国人对生命个体的一种表达，还是一种对人与人的共生、人与社会的共生、人与自然万物的共生的教化。由乐之和到人之和、家国之和，进而提升为事物之本和天地法则，即合和共生之乐教，同时也是一种美的理想境界即共生之美。

4. 科学理性的内化

影响深远的中国古代“六艺”教育涵盖“礼”“乐”“射”“御”“书”“数”等方面，融合了理性教育、道德德育、艺术教育和美育。李泽厚认为儒家将原始文化纳入实践理性的统辖之下，^[18]由巫到礼，释礼归仁。中国美学主张情与理的统一。西周音乐机构大司乐以采诗来“知天下”。王国维认为，孔子教人“始于美育，终于美育”；除了采用诗教和乐教外，“尤使人玩天然之美”，以“涵养其审美之情”。他把孔子率弟子在大自然中吟咏悟道的景象与境界比作叔本华的“无欲之我”、席勒的“美丽之心”，还用席勒的“在法则中获得自由”的观点来阐释孔子的“安而行之”。^[19]这从另外的角度诠释了乐教的理性教养应用。乐教呈现了人对关系的认知、对运动的理解、对自然的敬畏、对规律的探求，是别样的科学理性内化，是科学与人文、感性与理性的融合。

5. 情感交流的雅尚

尚美是一种精神性的非功利性愉悦，集中地体现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情感表达。“成于乐”之意义在于：通过情感的浸润与渗透，以乐的审美体悟养成审美能力，塑造高雅人格，由乐而入，达成性灵深处的快乐。^[20]如果将美界定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实践活动及其结果”，作为审美主体的学生将在此活动中体验到只有乐赋吟唱之艺术美才可能带

来的“自我确证感与和谐愉悦感”，进而“感受到身心、人已、天人之和谐，从而获得自我确认的强烈美感。帮助学生确认自己在做美妙的事，这正是美育的追求”。^[21]在乐教传统体系里，民间歌谣颇具代表性，可以让人充分体验到美感。“韵文之兴，当以民间歌谣为最先。歌谣是不会做诗的人将自己一瞬间的情感，用极简短极自然的音节表现出来，因为这种天籁与人类好美性最相契合，所以，好的歌谣能令人人传诵，历千年不废。其感人之深，有时还驾专门诗家之上。”^[22]出自情感表达的需要，才有作为乐教样本的民间歌谣等艺术类型的开创和推广，并由此而产生追求情感高雅与艺术加工优美的良性互动。乐教面对人发展过程中最为复杂紧要的情感生成与交流，主张人的情感至真至纯，主张人追求情感的唯美境界，提出人情感表达的高雅方式是情感教育不可或缺的功能介质。

三、实践逻辑中学校乐教美育的行动策略

学校美育的难点在于基于实践逻辑的行动策略的设计与实施，而实践逻辑的基本关切在于理念、课程、方法与师资的系统设计。作为一种弥足珍贵的传统美育资源，中国乐教如何进入学校，应为探究之要。

1. 强化乐教美育核心理念

基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五育”并举、融合育人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新时代背景之下，需要将“立美育人”作为中国乐教实现当代实践转化的核心理念，充分彰显音乐教育的独特意义，即通过特殊的感知刺激与记忆表达方式使人们在清晰、宽广、生动的符号基础上能够找寻到超越本体的情感色彩、心灵体验和文化意义。通过乐教实施美育，不仅有助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也是培养学生坚守中华民族意识、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方式。为此，学校教育实践者需要充分认识中国乐教的美育价值与功能以及文化意义，把乐教作为美育的主要内容与路径，并以此建构相应的教

育应用体系。

2. 构建乐教美育课程范式

借助乐教实施美育应建构相应的课程范式。一是在价值目标上，将“立美育人”以及实现中国乐教的审美价值作为课程建设的基本目标。二是在内容体系上，选取乐教的内容体系，从丰富的乐教素材中依据其特征与价值撷取符合时代与现代学校教育目标内容，形成合理的课程内容结构。三是在学习空间上，进行基于美育目标并体现乐教特征的学习空间设计。在这方面乐教有其特殊的学习空间要求。为此，对学习空间的设计要符合乐教开展的文化品质。四是在学习方式上，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方式选择。乐教的学习有鉴赏、吟唱、歌舞、对话、现场体验等多种学习方式，要以美的方式去学习、创作、实践、生活。基于中国乐教课程文化应支持这样的学习方式应用。

3. 创新乐教美育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指向教育目标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元素安排，往往表现为教学目标与教学过程的选择与设计。乐教是尚美立美的教育，其首要的教学安排是尚美的过程、立美的条件。“立美的成果是审美的依据，审美的能力是立美的条件。在立美的创造中，贯穿着审美意识的作用，并获得审美的愉悦。在审美过程中，亦渗透着立美的影响，主体在美的形式的欣赏中，会不知不觉地按照美的规律构建自己，并逐步达到自觉与自由的境界。”^[23]而这一关系实践必须唤醒和强化学习者的生活审美体验，“美育只有生活化，才能够把高尚的、崇高的、伟大的文化精髓传承下去，才能把中国文化回归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因此，让生活美育化，就是要通过不断改进美育教学，让广大青少年在生活中体验到美、体现出美、创造出美，美育生活化、生活美育化，是国家、民族未来人力资本建设和综合素质培养的重要内容”^[24]。由此可见，乐教美育的教学模式应主张经典教化与生活陶染，二者的合理结构与有机衔接应成为教学模式建构的核心取向，乐教的美育方式与教学过程应把充分解析经典载体与契合学生生活理解紧密结合，实现美育艺术化、生活化。为此，体现

中国乐教和美育衔接的教学机制，包括多样化的教学范式及具体的教学方式的变革，将成为未来中国乐教美育功能实践路径的基本探索方向。

4. 提升乐教美育师资水平

借助于乐教，实现美育目标，涵养美育精神，以美立德，以美启智，以美修身，以美导行，用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沉淀文化自信，开拓文化创新，充分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之美。但是这一切美育目标的实现，必须有优秀的师资队伍支持。乐教美育的特质与功能对师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如对中国古典音乐、舞蹈、仪式文化的通晓，对乐教内容的现代化改造，对乐教生活化的加工等。自然，乐教美育的师资培养便成为前提和基础。现在看来，具有乐教美育意识和能力的师资匮乏，是制约中国乐教美育功能及其实践转化的瓶颈，亟待系统破解。

参考文献：

- [1] 刘天怡. “乐”的词义演进与中华乐教精神之嬗变 [D]. 武汉：武汉大学，2018.
- [2] [3] 祁海文. 论中国古代美育思想的起源与产生 [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51-58.
- [4] 丁旭东，谢嘉幸. 论中华传统乐教与齐家之道 [J]. 中国音乐学，2016（1）：108-113.
- [5] 蔡仲德. 中国音乐美学史 [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11.
- [6] 修海林. 中国古代音乐教育 [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69.
- [7] 龚鹏程. 中华乐教百年回首 [J]. 关东学刊，2019（5）：137-146.
- [8] 丁旭东. 中华传统乐教观——首届乐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J]. 中国音乐，2015（2）：45-50，208.
- [9] 李玲，谢嘉幸. 延续还是交融？传统乐教在新加坡研究述评与反思 [J]. 中国音乐，2020（2）：88-97.

- [10] 席勒. 美育书简 [M]. 徐恒醇,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23-124.
- [11] [13] 李泽厚. 人类学历史本体论 [M].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6: 489.
- [12] 刘铁芳. 审美教育与教育之美 [J]. 教育发展研究, 2017 (8): 3.
- [14] 祁海文. 《吕氏春秋》的乐论问题 [J]. 社会科学辑刊, 2015 (1): 149-155.
- [15] 袁济喜, 黑磊磊. 《乐记》与古代礼乐文明 [J].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1): 20-27.
- [16] 闫若楠. 民歌的文化品性及教育功能 [J]. 当代教育与文化, 2020 (2): 43-47.
- [17] 张业茂, 钱勇. “以乐教和”的价值内涵——古代中国音乐教育价值观探析 [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1 (3): 47-52.
- [18] 李泽厚. 美的历程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52.
- [19] 杜卫. 王国维与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 (1): 169-179, 209.
- [20] 王琴. 从乐教源流看儒家德育思想 [J]. 现代大学教育, 2011 (3): 89-93, 113.
- [21] 鞠玉翠. 基于真实情境问题的评价何以促进五育融合 [J]. 中国电化教育, 2021 (1): 14-19.
- [22] 梁启超. 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 [M]. 上海: 东方出版社, 1996: 445.
- [23] 修海林, 罗小平. 音乐美学通论 [M]. 上海: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2: 9.
- [24] 许洪帅. 让每个孩子的心里都有音乐——全国“音乐课堂变革与学校美育高质量发展”研讨会综述 [J]. 中国音乐教育, 2019 (9): 45-49.

(责任编辑 吴潇剑)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Function and Practic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Music Education

Yan Ruonan

Abstract: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combin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s very important. As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music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aesthetic education, with unique aesthetic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The aesthetic function of music education is reflected in the aesthetic of moral introspection, the adjustment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armony, the persistence of humanistic symbiosis, the internalization of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nd the elegance of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practice innovation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school education center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people in virtu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pract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function of music education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highlight four basic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strengthening the core concept of music education, constructing the curriculum paradigm of music education, innovating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improving the teaching level of music education.

Key words: Chinese music educ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function; Practice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结构的变化与分析

——基于 2009—2019 年教育统计数据

杨振芳

(厦门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01)

摘要: 从区域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角度, 以国家统计局与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公布的 2009—2019 年教育统计数据为分析对象, 对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结构进行研究, 结果发现: 2009—2019 年, 我国高等教育落后地区的高等教育规模得到了较快发展, 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结构整体上得到了优化, 区域人口数量对区域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而区域经济的影响力则逐渐减弱; 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区域布局失衡问题仍然存在, 高层次人才培养仍然不足。在未来, 可通过继续向高等教育发展落后区域实施倾斜政策、创新“双一流”高校认定标准、构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联盟、适度扩大研究生规模促进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关键词: 教育结构; 优化布局; 布局结构; 高等教育; 均衡发展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1) 06-0086-10

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结构优化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中指出“教育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 城乡、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 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滞后”, 并提出“到 2020 年, 高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也明确指出要“调整优化高校区域布局”。^[1] 谢永飞等人的研究发现, 1991—2007 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布局明显好于 1949—1991 年。^[2] 李硕豪等人的研究则发现, 1998—2009 年, 我国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逐步得到优化, 布局结构呈现外部均衡、内部非均衡, 整体均衡、区域非均衡的现状, 区域人口逐渐成为影响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关键性因素。^[3] 本研究基于 2009—2019

年国家统计局与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公布的教育统计数据探究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在最近十年中的变化, 以期为下一阶段的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结构优化提供参考。

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结构指的是高等教育各要素在不同区域分布的情况及其与政治、经济、人口、文化等的关系。^[4] 有学者认为, 在进行高等教育区域划分时, 应以经济区域分异为主导。^[5]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将我国大陆划分为八大经济区域: 东北地区 (黑、辽、吉)、北部沿海地区 (京、津、冀、鲁)、东部沿海地区 (沪、苏、浙)、南部沿海地区 (闽、粤、琼)、黄河中游地区 (陕、晋、豫、蒙)、长江中游地区 (鄂、湘、赣、皖)、西南地区 (滇、黔、川、渝、桂)、西北地区 (甘、青、宁、藏、新)。^[6] 李硕豪等人

收稿日期: 2021-05-18

作者简介: 杨振芳, 女,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教师教育、创新创业教育、高等教育研究。

在对我国 1998—2009 年的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进行研究时就采用了八大经济区域的划分方式。^[7]为更好地与已有研究呼应与对话,本研究也采用八大经济区域的划分方式对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结构进行研究。

一、2009—2019 年我国区域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量与学生数量结构变化与分析

1. 区域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量结构的变化与分析

从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可知(见表 1),2009—2019 年,从增加量看,我国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量增加最多的是西南地区,其次是黄河中游地区;增加量最少的是东北地区,其次是东部沿海地区。从增长率看,我国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量增长最快的是西北地区,区域内的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增长率分别为 16.67%、25.64%、33.33%、26.67%、45.96%;其次是西南地区,区域内的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的增长率分别为 14.71%、30.0%、36.96%、53.19%、32.79%;再次是黄河中游地区,区域内的山西、内蒙古、河南、陕西的增长率分别为 15.49%、29.27%、42.42%、6.74%;南部沿海地区的增长率则稍大于全国整

体的增长率(16.62%),该区域内的福建、广东和海南的增长率分别为 7.14%、23.2%、17.65%;而东北地区、北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与长江中游地区的增长率则小于全国整体的增长率。从各区域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占全国的比重的增长百分点看,增长最快的是西南地区,其次是黄河中游地区,再次是西北地区,南部沿海地区的占比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而东北地区、北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与长江中游地区的占比均有下降,其中下降最多的是长江中游地区,其次是东部沿海地区。综上可见,2009—2019 年,八大经济区高等教育学校(机构)的数量增长是不均衡的,总体上呈现西南、西北、黄河中游地区快,东北、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地区慢,长江中游、南部沿海地区速度居中的趋势。此外,从八大经济区域高等教育学校(机构)占全国的比来看,2019 年的比例在 5.25%到 17.37%之间,而 2009 年在 4.6%到 18.48%之间,可见,2019 年我国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量在八大经济区域的分布比 2009 年更加均匀。

中西部地区长期以来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欠发达地区,为推进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国家从政策、经济等方面持续给予了倾斜、支持。例如,2013 年教育部颁布的《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 年)》明确指出:

表 1 2009 年和 2019 年分地区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量变动情况

地区	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所)				占全国的比		
	2009 年	2019 年	增加量	增长率(%)	2009 年	2019 年	增长百分点
合计	2305	2688	383	16.62	100	100	
东北地区	240	258	18	7.50	10.41	9.60	-0.81
北部沿海地区	376	417	41	10.90	16.31	15.51	-0.80
东部沿海地区	313	339	26	8.31	13.58	12.61	-0.97
南部沿海地区	226	264	38	16.81	9.80	9.82	0.02
黄河中游地区	300	371	71	23.67	13.02	13.80	0.78
长江中游地区	426	467	41	9.62	18.48	17.37	-1.11
西南地区	318	422	104	32.70	13.80	15.70	1.90
西北地区	106	141	35	33.02	4.60	5.25	0.65

注: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

“教育部在高等学校设置工作中，对中西部地区实行单列审批，推动区域内高等教育协调发展”。该计划无疑有助于促进中西部地区高校规模的增长。此外，2009—2019年，我国不仅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并且于2013年开启了“一带一路”建设，其中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均属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覆盖范围。西部大开发与“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促进了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区域内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提供了经济支持，经济的发展还扩大了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从而使这两大区域的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量得到大幅度的增长。而且，西南地区、西北地区、黄河中游地区是我国高等教育相对落后的地区，因此，要推动高等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在进行布局调整时必然要向这些地区倾斜。

2. 区域高等教育学校（机构）在校生数量结构的变化与分析

从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可知（见表2），八大区域中，高等教育学校（机构）在校生数量增长率最大的是西南地区，增长率高达89.80%；其次是西北地区；此外，南部沿海地区与黄河中游地区的增长率也高于全国总体的增长率（41.35%）。其他地区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这些地区的在校生数占全国在校生数的比重都有所下降，其中下降最多的是东部沿海地区。从

表2也可知，2009—2019年，八大经济区高等教育学校（机构）在校生的数量增长是不均衡的，总体上呈现西南、西北、黄河中游、南部沿海地区快，东北、北部沿海、东部沿海、长江中游地区慢的趋势，该变化趋势与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量增长的趋势基本一致。与李硕豪等人的研究结果对比发现，2009—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学校（机构）在校生数虽然也有大幅度的增长，但与1998—2009年相比，其增长率大大降低了。^[8]

高等教育学校（机构）在校生数的增长与高等教育学校（机构）的规模、家庭高等教育的支付能力、学龄入学人口的数量及入学意愿密切相关。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量的进一步增加以及经济的持续发展，家庭的高等教育支付能力也随之提升，高等教育学校（机构）在校生数势必会随之增加。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随着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区域内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这必然会提高两大区域的高等教育支付能力。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对高水平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这也会增强区域内学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从而促进这两大区域内在校生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同时，西南地区还是我国人口占比较大的区域，这意味着区域内有大量的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在多种

表2 2009年和2019年分地区高等教育学校（机构）在校生数（本科和专科）

地区	高等教育学校（机构）在校生数量（万）			占全国的比重		
	2009年	2019年	增长率（%）	2009年	2019年	增长百分点
合计	2144.67	3031.52	41.35	100	100	
东北地区	209.24	251.94	20.41	9.76	8.31	-1.45
北部沿海地区	364.62	479.88	31.61	17.00	15.83	-1.17
东部沿海地区	303.27	347.54	14.60	14.14	11.46	-2.68
南部沿海地区	208.25	312.26	49.94	9.71	10.30	0.59
黄河中游地区	316.18	471.57	49.15	14.74	15.56	0.82
长江中游地区	393.72	528.41	34.21	18.36	17.43	-0.93
西南地区	274.11	520.27	89.80	12.78	17.16	4.38
西北地区	75.28	119.65	58.94	3.51	3.95	0.44

注：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

因素共同作用下，西南地区的高等教育学校（机构）在校生数量得到了快速增长。

3. 2009—2019年区域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量与区域人口发展的相关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人口因素是影响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9]采用斯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法将各区域的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量、人口数量、在校生数量、每十万人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量进行两两相关分析，可知区域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量与区域人口数量间存在极显著的正相关，区域在校生数量与区域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量、区域人口数量间也存在极显著的正相关，但区域每十万人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与区域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量、区域人口数量、区域在校生数量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见表3）。这一结果与李硕豪等人和文雯等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上述结果表明，区域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量与区域在校生数量受区域人口数量的影响明显大于区域每十万人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受区域人口数量的影响，而区域每十万人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与区域人口数量间的关系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各区域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各区域的教育投资不均衡所致。

区域人口规模大不仅意味着该区域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多，也意味着该区域的高等教育需求大。随着我国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随之增加，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人们的普遍需求，并且随着我国高校录取率的持续提升，这种需求也能得到很好地

满足，这必然会增强人口因素对高等教育规模的影响力度。此外，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高职院校在2019年要扩招100万人。这一政策的提出无疑会进一步增强人口因素对高等教育规模的影响。

4. 2009—2019年区域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量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分析

有研究认为经济因素是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10]采用斯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法将各区域的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量、在校生数量、每十万人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量、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财政税收收入进行两两相关分析，可知各区域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量、在校生数量、每十万人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量与区域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财政税收收入间的相关并不显著（见表4）。但采用斯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法将2009—2019年的全国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量与全国生产总值进行相关分析则发现，二者间的相关系数为0.989，并且在0.001水平上显著。综合上述分析可知，整体上我国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量增长与全国生产总值的增长仍具有很好的适应性，但在2019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结构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已经大大降低。这一结果与文雯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文雯等人发现，2011—2019年，我国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间的关系不断减弱，地方经济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影响不再显著。^[11]而韩梦洁对美国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却发现，1995—2015年，美国

表3 2019年各区域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量、在校生数量等与人口数量间的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区域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量	区域人口数量	区域在校生数量	区域每十万人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
区域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量	1			
区域人口数量	0.955***	1		
区域在校生数量	0.979***	0.982***	1	
区域每十万人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	0.647	0.628	0.656	1

注：***代表在0.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4 2019年各区域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量、在校生数量等与经济相关因素间的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区域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	区域在校生数量	区域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	区域生产总值	区域人均生产总值	区域财政税收收入
区域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	1					
区域在校生数量	0.979***	1				
区域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	0.647	0.656	1			
区域生产总值	0.646	0.616	0.164	1		
区域人均生产总值	0.345	0.310	0.385	0.761*		
区域财政税收收入	0.407	0.360	0.046	0.936**	0.844**	1

注: *代表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代表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代表在0.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5 2013年和2019年各区域本科学校与专科学校数量变动情况

	本科学校		专科学校		本科与专科比例	
	增长率	占全国比例 增长百分点	增长率	占全国比例 增长百分点	2009	2019
合计	8.12		7.72		0.89	0.89
东北地区	2.19	-0.64	1.72	-0.49	1.18	1.19
北部沿海地区	8.02	-0.02	-0.5	-1.1	1.12	1.22
东部沿海地区	5.42	-0.36	2.5	-0.59	1.04	1.07
南部沿海地区	18.75	0.8	2.74	-0.51	0.66	0.76
黄河中游地区	10.81	0.31	4.55	-0.44	0.75	0.79
长江中游地区	6.60	-0.32	3.91	-0.69	0.78	0.79
西南地区	11.32	0.4	25.0	2.38	0.81	0.72
西北地区	3.7	-0.19	41.67	1.43	0.90	0.66

注: 1. 数据来自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的教育统计数据; 2. 无法采集到2009年各区域的本科学校与专科学校数量

各州人口规模、财政支持、经济收入始终对美国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产生重要影响。^[12] 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在2009年后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关注质量提升的内涵式发展时期,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逻辑与范式开始发生转型, 从大众化初期基于经济因素来追求高等教育发展的效率转向基于经济因素来追求高等教育发展的质量, 从而使得经济因素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影响力降低。此外, 相较于美国, 我国高等教育的

发展受政府干预的程度更大, 在这一时期, 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与满足人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政府调控高等教育布局的重点, 这也会导致经济因素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影响力降低。

二、区域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变化与分析

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主要是指不同程度和要求的高等教育的构成状态, 主要表现为高等

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三个层次。^[13]将 2013 年和 2019 年各区域本科学校与专科学校数量变动情况整理为表 5, 可知本科学校数量的增长率比专科学校数量的增长率高 0.4 个百分点, 但二者比例几乎保持不变。从各区域看, 本科学校增长率最高的是南部沿海地区, 其次是西南地区; 专科学校增长率最高的是西北地区, 其次是西南地区, 北部沿海地区为负增长; 东北地区、北部沿海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本科学校数量与专科学校数量之比不管是在 2013 年还是 2019 年均大于 1, 而其他五个区域则仍然小于 1; 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的本科学校数量与专科学校数量比例在 2019 年均下降了, 而其他区域则均有所上升。

各区域本科、专科与研究生在校生数量变化情况整理见表 6。与 2009 年相比, 八大区域中, 2019 年本科在校生增长率最高的是西南地区, 其次是黄河中游地区; 专科在校生增长率最高的也是西南地区, 其次则是西北地区; 从本科与专科在校生的比例看, 除了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的比例有所下降外, 其他地区的比例都有所增加, 其中增加最大的是黄河中游地区。

虽然各区域研究生的在校生数量均有大幅度的增长, 但各区域占全国的比重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从高等教育层次发展指数看, 八大区域中除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指数有微小提升外, 其他七大区域的发展指数都下降了。可见,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国各区域的高等教育发展层次不仅没有提升, 反而下降了。综上, 2019 年, 我国研究生教育、本科生教育与专科生教育间的比重仍不合理, 高层次人才培养仍然远远不足。

本研究认为, 近十年来, 我国各区域的高等教育发展层次不升反降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一是研究生教育属于更高层次的教育, 其所需要的师资、教学条件等要求都比本科与专科教育要高, 这使得研究生教育学校(机构)的数量增长速度会远远小于本科学校与专科学校的增长。本研究发现, 与 2009 年相比, 虽然 2019 年我国研究生培养学校(机构)、本科学校与专科学校的数量都有所增长, 专科学校数量的增长率为 17.12%, 本科为 16.06%, 但研究生培养学校(机构)数量的增长率仅为 4.02%。二是进入 2010 年后, 我国研究生教育进入稳步发

表 6 各区域本科、专科、研究生在校生数量变化情况

	本科在校生				专科在校生				研究生在校生				本科与专科比例		2013 年高等教育层次发展指数	2019 年高等教育层次发展指数
	增长率(2009—2019)	2009 年占全国比重	2019 年占全国比重	占全国比例增长百分点	增长率(2009—2019)	2009 年占全国比重	2019 年占全国比重	占全国比例增长百分点	增长率(2013—2019)	2013 年占全国比重	2019 年占全国比重	占全国比例增长百分点	2009	2019		
合计	48.39				32.75				0.46				1.22	1.37	0.84	0.81
东北地区	21.93	12.04	9.89	-2.15	17.16	6.96	6.15	-0.81	0.29	0.12	0.1	-0.02	2.12	2.20	0.9	0.86
北部沿海地区	42.06	16.78	16.06	-0.72	19.22	17.27	15.51	-1.76	0.44	0.24	0.24	0	1.19	1.42	0.87	0.86
东部沿海地区	24.56	14.75	12.38	-2.37	1.18	13.40	10.21	-3.19	0.52	0.19	0.19	0	1.35	1.66	0.88	0.89
南部沿海地区	59.50	9.55	10.26	0.71	38.69	9.91	10.35	0.44	0.51	0.07	0.07	0	1.18	1.36	0.8	0.79
黄河中游地区	69.93	13.32	15.26	1.94	28.60	16.48	15.96	-0.52	0.48	0.1	0.1	0	0.99	1.31	0.81	0.78
长江中游地区	45.40	16.85	16.61	-0.24	22.80	20.21	18.68	-1.53	0.51	0.14	0.15	0.01	1.02	1.21	0.81	0.78
西南地区	82.21	12.93	15.87	2.94	99.49	12.59	18.93	6.34	0.46	0.12	0.12	0	1.26	1.15	0.81	0.76
西北地区	47.74	3.79	3.77	-0.02	75.31	3.17	4.19	1.02	0.54	0.03	0.03	0	1.46	1.23	0.83	0.79

注: 1.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 2. 无法采集到 2009 年各区域的研究生在校生数量

展、提升质量的阶段,^[14]这一时期研究生招生政策的导向是“注重创新,提高质量”,^[15]因此,各研究生招生单位开始放慢招生速度,转向注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三是近十年各区域,尤其是西南地区、黄河中游地区、南部沿海地区的本科与专科在校生数量均有大幅度的增长,其增长率远大于研究生在校生的增长率,并且各区域的本科与专科在校生基数远远大于研究生在校生的基数,在大基数与高增长率的双重作用下,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生在校生占所有在校生的比重必然会逐渐下降,从而导致高等教育发展层次指数的下降。

三、区域高等教育高水平学校数量布局结构的变化与分析

高水平学校数量的多寡是衡量高等教育质量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将“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与“双一流”建设高校按区域进行整理为表7。从表7可知,不管是“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还是“双一流”建设高校,数量最多的都是北部沿海地区,其次是东部沿海地区,再次是长江中游地区。这三个区域的“985工程”高校数量占全国的比重为

64.10%，“211工程”高校数量占全国的比重为59.82%，“985工程”高校和“211工程”高校占全国的比重为60.93%，“双一流”建设高校占全国的比重为65.26%，“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和“双一流”建设高校占全国的比重为62.15%。可见，我国的高水平大学集中分布于这三个区域，并且在“双一流”大学建设战略启动后，这种集中趋势更加明显，尤其是北部沿海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这两个区域的“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和“双一流”建设高校就占了全国的一半，其他区域的占比均不足10%，尤其是西北地区，占全国的比重仅为4.51%，南部沿海地区的占比也只有6.25%。可见，我国高水平大学的区域分布是非常不均衡的，并且这种不均衡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扩大了。北部沿海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是我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这为这两大区域内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外部环境，使得这两个区域的高等教育发展能够保持收益递增，而高等教育的发展又会给这两个区域带来所需要的人才，进而促进经济发展，使得区域内的高等教育发展获得一种积累优势。此外，这也是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路径依赖所导致的结果。有学者研究发现，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

表7 区域高等教育高水平学校数量变化情况

地区	“985工程”高校		“211工程”高校		“985工程”高校和“211工程”高校占全国比重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占全国比重	“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与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占全国比重
	数量	占全国比重	数量	占全国比重		数量	占全国比重	数量	占全国比重		
合计	39		112			42		95			
东北地区	4	10.26	11	9.82	9.93	4	9.52	7	7.37	8.03	9.03
北部沿海地区	12	30.77	30	26.79	27.81	12	28.57	28	29.47	29.2	28.47
东部沿海地区	7	17.95	22	19.64	19.21	7	16.67	25	26.32	23.36	21.18
南部沿海地区	3	7.69	7	6.25	6.62	3	7.14	5	5.26	5.84	6.25
黄河中游地区	3	7.69	11	9.82	9.27	4	9.52	8	8.42	8.76	9.03
长江中游地区	6	15.38	15	13.39	13.91	6	14.29	9	9.47	10.95	12.5
西南地区	3	7.69	10	8.93	8.61	4	9.52	9	9.47	9.49	9.03
西北地区	1	2.56	6	5.36	4.64	2	4.76	4	4.21	4.38	4.51

注：数据来自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的教育统计数据

源的省域布局政策一直没能突破原有制度的壁垒，这导致了“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与“985工程”高校和“211工程”高校名单有着极强的接续性与一致性。^[16]

四、基本结论与研究建议

1. 基本结论

第一，2009—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结构整体得到了进一步优化，整体布局结构进一步趋向合理，各个地区的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量、在校生数量都有明显提升，但八大经济区的增长是不均衡的，总体上呈现西南、西北、黄河中游、南部沿海地区快，东北、北部沿海、东部沿海、长江中游地区慢的趋势，并且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结构内部不均衡的状态仍然存在。与2009年相比，2019年的研究生、本科与专科在校生数量都有了大幅度提升，但研究生教育、本科生教育与专科生教育间的比重仍不合理，高层次人才培养仍然远远不足。

第二，高等教育的“马太效应”有增无减。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仍然集中于北部沿海、东部沿海与长江中游这三个地区，并且这种集中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增强了。此外，高水平大学仍然集中于北部沿海、东部沿海、长江中游这三个地区，并且在“双一流”大学建设战略启动后，这种集中趋势更加明显，尤其是北部沿海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高水平大学数量占全国的比重进一步增加，而黄河中游地区、南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高水平大学的占比则进一步下降，西北地区仍然占比最小。

第三，人口因素成为影响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结构的关键性因素，经济因素对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影响进一步减弱。李硕豪等人的研究发现，在2009年，我国的区域高校数与区域人口数间的相关系数为0.866，区域高校数与区域生产总值间的相关系数为0.857，且均在0.001水平上显著。^[17]而本研究发现，在2019年，我国的区域高校数与区域人口数间的相关系数为0.955，且在0.001水平上显著，而区域高校数与区域生产总值间的相关系数下降为0.646，且显

著性为0.083。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因素对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了，但经济因素的影响已大大减弱。

2. 研究建议

第一，继续向高等教育发展落后区域实施倾斜政策。在《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颁布后，我国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与黄河中游地区等高等教育欠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规模得到了较快发展，这说明政策倾斜的有效性。虽然这些区域的高等教育规模得到了发展，但这些区域的高等教育质量和发展水平与其他区域还存在很大差距。在进入小康社会后，人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从量转向质。在未来发展中，国家应继续通过政策倾斜，尤其是在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上给予倾斜，继续发挥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加大对这些区域中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投入与培育，来促进这些区域高等教育的质量发展。

第二，创新“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认定标准，建立分类认定、分类评估标准，破解原来的制度壁垒。虽然我国的“双一流”高校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第一轮“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名单可知，“双一流”建设仍未能有效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区域布局失衡的问题。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对原有认定标准进行反思。有学者指出，目前我国“双一流”建设评价标准的价值取向是“绩效”，^[18]在这种价值取向，率先占有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在认定中必然会继续保持优势，而高等教育落后区域则会继续处于劣势。此外，目前的一流大学大多是研究型的综合大学。潘懋元先生指出，对于国家发展而言，不仅需要学术型人才，也需要应用型人才，我国发展要超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大力发展地方应用型高校，因此，各个类型、各个层次的高等教育都应该有其一流大学、一流学科。^[19]因此，为解决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区域布局失衡问题，有必要创新“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认定标准，建立分类认定、分类评估标准。

第三，构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联盟，促进区域内高等教育布局的优化。虽然我国高等教

育的整体布局得到了进一步优化,但区域内部不均衡的状态仍然存在,几乎每个区域内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例如,在北部沿海地区,河北的高等教育明显落后于北京、天津、山东等,南部沿海地区的海南省也明显落后于广东、福建。未来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优化不仅要进一步促进不同区域间的结构优化,也需要推进区域内部的结构优化,而联盟化则是解决区域内部结构失衡的一个可选择路径。

第四,在保障质量的基础上,基于各区域的产业结构特点、经济发展水平等适度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研究生教育是高科技人才的主要来源之一,已有研究表明,硕士生教育对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有显著提升作用,但本专科教育的作用不显著。^[20]虽然我国的研究生规模已达世界第一,但最近十年,我国高等教育层次发展指数却在缓慢下降,这与我国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求不匹配。因此,在未来发展中,应该在保障质量的基础上,适度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

参考文献:

- [1] 中国政府网. 习近平出席全国教育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EB/OL]. (2018-09-10) [2021-05-11]. http://www.gov.cn/xinwen/2018-09/10/content_5320835.htm.
- [2] 谢永飞, 黄蛟灵. 高等教育布局与区域发展研究——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布局的分析 [J]. 现代教育管理, 2011 (3): 26-28.
- [3] [7] [8] 李硕豪, 魏昌廷. 我国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分析——基于1998—2009年的数据 [J]. 教育发展研究, 2011 (3): 8-13.
- [4] [11] 文雯, 周京博. 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结构影响机制研究 [J]. 高等教育研究, 2019 (10): 29-35, 45.
- [5] 赵文华. 高等教育系统论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263.

[6] 黄贤凤, 武博, 王建华. 中国八大经济区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J]. 中国科技论坛, 2013 (8): 90-97.

[9] 梁志, 曾冬梅. 从经济和人口的区域分布看我国高等教育的布局调整 [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5): 50-57.

[10] 刘国瑞. 我国高等教育空间布局的演进特征与发展趋势 [J]. 高等教育研究, 2019 (9): 1-9.

[12] 韩梦洁. 美国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历史变迁、现实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J]. 高等教育研究, 2019 (2): 95-102.

[13] 潘懋元. 高等教育学 [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3: 58.

[14] 刘宁宁, 唐玉光. 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区域差异研究 [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17 (4): 1-7.

[15] 张凌云, 吴天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招生政策的演进历程与特征分析 [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9 (11): 7-10.

[16] 徐晓飒, 宋伟. 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省域布局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J]. 教育发展研究, 2019 (Z1): 6-13.

[17] 李硕豪, 魏昌廷. 我国高等教育布局与区域经济相关性研究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0 (12): 28-33.

[18] 孙锦涛, 李莎. 是“绩效”还是“效能”——中国“双一流”建设评价标准的价值取向研究 [J]. 现代教育管理, 2020 (10): 18-28.

[19] 潘懋元. 建设一流本科 全面统筹推进 [J]. 中国大学教学, 2016 (6): 4-5.

[20] 李锋亮, 王瑜琪. 研究生教育规模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与本专科教育规模的比较分析 [J]. 中国高教研究, 2021 (3): 75-81.

(责任编辑 吴满剑)

The Change and Analysis of Regional Distribution Struc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Educational Statistics from 2009 to 2019

Yang Zhenfang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allo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resourc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ducation statistics from 2009 to 2019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and the development planning department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rough studying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struc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2009 to 2019, the scal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s backward areas of higher education has been developed rapidly, the regional layout struc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has been optimized as a whole,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population on the expansion of regional higher education scale is increasing, while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economy is gradually weakening, however, the imbalance of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high-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resources still exist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high-level talents is still insufficient. In the future, we can further optimize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struc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by continuing to implement preferential policies to the backward areas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novating the accreditation standards of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building regional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alliance, and moderately expanding the scale of graduate students.

Key words: Education structure; Optimized layout; Layout structure; Higher education; Balance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Vol. 282 No. 6 2021

Monthly

CONTENTS

- The Banner of Theory and the Power of Thought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and Valuable Enlightenment of Red Periodicals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Jin Nuo** (3)
-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irst Issue of the Journal **Wang Hongbin**(10)
- Strive to Create a Team of Teachers Satisfi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eople
--The Centenary History and Experi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eng Jianjun et al.** (16)
- Centennial Reflection on the Thought of People-centere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 **Li Songnan & Yang Zhaoshan** (27)
- Monitor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class Discipline: Rationality and Value
..... **Wang Zhanjun et al.** (35)
- Construction of Symbiotic Industrial College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and Practice in Guangdong **Huang Daqian & Rao Lijuan** (45)
- The Value Dimension of Social Trust and Its Cultivation **Dong Congxun & Yu Qing** (52)
- Reflections on Uphold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ove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uang Jie** (59)
- New Connotations and Development Logic of the Internet-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of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Zhang Jiangyi** (66)
- On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Shi Yang** (73)
-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Function and Practic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Music Education **Yan Ruonan** (79)
- The Change and Analysis of Regional Distribution Struc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Educational Statistics from 2009 to 2019 **Yang Zhenfang** (86)

浙江农林大学校训：求真 敬业

【校训释义】

修身养德，学做真人；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师法自然，恪守真实。

学精业广，敬畏为基；乐群笃行，敬尊为怀；经世致用，敬崇为宗。



院士领衔



专注科研



注重实践



绿地养护



社会服务



校园休读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农林大学位于杭州市临安区、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的西端，是浙江省重点建设高校、浙江省人民政府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共建高校。

学校创建于1958年，经过60余年的建设，现已发展成为以农林、生物、环境学科为特色，涵盖八大学科门类的多科性大学，建立了学士、硕士、博士完整的人才培养和学位授权体系。

学校重视生态文化建设，“两园（校园、植物园）合一”的现代化生态校园被誉为“浙江省高校校园建设的一张亮丽名片”“一个读书做学问的好地方”，校园植物种类位居全国高校第一，被教育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单位授予“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

立足新时代，学校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秉承“求真、敬业”的校训，弘扬“坚韧不拔、不断超越”的精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聚焦“双一流”目标，激发创造性张力，努力向着建设区域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生态性研究型大学的奋斗目标迈进。



统一刊号：ISSN1672-4038
CN11-5047/D

国内邮发代号：82-484 国内定价：15.00元
国外发行代号：M2076 国外定价：\$11.00元

广告发布登记编号：京大工商广登字20170005号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